

南 華 大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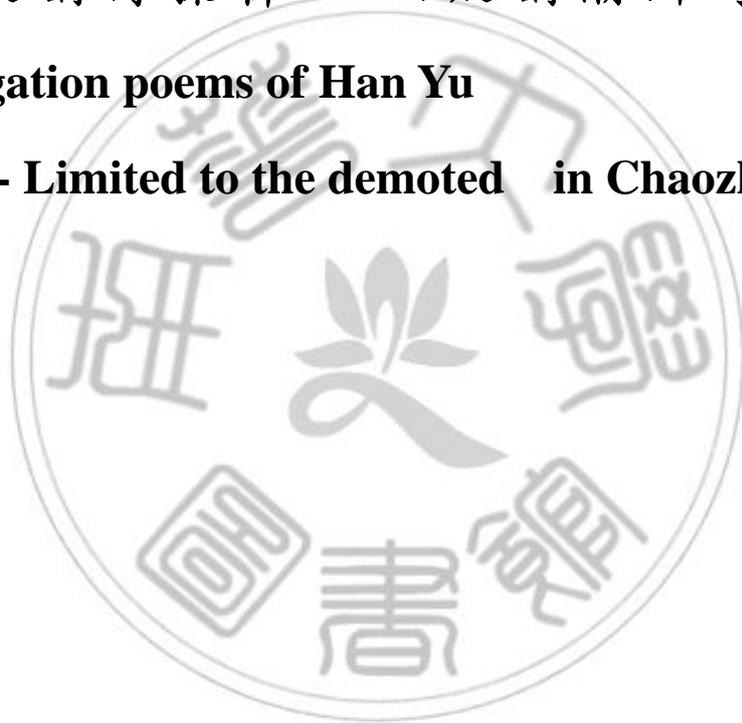
文學系

碩士論文

韓愈貶謫詩探析——以貶謫潮州時期為限

Relegation poems of Han Yu

--- Limited to the demoted in Chaozhou



研 究 生： 林鳳嬛

指 導 教 授： 曾金承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二 年 七 月

謝誌

哈！哈！哈！終於可以放手讓韓愈離開了，這感覺真好；也終於可以拋下這個「學術」的束縛，用自己的「風格」寫下心中無限的感激，這感覺更好。對於一個僅有國學底子，完全無文學底子的自己來說，做古典文學的研究，還真是一極為艱鉅的工程。經過無數次的內容篇章增刪，算算，這實際撰寫的量，應該可以編成兩本以上的論文了吧！沒想到自己竟有這麼堅韌的毅力與耐性，還真是奇蹟啊！我想這除了要歸功於農家子弟刻苦耐勞的個人特質及這八年來自己在特教體系堅苦卓絕的磨練之外，最大的功臣應該屬於我的指導教授——金承老師了。感謝老師對我不足之能力的無限包容；感謝老師對我論文不厭其煩的審閱斧正；感謝老師在我爲了拿取畢業門檻第一張門票——投遞期刊、發表，手足無措時，四處的奔波與操勞；更感謝老師在我論文撰寫陷入低潮時的鼓勵——「加油！再撐一下，以後你會懷念這一段日子的。」師恩浩瀚，永銘在心，金承老師「感恩啊！」

此外，還要感謝爲我口試的章錫老師及特地遠從高雄北上的騏竹老師；章錫老師學養豐富，治學嚴謹，在南華求學期間曾修習了一年老師的課程，上課時只見老師不疾不徐的拿起粉筆，「老、莊、易」等古文經典的內容就這麼從筆尖流瀉而出，「哇！這麼厲害啊！」這是同學們對老師學養發出由衷的讚嘆聲，真是一位飽讀詩書的「能師」。而既是老師又是學姐的騏竹老師，人美心更美；在指正我論文缺失時，如：論文中某些用詞過於感性；總會仁慈的再加上一句「我以前也會犯此弊病」，像深怕傷及我脆弱的心似的。感謝兩位老師都在百忙之中仔細的閱讀了我的論文，在口試時給了我不同觀點的思考方向及參考資料，並且提供我不少的建議與修正方向，幫我指出論文的錯誤，讓我能一一修正，使我的論文能更有「學術價值」一點。

當然，還要感謝在南華求學時遇到的老師們：正治老師、旻志老師、錫輝老師、美虹老師、瓊瑾老師、依空師父和祥穎老師，每一位都是那麼的「真」，認

真教學、真心對待學生，只可惜自己「在職」的身份，以致於不能專心向學，真有些入寶山卻空手而回的遺憾。但對於老師們敦厚儒雅的身教與言教，將是我回職場時期許自持續努力的目標。

最後，還要感謝我的好同事淑容和她的先生中州科大陳志誠教授，在我身體不適時的人文關懷；在我為英文摘要焦頭爛額時的情義相挺。還有好同事兼好同學的鈺萍和淑鳳，聽我抒發課程研讀及論文寫作苦悶的心情，陪我渡過難熬的一段日子。以及求學期間與同窗佩甄、倩心、淑華、嘉惠、素娥、于珊、小青等等，大家相互扶持、勉勵，這段酸甜的日子，真是人生豐碩的一站。同時，也要感謝我最最最親愛的家人，謝謝爸媽及兄長在精神上給予的支持，讓我毫無後顧之憂，每天都可以安心的坐在電腦前超過十二個小時的與韓愈奮戰，也才能夠順利的在兩年內拿到學位。

無數的「感謝」真是道之不盡，截至今日，我才深深的體會到，原來自己真是一個有福氣的人，一路上有如此多的「貴人」相挺、相助；在此謹將此論文獻予「貴人們」，願與您們分享這兩年來辛苦播種後的收穫。

鳳嬛謹誌於彰化

2012.07.07

摘 要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潮州之貶堪稱是韓愈人生中最重大的挫敗；他因〈論佛骨表〉被貶謫至潮州。而他亦如其他遭貶的文人一樣，將其遭貶的所思、所感、所悟在其詩文中呈現出來，其中包含對當時政治黑暗和社會動亂給百姓帶來苦難以及自身蒙受貶謫之禍的感受，其中有悲、有喜、有怨、亦有所求。本論文將研究的範圍界定在韓愈貶謫潮州期間所寫下的詩歌作品做為探討的主軸，試圖探究這些作品的內容以及其所呈現的思想特色，探析與韓愈生命憂患緊密相連的內心世界，發現韓愈不同面向的精神世界。

本論文分成五章：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前人研究成果檢討及分析、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和章節說明。

第二章〈韓愈的生平思想與貶謫詩的創作淵源〉，研究分成兩個部分，一為韓愈的生平思想，從韓愈的生命歷程，觀察他的生命思考，以及影響他生命思考的外在因素；二為貶謫詩的創作淵源，討論唐代貶謫詩形成的背景，並探析韓愈因站在衛道的立場而排佛，致使其貶謫潮州事件之始末。

第三章〈韓愈貶謫詩的內容分析〉，分成四節，依貶謫詩的內容加以解讀，依其創作之意涵、背景與心境等，將其分類為：乞憐自省之作、憂憤不平之作、贈別寄情之作和抒情感懷之作等四大類。

第四章〈韓愈貶謫詩的思想特色〉，首先先從韓愈的人格特質與儒家理想人格進行探析，其次再探究韓愈貶謫詩對儒家思想與文學思想的體現，最後則是探析韓愈貶謫詩中的時空意識。

第五章〈結論〉，綜論韓愈貶謫詩中的情志觀與文學觀，以及確立其在唐代貶謫詩史上獨特的地位。

關鍵字：韓愈、貶謫詩、潮州、思想特色

Relegation poems of Han Yu---Limited to the demotion in Chaozhou

Abstract

As a recommended letter written by Han Yu to the royal court in the morning, he was demoted to Chaozhou in the evening. This degradation happened in his life brought him more depression. As a result of the article, namely, Memorial to emperor about the Buddha bone, Han Yu was demoted. Same as other relegated literati done, Han Yu also expressed his thoughts such as political persecution, people sufferings, feeling of demotion, etc. in the poems he wrote. Especially, the poems consisted of the emotions of sorrow, happiness, resentment and demand.

In this study, Han Yu's themes of work which limited to the demoted period in Chaozhou were investigated. We also try to explore the contents and ideological character in these literatures. Moreover, Han Yu's inner world connected with his life is analyzed and we could find his mental worl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re are five chapters in this thesis as follows. Chapter I serves as an Introduction and shows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purpose and scope in detail. In addition, the literature review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are also presented.

In Chapter II a record of Han Yu's ideology and the origin of the creations of delegation poetry are introduced and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one is the ideologies which consist of Han Yu's life, thoughts and all affections of the environment; the other is the origin of creations which discuss the background, the ideas of anti-Buddha thoughts, and the reason of delegation to Chaozhou, respectively.

In Chapter III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Han Yu's relegation poetry is developed and then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basing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egation poetry and the creation background and state of mind, four categories are included such as self-examination and beg works, allegorical papers, separation and love making, and lyric creations.

In Chapter IV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 of Han Yu's delegation poetry is presented. Firstly, Han Yu's personality and Confucian thoughts are investigated. Subsequently, the effects of Han Yu's delegation poetry on the Confucianism and philology are also analyzed. Finally, we discuss the space-time consciousness in his relegation poetry.

In Chapter V the Conclusions were presented. According to the above-mentioned text argument, Han Yu's opinions of emotion, aspiration and philology are drawn. Besides, the outstanding position of delegation poems for Han Yu in the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was also defined.

Keywords: Han Yu, relegation poetry, Chaozhou, ideological character

韓愈貶謫詩探析 ---以貶謫潮州時期為限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目的	2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檢討及分析	3
	一、期刊論文	3
	二、論文	4
	三、專書	9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12
	一、研究範圍	12
	二、研究方法	15
	三、章節說明	16
第二章	韓愈的生平思想與貶謫詩的創作淵源	18
第一節	韓愈的生平及文學成就	18
	一、時代背景	18
	二、生平與仕宦歷程	22

	三、韓愈的思想背景.....	26
	四、韓愈的文學主張.....	30
第二節	韓愈的反佛思想與主張.....	35
	一、對國家社會經濟的拖累.....	37
	二、破壞倫理綱常.....	38
第三節	貶謫潮州事件之始末.....	42
	一、「貶潮」之近因.....	42
	二、「貶潮」之遠因.....	44
第四節	唐代貶謫詩的背景.....	48
	一、中國官場的貶謫文化.....	48
	二、唐代貶謫之風氣.....	50
	三、文學煥發之契機.....	52
第三章	韓愈貶謫詩的內容分析.....	55
第一節	乞憐自省之作.....	55
	一、坦陳心跡.....	55
	二、含蓄委婉.....	58
第二節	憂憤不平之作.....	61
	一、借題發揮.....	62

	二、寓言寄意·····	67
第三節	贈別寄情之作·····	75
	一、送親別友·····	75
	二、勗勉後輩·····	78
	三、故友敘舊·····	83
第四節	抒情感懷之作·····	87
	一、孤獨無助·····	88
	二、重情重義·····	90
第四章	韓愈貶謫詩的思想特色·····	93
第一節	韓愈與儒家的理想人格·····	93
	一、儒家的理想人格·····	93
	二、韓愈的人格論斷·····	95
	三、韓愈貶謫詩的儒家思想體現·····	99
第二節	韓愈貶謫詩的文學思想體現·····	102
	一、為「小我」鳴不平·····	102
	二、為「大我」鳴不平·····	105
第三節	韓愈貶謫詩的時空意識·····	106
	一、貶謫詩的空間意識·····	107

二、貶謫詩的空間意識.....	113
第五章 結論.....	121
參考書目.....	123

第一章 緒論

韓愈在中國文壇上佔有不容小覷的重要地位，本論文題為《韓愈貶謫詩探析——以貶謫潮州時期為限》試以韓愈貶謫潮州時期的詩作做為研究範圍，對詩作的內容及時空意識進行探究分析。本章擬就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前人的研究成果探檢討及分析、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等三部分進行探析。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文起八代之衰¹」的韓愈，是我國文學中上一顆永恆的彗星。對他的認識應是始於中學時期，從語文教材的〈師說〉、〈進學解〉中所獲知的印象——悔人不倦的師者、品行高潔的士人；再加上自己職場的身份——師者，所以，在研究計畫擬定時，便設定韓愈為研究的對象。但在資料的搜集與研讀後，卻發現歷史上對他的評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其「人師」形象的背後，卻有許多飽受後人爭議的部分；尤其在元和十四年（西元 819 年）的潮州之貶後，在他抵達潮州後的行為表現，引起後人對他人格產生諸多的質疑；如：

(一)、宋代的黃震在《黃氏日鈔》卷五十九中感嘆的寫道：「《論佛骨表》之說正矣。《潮州謝表》稱頌功德之不暇，直勸東巡泰山，而自作鋪張，雖古人不多讓。甚矣憲宗之不可與忠言，而公也汲汲乎苟全性命，良可悲矣²！」

(二)、洪邁在《容齋隨筆》卷三中也寫道：「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遜。……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還。……至於『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³。」

¹楊家駱，〈蘇東坡全集(上冊)〉(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頁 627。

²轉引自李善馨，〈韓愈資料彙編〉，(台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頁 368。

(三)、清代的曾國藩針對韓愈諫言憲宗「東巡泰山」之言在《曾文正公詩集》卷一中的《求闕齋讀書錄》亦寫道：「……『東巡泰山』，此則阿世取悅，韓公於此等處，多信道不篤⁴。」

從上述幾段評論中不難看出，韓愈最惹人爭議的，在於他貶潮後的行徑：畏死、不善處窮，摧挫獻佞、望召還。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一向以剛正不阿著稱，何以在其貶謫潮州後會引來後人對他人格的諸多批評？這些批評破壞了韓愈在筆者心中既有的人師及忠正剛直的形像，這引起了筆者欲對其深入探究的興趣，所以，在本文的研究動機方面主要有：

(一)、想從其貶謫潮州時期所創作的詩作一探究竟，希望從這些「貶謫詩」中一窺韓愈忠正直諫形象的背後，在他面對人生中第二次的貶謫命運時，是否真如後人所論，成爲一個貪生怕死的卑賤之人？

(二)、而在韓愈貶謫詩中除呈現其所欲表達的主題意涵外，其詩歌與文章創作的內在精神是否相一致？

二、研究目的

本論文選擇韓愈貶謫潮州的詩作做爲研究的主軸。當然僅針對這些作品並無法呈現韓愈人格特質的全部風貌。但筆者主要將焦點放在貶潮後對韓愈個人人格思想的影響，希望藉由他「貶謫詩」內容的探析以期管窺他特殊的主題風貌，而其詩文除了表達遭貶的主題意涵外，是否有抒發其他的文學主張？所以，本文主要有三項研究目的：

(一)、希望從貶謫詩的探析中，釐清其所欲表達的主題意涵。

(二)、通過貶謫詩的探析，歸納整理出韓愈貶謫詩中的思想特色。

³轉引自李善馨，《韓愈資料彙編》，頁 559。

⁴轉引自李善馨，《韓愈資料彙編》，頁 1505。

(三)、探析韓愈貶謫詩的創作與文章寫作，是否有同樣的內在精神？

到目前為止，對於韓愈貶謫詩的研究，在國內仍缺乏系統且全面地剖析，可謂是一種遺憾，因此，筆者希望通過本研究，能提高對韓愈學術研究的成果，並提供給學術界參考。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檢討及分析

綜觀前人對韓愈的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韓愈全集的整理校箋與資料彙編；二、韓愈的研究；三、韓愈散文的研究；四、韓愈詩作的研究；五、韓愈歷史地位研究；六、韓愈與他人的比較研究；而這六大類型的研究，也都獲得了不錯的成果。筆者分別從期刊論文、學位論文與專書等作品作一概略性的分析：

一、期刊論文

- 1、李建崑先生的《韓愈〈琴操十首〉析論》⁵，研究中指出〈琴操十首〉是韓愈本著他淵博的學問根基，以及敏銳的想像力，精心撰寫而成的，無論是在形式、技巧與內涵，都有高度的成就。
- 2、李建崑先生的《論元和時期流貶文人之行旅詩》⁶，研究中指出流貶是對文人的心靈與肉體的雙重折磨，他們身處進退兩難的境界。流貶的經歷，致使元和流貶文人深刻的體驗生命的意義。而其行旅詩，也提供後人極為特殊的心靈旅遊經驗。

⁵李建崑，〈韓愈〈琴操十首〉析論〉，《國立中興大學中文學報》，1990年1月，第29期，頁185-200。

⁶李建崑，〈論元和時期流貶文人之行旅詩〉，《國立中興大學文史學報》，1998年6月，第29期，頁27-48。

- 3、蔡振念先生的《沈宋貶謫詩在詩史上之新創意義》⁷，認為貶謫在唐朝是很多詩人的普遍經驗，也往往影響了詩人作品的風格，被貶詩人，大都以詩傳達貶途的苦辛和對家園親友的思念。在這一方面，沈宋和其他詩人並無不同，但沈宋的貶謫詩卻至少在三個面突出他們與眾不同的創新，並成為後來貶謫詩的典範。
- 4、姜龍翔先生的《論韓愈貶潮時期文章寫作的兩種策略——以〈潮州刺史謝上表〉及〈鱷魚文〉為考察主軸》⁸，認為韓愈由於畏死，於是運用寫作的策略以達成獲赦的目的。且在論文中除以兩篇為主軸，亦藉由貶潮詩作輔以探析印證。在台灣對韓愈貶潮的研究算是一大突破。
- 5、李豔杰先生的《韓愈〈琴操十首〉蘊涵的政治情操》⁹，認為韓愈的〈琴操十首〉委婉的表達了貶謫的心境，且從中可看出韓愈如何看待困厄處境的政治智慧及情緒變化。
- 6、卞孝萱先生的《韓愈貶潮原因探幽》¹⁰，認為〈平淮西碑〉被廢，李逢吉、令狐楚、皇甫鎛一方與裴度、韓愈一方的爭鬥，才是韓愈貶潮的深層次的政治原因。本研究有別於以往普遍的認為---韓愈貶潮是由於〈論佛骨表〉所致，卞先生還深究了其深層原因，在對韓愈貶潮原因的探究中實為一大突破。

二、學位論文

首先，筆者以「韓愈」、「詩」為關鍵字進行檢索，從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資訊網」中查詢，從民國七十（1981）年到一百零二年（2013），得到四十二筆資料。經過筆者篩選，與「韓愈貶謫詩」相關的論文研究共有十三篇，以

⁷蔡振念，〈沈宋貶謫詩在詩史上之新創意義〉，《文與哲》，2007年12月，第11期，頁237-262。

⁸姜龍翔，〈論韓愈貶潮時期文章寫作的兩種策略——以〈潮州刺史謝上表〉及〈鱷魚文〉為考察主軸〉，《中國學術年刊》，2011年3月，第33期，頁1-28。

⁹李豔杰，〈韓愈〈琴操十首〉蘊涵的政治情操〉，《內蒙古電大專刊》，2007年3月，第2期，頁44-45。

¹⁰卞孝萱，〈韓愈貶潮原因探幽〉，《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5年3月，第2期，頁128-131。

下依照畢業年度先後排列，分析如下的表格：

作者	論文名稱	學位類別	校院名稱	畢業年度	內容摘要
高八美	《韓愈詩研究》 ¹¹	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74	論文從韓愈詩的形成背景、淵源及其創作觀談起、再論韓愈詩之藝術技巧及內涵分析，最後總論韓愈詩之後人評論及影響。
李建崑	《韓愈詩探析》 ¹²	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80	廣泛探討韓愈的生平、仕宦、思想、交遊等外在因素，再與其詩歌進行結合研究；且針對韓愈詩歌的形式特徵做詳細的探究。
王麗雅	《孟郊、韓愈奇險詩風比較》 ¹³	碩士	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84	先從孟、韓兩人的背景探討兩人的的奇險詩風；再比較兩人奇險詩風中的異同點。

¹¹高八美，《韓愈詩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年）。

¹²李建崑，《韓愈詩探析》，（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¹³王麗雅，《孟郊、韓愈奇險詩風比較研究》（台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黃舜彬	《韓愈詩美學》 ¹⁴	碩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93	企圖用美學的相關理論為切入點,去分析韓愈之詩文本;進而建構出屬於韓愈的「詩美學」。
陳顯頌	《韓愈詩修辭藝術探究》 ¹⁵	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93	針對韓愈詩歌創作之修辭藝術,作專門而全面之探討,期以「散」整」結合之法更深入分析韓詩的文學藝術。
林怡君	《韓愈送別文學研究》 ¹⁶	碩士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94	古文大家——韓愈,一向給予後人剛正不阿的嚴正形象,較少人論及韓愈在剛正的形象中也包含柔情的一面,本篇論文探析韓愈送別文學作品,試著找出在嚴正中也有多情面的韓愈

¹⁴黃舜彬,《韓愈詩美學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¹⁵陳顯頌,《韓愈詩修辭藝術探究》(台北:國立中興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4年)。

¹⁶林怡君,《韓愈送別文學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5年)。

經慧玲	《韓愈、柳宗元 寓言之研究》 ¹⁷	碩士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國文學系	95	從韓、柳二人寓言 的寫作背景論 起,再分析其寓言 的內容,進而歸納 出二人寓言的最 大特色。
吳燕玲	《韓愈律詩研 究》 ¹⁸	碩士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研 究所	95	從「中唐律詩盛, 韓愈為何少做?」 這一論題發端,展 開其間是否有脈 絡可尋的探討。並 採取科學方法將 詩作逐一分析,還 原韓愈律詩的本 色。
曾金承	《韓愈詩歌唐宋 接受研究》 ¹⁹	博士	私立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系	96	採取歷史的縱向 與橫向的觀察,期 望能由接受的角度, 經由讀者主動的 立場與判斷,勾勒 出韓愈詩歌在唐 宋的發展圖像。且 比較韓詩與其他 詩歌在同一個時 空環境下的接受 情況,以期將文學 史還原。

¹⁷紀慧玲,《韓愈、柳宗元寓言之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¹⁸吳燕玲,《韓愈律詩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¹⁹曾金承,《韓愈詩歌唐宋接受研究》(台北:私立淡江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2007年)。

陳雅欣	《唐詩中的嶺南書寫研究》 ²⁰	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97	考察嶺南地在唐中如何被書寫,而其書寫是否前有所承?在因襲的過程中,唐人是否也有所新變?新變的背後,又反應了怎樣的意義。
黃翊璋	《歷代韓愈詩探微》 ²¹	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98	從歷代前賢對韓愈詩歌的評價進而探析韓愈在各朝代的歷史定位。
鄭美珠	《論韓愈詩歌中的歷史人物》 ²²	碩士	私立玄奘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99	透過韓愈的作品以及年譜、相關的專書、學位論文探討韓愈詩中的歷史人物。
姜龍翔	《論韓愈貶潮時期文章寫作的兩種策略---以〈潮州刺史謝上表〉及〈鱷魚文〉為考察主軸》 ²³	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99	先藉由韓愈詩歌的分析知其貶潮心態;並從而探討其企求渴望獲赦的心態中所運用的兩種文章寫作策略。

²⁰陳雅欣,《唐詩中的南書寫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²¹黃翊璋,《歷代韓愈詩探微》(台北:國立中興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9年)。

²²鄭美珠,《論韓愈詩歌中的歷史人物》(新竹:私立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²³姜龍翔,《論韓愈貶潮時期文章寫作的兩種策略---以〈潮州刺史謝上表〉及〈鱷魚文〉為考察主軸》(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根據以上的表列，可以發現研究成果多體現在韓愈詩藝術的特色、詩美學、律詩的本色、詩中的歷史人物和文學史地位的研究等方面，而高八美的《韓愈詩研究》、李建崑的《韓愈詩探析》二人之研究可說集眾人之大成，舉凡：韓愈身世、仕宦、時代背景與其詩歌創作關係、韓愈詩之創作淵源及其繼承脈絡、韓愈詩的意涵研究、韓愈詩的藝術價值、韓愈詩的影響等，在這兩本論文中皆有含蓋在內；但其中高八美先生的《韓愈詩研究》，雖也全面的討論韓愈詩歌的創作相關問題，不過其重點都集中在韓愈個人及其詩歌本身的研究，在縱深的研究方面較為缺乏。而李建崑先生的《韓愈詩探析》，則用功頗深，他廣泛的探討與其有關的外在因素，內容包含有：韓愈的生平、仕宦、交遊和思想等，再配合上與其詩歌進行結合研究，且同時以單獨的形式對其詩歌的特徵進行探究。但也因其研究的含蓋層面過於廣泛，所以，在各個論點的論述上，不免有蜻蜓點水之感；且筆者發現在韓愈詩歌的眾多論文研究當中，截至今日，除了陳雅欣的《唐詩中的嶺南書寫研究》及姜龍翔的《論韓愈貶潮時期文章寫作的兩種策略——以〈潮州刺史謝上表〉及〈鱷魚文〉為考察主軸》是與韓愈貶謫有相關背景外，其餘尚未有學者是從其貶潮時期所創作的四十三首詩歌進行全面性深入剖析研究的。

三、專書方面

(一)、韓愈全集的整理校箋與資料彙編

1、錢仲聯先生的《韓愈詩繫年集釋（上）、（下）》²⁴是針對韓愈詩歌做出有系統的整理與校箋，為韓愈詩歌研究提供了一部堅實的文本，該書對韓愈詩予以編年，以時間先後編次，大面積的解決了韓愈詩的繫年問題，而之後錢仲聯、馬茂元校點的《韓愈全集》²⁵則是根據馬茂元先生整理的《韓昌黎文集校注》及錢仲聯先生的《韓愈詩繫年集釋》，將韓愈詩文合於一書，刪去文集中與詩集重覆的《石鼎聯句詩序》，並刪去校注，僅存白文，以全集的形式呈現。兩本專書，對於韓愈的研究都提供相當助益。

²⁴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

²⁵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資料彙編專書方面有，李善馨先生的《韓愈資料彙編（上）、（下）》²⁶在選材上，以對韓愈的思想、詩文創作進行評述的資料為主；有關韓愈的生平事跡、作品考辨、字義疏證的資料，也酌予收錄。而較具代表性的評述，句括詩文集、詩話、筆記、史書和類書，分別按時代先後順序排列。本書輯錄從中唐「五四」一千一百餘年間有代表性的評述，重要評述資料，盡收眼底。且對篇幅較大、易尋得的或已單獨成書者，皆未予收錄，且有訛誤、脫落或顛倒者亦作了修正，所以，對韓愈的研究亦提供了很大的協助。

(二)、韓愈的研究

- 1、羅聯添先生的《韓愈研究》²⁷，其研究的內容包含：韓愈的家世、韓愈事蹟、韓愈交遊和韓文評論，且在附錄的部份又收錄了韓文論述選輯、韓愈研究論著目錄和韓愈年表，且羅先生用功頗深，先從專一的主題進行深入的探究，再將其搜集成冊，內容方面頗為豐富。但筆者發現在研究中，僅輯錄了後人對韓文的評論，並未做韓愈詩歌的相關研究，實為可惜。
- 2、劉國盈先生的《韓愈評傳》²⁸，在內容的安排上，從生平的事蹟再輔以各時期詩文的創作來做研究分析，從詩作的內容解讀，呈現詩歌之時代背景、詩歌之內涵探析、詩歌的情思表現，論述深刻，很有說服力。實為對韓愈生平與詩歌相關研究的一大工具書。
- 3、錢冬父先生的《韓愈》²⁹，分成三個篇章做研究討論，包含韓愈的生平、韓愈的散文和韓愈的詩，三大主題的範圍廣大，所以，在著作中都只是淺談，未能做詳盡的探析。

²⁶李善馨，《韓愈資料彙編》，(台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

²⁷羅聯添，《韓愈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

²⁸劉國盈，《韓愈評傳》，(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

²⁹錢冬父，《韓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1年)。

(三)、韓愈的散文研究

王更生先生的《韓愈散文研讀》³⁰，內容包含：書影、序例、導言、選讀和附錄。從開篇至卷末，由理論的闡發，到作品的宣講，循序漸進，有條不紊。其中韓愈的籍貫與家世和生平事迹，亦為筆者在作論文研究時的參考資料。

(四)、韓愈的思想研究

1、韓廷一先生的《韓愈思想研究》³¹，韓先生以弘觀的立場上，對道統論、文學論、宗教論、教育論、政治論及社會論都有所探討，且對一些引起爭議的問題，如：里籍，亦一一加以駁斥，指出他們的錯誤。

2、市川 勘先生的《韓愈研究新論》³²，他發現歷史上對韓愈的評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尤其在他的「文是否載了道」上，最惹爭議、信用也最受打折。但他認為韓愈倡道著文，絕非是為了復現歷史精神而是為了闡發新學。

韓廷一先生與市川 勘先生的這兩本思想研究之著作，對韓愈思想的研究頗為透徹，實為研究韓學思想置案頭之重要著作。

(五)、韓愈的詩歌研究

當代學人對於韓愈詩歌之研究，以李建崑先生的《韓愈詩探析》³³最為著名，流傳也最廣。其用功頗深，全套書分成十二章：探討韓愈之仕宦生涯與詩歌創作、韓愈詩之創作背景、韓愈詩文觀念蠡探、韓愈詩與先秦六朝文學關係考、韓愈與李杜關係之考察、韓愈詩內涵之探究、韓愈詩之形式分析、韓愈詩之創作技法、韓愈詩三種風格特徵和韓愈詩之評價等，逐步分析韓愈詩，作為

³⁰王更生，《韓愈的散文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³¹韓廷一，《韓昌黎思想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³²市川 勘，《韓愈研究新論》，(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

³³李建崑，《韓愈詩探析》，(台北：花木蘭文化，2009年)。

歷史與個人經驗的忠實紀錄以及對韓愈詩藝術之境做詳盡的分析，在研究韓詩上非常具有代表性。

所以，從上述對期刊論文、論文和專書的成果分析中，筆者發現，以現今對韓愈的研究狀況來說，針對其貶謫做一相關的探討研究，在大陸地區已有學者著手進行；但在台灣僅見少數學者針對韓愈貶謫做相關的研究，而雖有部份學者在其著作中，在對詩歌的分析時會穿插幾首韓愈潮州時期的創作，但幾乎都是重覆的幾首，如：〈左遷藍關示姪孫湘〉、〈宿增江口示姪孫湘二首〉等，並無新的創見，且對於詩人貶謫期間之四十三首貶謫詩進行全面相關專門研究的目前尚較缺乏。於是，筆者認為，若從韓愈貶謫時期所創作的詩歌做一個切入點進行研究，恰可在前人眾多對韓愈詩歌所做的個別傳統研究中另闢出一蹊徑。所以，「韓愈貶謫詩探析---以貶謫潮州時期為限」是一個值得進行深入研究的議題。且通過本論文的研究，期望因此能再有新的突破與發現。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貶謫詩在韓愈之前已有悠久的發展歷史；著名的文人，如：宋之問、王昌齡、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蘇軾、歐陽修.....等，在朝為官時，都曾遭受過貶謫之苦，這些貶謫文人將其心中所感寫成一首首的好詩，讓後人廣為傳頌。在韓愈的一生中曾遭受兩次的貶謫事件，這兩次的挫折，致使其身心靈遭受莫大的傷害，尤其以潮州之貶，對其打擊更是巨大；而他亦如其他遭貶的文人一樣，將其遭貶的所思、所感、所悟在詩文中呈現出來。在其現存的四百多首詩歌創作中，其兩次貶謫時所創作的詩歌就有百首之多，占其全部詩作的四分之一，但在《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中並未有明確羅列出哪些是「貶謫詩」；所以，筆者參酌錢仲聯先生編的《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下）》及中華書局出版清聖祖的《全唐詩》及錢仲聯和馬茂元校點的《韓愈全集》，將韓愈詩集中，在貶謫潮州時的詩作，一一挑出整理，作品包含：韓愈在趕赴貶謫地潮州路途中的創作、謫居潮州時的創

作及量移回到長安前的創作，得出此一時期的貶謫詩作共四十三首。詳細篇目可參考下表：

詩名	創作時空背景 (參酌錢仲聯先生的《韓昌黎詩繫年集釋》)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日本享和三年本又玄集題作「貶官潮州出關作」，韓愈貶潮是在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所以本詩是在元和十四年貶官潮州出關時所作。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韓文公謫潮州，自藍田入商洛，於武關西作。
路傍堠	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春，韓愈出為潮州作；「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足可印證出武關而南，則是楚地。
次鄧州界	從詩中「普將雷雨發萌芽」的意旨得知，此詩作於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初春時節。
食曲河驛	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韓愈到潮州，自藍田關入商陵，將路過鄧州而作。
過南陽	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韓愈赴潮州日作。
題楚昭王廟	韓愈在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欲到其貶謫地潮州，途經襄陽楚昭王廟時，看到廟中一片荒涼的景象，心中有感而發而題下此詩。
灑吏	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韓愈赴潮州途中所作。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別酬以絕句二章	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韓愈赴潮州經過韶州所作。
過始興江口感懷	大曆十四年(西元779年)韓愈曾隨兄韓會以罪貶

	韶州刺史，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韓愈貶潮州，路過始興感懷寫下此詩。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韓愈赴潮州路途中所作。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韓愈抵潮州後作。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韓愈赴潮州作。
答柳柳州食蝦蟇	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韓愈在潮州，子厚在柳州；聞子厚謫柳州猶食蝦蟇，於是寫下此詩應答。
琴操十首	方世舉注：按琴操十章，未定為何年所作。但其言皆有所感發，如「臣罪當誅」二語，與潮州謝上表所云「正名定罪，萬死猶輕」之意正同，蓋入潮以後，憂深思遠，借古聖賢以自寫其性情也。故今作從方世舉舊編，繫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潮州作。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接到赦令之後，尚未到韶州前所作。
別趙子	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冬天韓愈自潮州量移袁州，寫下此詩話別趙德而作。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	元和十五年(西元820年)庚子自潮州量移袁州路途中所作。
題秀禪師房	元和十五年(西元820年)量移袁州借宿禪師房而寫下此詩。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詩中「來往再逢梅柳新」寫下韓愈往來上下經過韶州，都是梅柳新時；於是說明此詩應作於元和十五年(西元820年)正月。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元和十五年(西元820年)九月，公自袁州召拜國子監祭酒一職，回長安行經益城，作此詩寄李程。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	自此至題驛梁六詩，皆元和十五年(西元820年)冬召還道間作。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元和十五年(西元820年)冬天自袁州回長安，過蕭存廬山故居時所作。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元和十五(西元820年)韓愈自袁州除官還京時所作。
又寄周隨州員外	前有行次安陸一詩，題云「先寄」，則此當作「又寄」可知亦是在元和十五年(西元820年)冬召還道間作。
題廣昌館	元和十五年(西元820年)冬召還道間經廣昌所作。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元和十五(西元820年)韓愈自袁州召還經過襄陽作此詩予李逢吉。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以韓愈貶謫潮州時的詩歌作品共四十三首貶謫詩作做為研究之核心資料，在研究敘寫「韓愈貶謫詩探析---以貶謫潮州時期為限」之初，筆者先研讀當代學者們對韓愈的文獻研究，以了解韓愈的生平經歷，思想的形成，崇儒反佛思想與主張，以及文學觀與藝術表現，以期對韓愈貶潮時期的詩作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所以，本論文擬透過韓愈的作品、相關的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專書，對韓愈貶潮時期詩作中的內容作詳盡的探討分析。

在文本的選用是以錢仲聯先生的《韓昌黎詩繫年集釋》為主要文本，再輔以李善馨先生的《韓愈資料彙編》、李建崑先生的《韓愈詩探析》、李卓藩先生的《韓愈詩初探》、羅聯添《韓愈研究》等書，冀能對整理出的韓愈貶謫潮州之詩作加以深入探究之。在整理出韓愈的貶潮詩作後，接著就詩的內容分類淺析探論，再歸

納出韓愈貶謫詩中的主題意涵；並就其內容架構，分析其詩作中情志觀與文學觀。

在論文進行的過程中，筆者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簡略介紹如下：

- (一)、從社會研究法，分析韓愈貶謫詩產生的社會背景，藉由對韓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的探討，研究其對於韓愈貶謫詩的影響；如：在本論文的第二章韓愈貶謫潮州之始末研究中，先從時代背景的探究，再找出其貶潮的真正原因。
- (二)、以詮釋研究法，分析韓愈的貶謫詩，以了解韓愈貶謫詩中的意涵；如：在本論文的第三章韓愈貶謫詩的內容分析方面，先就韓愈的詩作找出其在貶潮州時期的作品，並針對這四十三首貶謫詩作，從詩作的創作背景、心境詮釋其創作的內在主題意識。
- (三)、以演繹歸納法論述韓愈貶謫詩中的思想特色。多樣的主題意涵、意識，以突出其貶謫詩在貶謫詩史上的地位；如：在本論文的第四章韓愈貶謫詩的思想特色方面，探析韓愈在詩作中所欲表達的思想意識及在第五章中對論文全文作一回顧和檢視。

三、 章節說明

本論文分成五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動機及目的、前人的研究成果檢討及分析、研究範圍。

第二章〈韓愈的生平思想與貶謫詩的創作淵源〉，為對韓愈貶謫詩有更清楚的了解，本章首先探究韓愈生平的相關背景及文學主張，接著探析唐代貶謫詩的背景，以及韓愈的反佛思想主張及造成韓愈貶謫潮州事件之始末。

第三章〈韓愈貶謫詩的內容分析〉，從貶謫詩的內容加以解讀，並依詩的創作背景、心境與意涵等加以分類。

第四章〈韓愈貶謫詩的思想特色〉，本章主要以探討韓愈貶謫詩中儒家思想與文學觀的體現及韓愈貶謫詩中的時空意識。

第五章〈結論〉，對韓愈貶謫詩中的情志觀與文學觀，給予綜合性的評述，確立其在唐代貶謫詩史上獨特的地位。

第二章 韓愈的生平思想與貶謫詩的創作淵源

對於「知人論世」的觀點，孟子說過這樣的一段話：「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³⁴。」而在本文是以韓愈貶謫詩做為研究的主軸，所以，為了對韓愈貶謫詩有更通透的研究，筆者以為，對韓愈生平時代背景的考察及貶謫詩的創作淵源亦是不可輕忽的重點。所以，本章擬先從韓愈的時代背景做探究，並勾勒其生平梗概，並了解韓愈的文學成就，最後，再論其崇儒反佛思想與主張及貶謫潮州之始末，並藉由前述研究之結果，探析出韓愈貶謫詩創作的淵源。

第一節 韓愈的生平及文學成就

韓愈是唐代的文學家、政治家和思想家。蘇東坡讚譽他「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³⁵。」「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³⁶。」在思想上遵奉儒家道統，堅持攘斥佛老，在政治上主張國家統一。在文學上主張「文以載道」、「不平則鳴」和「以文為詩」；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顆閃亮的彗星。

而為對韓愈貶謫詩有更詳實的探究，筆者以為，對其人格思想形成的了解亦應是一個必要的條件。而個體人格、思想的形成，除了受到家庭環境的塑造之外，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個人一生的際遇，亦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本節從韓愈所處的時代背景、生平事蹟、儒學思想與文學主張分別進行析論。

一、時代背景

安史之亂後，君國權威跌落，使得大唐王朝最高統治者面臨了最大危機，而

³⁴朱熹，《四書集注·孟子·萬章下》，(台北：學海出版社，1989年)，頁350。

³⁵楊家駱，《蘇東坡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頁627。

³⁶楊家駱，《蘇東坡全集》，頁627。

這危機的形成主要來自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宦官專權

宦官本來是服侍皇帝日常起居的僕役，一般來說是很難插手政治的。且從歷史的經驗上來看，宦官勢力高漲之際通常是皇權微弱之時。在政局多變，皇權跌落的中唐時代，皇帝在這波雲詭譎的政治鬥爭中極需找到支持的力量。而宦官因與皇帝朝夕共處，因此，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成為皇帝最主要的依靠。宦官也因此乘機坐大，染指國事。

中唐之後，由於宦官專權之問題甚囂塵上，致使朝政日益衰敗。根據《資治通鑑》的記載：

己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者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³⁷。

所以，唐代自開元元年(西元 713 年)起，由於玄宗信任宦官高力士，致使宦官在朝政上開始掌權得勢。而在肅宗朝代對宦官亦十分寵信，根據《資治通鑑》上的記載：

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復脩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

³⁷司馬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七)·卷二百一十一》，(台北：天工書局印行，1988年)，頁 6686。

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之；上許之³⁸。

在安史之亂後，宦官李輔國由於擁立登基有功，被任命為「元帥府行軍司馬」，將兵符軍號都交由其掌管。而李輔國被殺後，宦官程元振亦因擁立代宗登皇位有功，繼任「元帥府行軍司馬」，負責禁軍，其權勢更為之強大。到了德宗時期，建中四年(西元 783 年)藩鎮朱泚攻進長安，德宗逃離京城，待亂事平定後，德宗再也不敢信任武將及藩鎮；而在其逃亡時，由於宦官竇文場、霍仙鳴隨行有功，特別將禁衛軍之左右神策及天威等軍，全部交由管轄，自此中央軍權被宦官全部掌控。

而在政事方面，宦官也與宰相分掌軍政；中唐以後所設置的樞密使及宣徽使，也都由宦官擔任，執掌皇室機要及宣傳詔令。大小軍區也全由宦官去擔任監軍；宦官在朝廷上作威作福，有時甚至利用藩鎮以威脅君王或宰相；且朝廷大臣的進用與否，亦常為宦官所操縱把持；後來連皇帝的廢立生殺也都由宦官主導，從肅宗至唐代的滅亡，除哀帝之外，君王之登基都是透過宦官所擁立而成的，且這些君王如有對宦官不利的舉動或讓他們心生不滿，宦官便將其殺害，而擁立另一位新君王。所以，唐代宦官的專權，實為朝廷的肘掖之患。

皇帝為謀求擴大皇權之勢，尋求宦官協助，並支持其參與政治；但宦官勢力崛起之後，反而侵蝕了皇權。且宦官又與朝臣、藩鎮結成錯複雜的關係，以及宦官內部的勾心鬥角等問題，使得政局更加混亂，這樣的情勢既為皇帝所始料未及，更超出了皇帝的控制範圍。宦官勢力遂漸漸凌駕於衰弱的皇權之上，而大唐國勢也日益的衰頹。

(二)、藩鎮割據

唐朝的政治禍根，除了宦官專權的問題之外，藩鎮割據亦是一股惡勢力。溯其源頭，始於元寶元年(西元 742 年)，根據《資治通鑑》上的記載：

壬子，分平盧別為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經略使。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

³⁸司馬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八)·卷二百二十》，頁 7035。

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³⁹。

承襲唐初邊防軍隊建置的基礎，玄宗在邊境設置十個節度經略使，且各節度經略使所率領的軍額，比當時朝廷禁衛軍要多出好幾倍，與唐初那種舉關中兵足以壓制四方的軍容優勢，已不復存在。

眼見各國防邊境節度經略使的權勢日益壯大；首先，因為這些邊境的駐軍通常都要屯田或營田，所以，節度經略使就必須主管屯田、營田之事；其次，因為這些邊境駐軍的家屬也住在邊境，所以，他們又須兼管民政、度支、安撫、觀察等工作；最後，這些邊境駐軍也因長期與節度經略使相處，漸漸變成他們的私人武裝力量。所以，節度經略使便從屯田中所獲得的收入以及善用這些私人軍力，作為自己軍經力量的基礎，天寶後節度經略使遂集軍、民、政大權於一身。但反觀朝廷中的兵員，紀律鬆散，形成外重內輕的態勢，節度經略使氣焰高張，朝廷無法掌控；而地方政府之軍備，也煥散廢弛不堪任用，終於釀成了安之史之亂。且到了安史之亂後，朝廷為安置有功的戰將，把節度經略使的職位各授以鎮帥，各自擁兵，佔領各大鎮，在河北、山東等地列鎮相望，自行擴充軍伍，搶奪民間土地、徵收賦稅、自行委任官吏，各鎮間互相聯絡或互相合併，這些藩鎮可說是堂而皇之的占地為王。而這十個節度經略使中，又以淮西節度經略使最令朝廷頭痛，與朝廷對立，四處虜掠，幾乎接近東都⁴⁰。所以，憲宗在元和九年才決心下令討伐藩鎮。先後平定西川、夏綏、鎮海、魏博、淮西、成德、淄青、盧龍等鎮，形式上全國統一，號稱中興。但即使朝廷打敗許多叛跡昭著的藩鎮，但各鎮依然自行委任官吏，截留稅收，擁有軍隊，所以，隨時再起作亂之事不無可能。大唐王室中那些忠心的臣子，各個憂心忡忡；不出所料，當憲宗被宦官殺害後，藩鎮之亂又再度興起，直至唐代末年，此一亂源未曾歇息。

所以，宦官專權、藩鎮割據，是使得大唐朝政與日俱衰，國勢亦日益衰頹的主要原因；而韓愈就是生存於這樣混亂黑暗、動盪不安的時代之中。

³⁹司馬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八)·卷二百一十五》，頁 6847。

⁴⁰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平淮西碑〉《韓愈全集》云：「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 284。

二、生平與仕宦歷程

韓愈（西元 768 年—824 年，唐代宗大曆三年至穆宗長慶四年）。孤苦的童年，讓他飽嘗人世間的滄桑，磨練出他那不屈不撓、改善困境、奮發向上的性格。本小節擬先充分汲取前賢考證成果，對韓愈的人生歷程，將其分成四個時期：孤苦坎坷的年少期、寄身藩鎮的少壯期、仕途浮沈的壯年期、鞠躬盡瘁的晚年期，分別進行論述，並探討韓愈的思想及人生實踐。

(一)、孤苦坎坷的年少期(一歲至十八歲)

韓愈出生在唐代宗大曆三年(西元 768 年)的京城長安，在其未滿三歲時便失怙失恃，由兄長韓會及兄嫂鄭氏擔起教養之責；其在〈祭鄭夫人文〉中就寫道：

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⁴¹。

尤其，在韓會病逝後，韓愈依靠鄭氏的扶養才得以長大成人；鄭氏對他關懷備至，細心的照顧，溫暖他幼小的心靈，也讓他對兄嫂的大恩大德永銘在心。

而韓愈在文學方面的啓蒙教育，開始得甚早；在〈與鳳翔刑尚書書〉就指出：「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歲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⁴²。」在韓愈七歲時，韓會便開始教他讀書識字；而韓會並非泛泛之輩，他以道德文學稱伏一世；所以，為韓愈在學問上能奠定了穩固的基礎，且種下了日後其發揚古文志願的種子，這全是拜韓會之所賜。

大曆十二年(西元 777 年)韓會貶官韶州，一家人隨其前往。貶途的艱辛，再加上貶官心情的苦悶煩憂，在唐德宗建中元年(西元 780 年)，韓會便死於任所韶州；這對年僅十三歲的韓愈來說，是一次人生的打擊。所以，筆者以為，韓愈在往後

⁴¹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祭鄭夫人文〉《韓愈全集》，頁 236。

⁴²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與鳳翔刑尚書書〉《韓愈全集》，頁 190。

貶謫詩中所呈現的「命將歸兮」之憂懼意識，極有可能是受到「兄長因貶官而致死」這一個事件的影響而產生的。而從建中二年(西元 781 年)至貞元元年(西元 785 年)，為躲避戰亂，鄭氏率領全家人居住在宣城，而由於兄嫂鄭氏持家有成，在安定的生活中，使得韓愈得以致力於學習，通曉六經百家之言，為其提倡古文、發揚儒家⁴³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寄身藩鎮的少壯期(十九歲至三十四歲)

貞元二年(西元 786 年)韓愈十九歲，隻身一人來到京城；其為改善目前生活，有意應考入仕，以謀得一官半職；如其〈贈族侄〉一詩中所云：「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闕，辭家逐秋蓬⁴⁴。」所以，從貞元三年(西元 787 年)韓愈 20 歲，首次參加進士考試，但未獲得錄取，韓愈並不氣餒，再接再厲，終於在貞元八年(西元 792 年)，第四次的應考中，考取了進士資格，但這個資格卻只是個空銜，須再經過一次的吏部博學宏詞考試，始能取得一官半職。於是，韓愈再參加博學宏詞考試，一連三次皆名落孫山，讓其不禁抱怨連連，在〈上考功崔虞部書〉中便寫道：

既以自咎，又嘆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退。

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器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⁴⁵。

他抱怨考試的不公平、也質疑考官未閱卷即先行放榜；而韓愈為達到作官的目的，三上宰相書，希望藉由宰相的推薦能謀得官職，但最後還是石沈大海；所以，從以上論述可以獲知，韓愈為求官，可說是動作連連。筆者以為，從韓愈為求官職

⁴³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使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窺前靈之逸迹兮，超孤舉而尋幽；既識路又疾，孰知余力之不任。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忽忘身之不肖兮，謂青紫其可拾。」頁 118。羅聯添，《韓愈研究》中認為：「『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是指以儒家為志向；『時俗之所服』為當時所流行的駢文；而『古人之所佩』則是古人所作的散文」，(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 年)，頁 3-4。

⁴⁴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贈族侄〉《韓愈全集》，頁 9。

⁴⁵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上考功崔虞部書〉《韓愈全集》，頁 354-355。

的行動來看，阿諛奉承、卑躬屈節、奔走侯門四處上書等；更凸顯其勢在必得的心理；這與其貶謫詩中為求歸朝，屢屢以坦陳心跡或曲折委婉的方式表達訴求，正不謀而合，這當中可以看見韓愈「意志堅定」、「擇善固執」的人格特質。

貞元十二年(西元 796 年)，韓愈終於在洛陽取得入仕的門路，被董晉辟為觀察推官，雖然不是京城的官職，僅是藩鎮的虛銜，但也總算踏入了仕途。貞元十五年(西元 799 年)，董晉去世，韓愈改依武寧節度經略使張建封，任徐州節度推官。幕僚的生活讓其真過不慣，且多次的進諫，又未獲張建封採納。那推官的職位，有如雞肋一般，「食之無味，棄之可惜」，讓其心生矛盾，不知何去何從。於是，韓愈決定再給自己一次的機會，於貞元十六年(西元 800 年)至長安參加吏部銓選，以期能獲得一官半職。

(三)、仕途浮沈的壯年期(三十五歲至五十歲)

而在洛陽等待吏部詮選結果的期間，韓愈與李翊談論古文的寫作；在《答李翊書》中，他藉由此書表明自己立身處世的原則以及治學的心得；關於此文，林紓在《韓柳文研究法》中即道：「昌黎論文書不多見，生平全力所在，盡在李翊一書⁴⁶。」這裡指出了韓愈「師法於古」、「務去陳言」、「文以載道」等文學主張，且他也藉由「文以載道」的理念來突出己身修養的重要性。

而皇天不負苦心人，在貞元十八年(西元 802 年)韓愈終於被任命為國子監四門博士，負責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工作。在此之際，韓愈在文壇上已頗負名望，他除了倡導古文之外，亦大力的提攜後輩，如：侯喜、劉述古、李紳、李翊等十餘人。而由於過往坎坷的人生經驗，且也踏上仕途，在為文論述上也漸顯其心中的感觸，其「不平則鳴」之說也正是出於此時其所撰寫的〈送孟東野序〉。貞元十九年(西元 803 年)韓愈在李汶的推薦下，如願以償的被擢任為正八品上的監察御史。以仁義自居，自許孔孟的他，決定一展他匡正時俗的志向。而這一年長安大旱，發生饑荒，災情嚴重，官吏卻不顧一切橫征暴斂，導致百姓家破人亡；韓愈以其職責所在，上疏了〈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

⁴⁶林紓著，《韓柳文研究法》，(台北：廣文書局，1964 年)，頁 21。

右臣伏以今年已年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因逾慈母，仁過春陽，租賦弓間，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大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征。臣愚以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⁴⁷！

此一疏狀，揭露了國家現狀，請求停征賦稅，因而得罪了幸臣及憲宗，被貶連州做陽山（今廣東陽山縣）令；為民請命，卻落得貶官的下場，讓韓愈心中滿是悲憤。貞元二十一年(西元 805 年)量移江陵府士曹參軍，掌理刑事案件之審判。元和元年(西元 806 年)六月，自江陵召拜正五品國子博士。到了元和十二年(西元 817 年)，憲宗任命裴度出征淮西吳元濟，韓愈等人隨行出征，十二月時，班師凱旋歸朝，韓愈以戰功厥偉，擢升為正四品下的刑部侍郎，並受命撰平淮西碑，宣揚大唐中樞的威武。

(四)、鞠躬盡瘁的晚年期((五十一歲至五十七歲))

元和十四年(西元 806 年)，憲宗命宦官杜英奇帶二十位宮人，持香花迎佛骨至宮中，《新唐書·韓愈傳》

憲宗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奔走膜頌，至為夷法的體膚，委珍貝，騰汨係路⁴⁸。

韓愈因上表諫佛骨事觸怒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在潮州期間，他開發嶺南文化、驅鱷魚以保護人民、設置鄉學以教導人民，幾個月後，又量移為袁州刺史，在刺史任內，又解放奴婢。元和十五年，憲宗死亡，新就任的穆宗召韓愈回京，召拜國子祭酒，官職越做越大，但或許是人生的歷練，也或許是參悟了佛法，此一時

⁴⁷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韓愈全集》，頁 324。

⁴⁸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韓愈傳)《新唐書》，頁 5258。

期的韓愈不再汲汲營營於官祿，他與友人王建、張署、張籍等人，每日以詩酒、文章、賞花與音樂來陶醉餘生。長慶四年(西元 824 年)韓愈卒於靖安里第，走完他艱苦卓絕的一生，敬宗並追贈他為禮部尚書，歸葬河陽。

三、韓愈的思想背景

長期以來，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一直占據著統治的地位，大多數的文人都深受其影響。儒家思想培養了他們關心社稷和關心民瘼的愛國思想；且將其思想表現在憂國和憂民的行為上，以追求人生理想、實現自我價值做為最高的人生目標。他們有深深的使命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⁴⁹、「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⁵⁰；他們對於「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不敢有片刻怠忽，「安社稷」和「濟蒼生」成為歷代文人追求的梦想與最高理想。

(一)、韓愈的儒學淵源

韓愈生於儒學衰頹、佛老盛行之際，其家庭是一個庶族官僚世家，祖父曾任桂州長史，父親韓仲卿為一個小官，當過武昌縣令，為政清廉，與詩人李白和杜甫等人有往來，他去世後，李白還撰寫〈武昌宰韓君去思碑〉，文中稱讚他的為人和政績。韓愈的三個叔父都是小官吏，其中三叔韓雲卿頗負文名，是撰寫碑版之文的名家。而兄長韓會並非泛泛之輩，他以道德文學稱伏一世，其主張文章著述要發揮教化的功能，闡揚儒家之道，反對魏晉以來浮誕華麗的駢文，這樣一個以文章傳世的家族，對韓愈日後的門生道路及思想學術都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韓愈自幼生長於儒學思想縈繞的環境中，啟蒙教育，開始得甚早，在〈與鳳翔刑尚書書〉就指出：「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歲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⁵¹。在韓愈七歲時，韓會便開始教他讀書識字；所以，為韓愈在學問上能奠定了穩固的基礎，且種下了日後其發揚古文志願的種

⁴⁹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顏淵篇》，(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 85。

⁵⁰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日知錄集釋·卷十三》，(中華書局)，頁 5。

⁵¹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與鳳翔刑尚書書〉《韓愈全集》，頁 190。

子，這全是拜韓會之所賜。

而其對於儒學的崇奉，在〈進學解〉中便寫道：「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⁵²。」在〈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中亦寫道：「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⁵³。」他自視為儒家道統的傳承者，儒家剛直有為的思想特徵在其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記。在〈進學解〉中云：「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⁵⁴。」韓愈從小便懷著傳道濟世的志向，其〈答張籍書〉中亦寫道：

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⁵⁵。

韓愈有著道濟天下之溺的使命感，而這雄心壯志與孟子的「舍我其誰」氣魄又甚為相似。

在韓愈的學術淵源上與古文運動的先驅者亦有著密切的關聯；他早年曾追隨獨孤及和梁肅之徒鑽研古學，與李華之子李觀亦是好友，又受知於蕭穎士的兒子蕭存，所以，在文學思想上，韓愈繼承了這些先驅者的理念，並加以發揮。韓愈最重要的文學主張就是倡導古文運動，他做為一個對社會有強烈責任感的儒者，他意識到中唐社會的安定與發展所面臨的危機；所以，他意欲藉由古文運動來重振儒家思想，整頓民心，為維護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及王朝的統治和國家的安定而努力。

(二)、韓愈的儒學思想

韓愈的儒學思想，主要是以先秦的孔孟思想為主，韓愈在〈上宰相書〉中就寫道：

⁵²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頁 131。

⁵³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上卷》，(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 年)，頁 288。

⁵⁴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進學解〉《韓愈全集》，頁 131。

⁵⁵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重答張籍書〉《韓愈全集》，頁 163。

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不為利；其所讀皆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戶文，抑邪與正，辨時俗所惑⁵⁶。

文章盡顯其對於孔孟思想中「堯舜之道」的政治理想的推崇。而究竟什麼是「堯舜之道」呢？簡而言之，就是孔子和孟子的政治理想。首先，孔子主張「以德治國」，他認為唯有道德高尚之人才足以為君王，故君王應做為社會道德的理想楷模；而堯舜正提供了統治者最佳的人格典範，「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⁵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⁵⁸」，所以，深得孔子的贊賞。其次是「選賢與能」；根據《尚書》中的記載，唐虞時期的選賢與能，除了對官員的選拔外，也用在對帝位繼承人的選擇上，在《堯典》中就寫道：「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對於人才的選用，堯首重的是才德，而舜是一位才德兼備之人才，所以，堯將其帝位禪讓給舜。最後，是要「君臣共理」；儒家主張建立一種權力制衡的結構，「聖君」與「賢臣」的相結合即是理想的政治，就像「堯舜之道」指的即是堯與舜這樣的君臣關係。所以，在孔子與孟子的政治理想當中，君王與臣子都有治理天下的共同責任，君王不可獨攬大權，士人亦應承繼道統。而這道統即為孔孟的儒學思想，其思想的核心便是仁義之道⁵⁹：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⁶⁰。

在〈送浮屠文暢師序〉中亦指出：

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

⁵⁶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頁 171。

⁵⁷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顏淵篇》，(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 109。

⁵⁸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子路篇》，頁 116。

⁵⁹參考王黎燕，〈韓愈原道中的尊儒思想〉，(焦作大學學報，2010 年第 2 期)。

⁶⁰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原道〉《韓愈全集》，頁 120。

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⁶¹。

在〈答李翊書〉中也寫道：「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終吾身而已矣⁶²。」韓愈認為，儒學思想的仁義之道可以讓人修身養性，可以齊家，可以治國，亦可以平天下；儒學思想的仁義之道能夠維護「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⁶³。」儒學思想的仁義之道有利於國家社會的發展且能改善人民的生活環境。但佛老的仁義內涵卻與此相悖離；「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⁶⁴。」佛教之道則「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⁶⁵。」佛、老二教泯滅人性，破壞了倫理道德；是國家動亂的亂源。韓愈指出，佛老思想得以乘虛而入，占據了人們的思想，便是由於聖人之道不傳，使得不講仁義道德之風氣盛行，且其弊端與楊朱墨子之害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在〈與孟尚書書〉中寫道：

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
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⁶⁶。

韓愈重申自己欲使聖人之道傳下來的決心，即使冒著生命危險亦萬死無悔，並藉此宣言以讚揚儒家之道而辟佛老。

從研究中筆者發現：中唐由於身陷內憂外患的困境，使得國家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態都呈現衰敗的現象；文人、士大夫也發現儒家傳統地位的跌落，而自己在政治勢力的抗衡能力也日益消失。而爲了找到真正的自我價值及實現重振儒學的願望，他們企圖恢復儒家傳統價值觀，並透過改變人倫、修習德業、先王之道等方式以重振士人的傳統價值、地位及恢復唐王朝的權威與秩序。

⁶¹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送浮屠文暢師序〉《韓愈全集》，頁 209。

⁶²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答李翊書〉《韓愈全集》，頁 177。

⁶³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原道〉《韓愈全集》，頁 121。

⁶⁴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原道〉《韓愈全集》，頁 121。

⁶⁵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原道〉《韓愈全集》，頁 121。

⁶⁶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與孟尚書書〉《韓愈全集》，頁 195。

四、韓愈的文學主張

韓愈的一生，在致力古文實踐的同時，還有意識的在古文理論方面作出了貢獻。其在〈答竇秀才書〉、〈上宰相書〉、〈上兵部李侍郎書〉等文章中都陳述自幼即喜好文學意向；如：〈上兵部李侍郎書〉云：

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奮發乎文章⁶⁷。

從其詩文作品中觀之，當知其所言不假。韓愈除了有超凡之創作成就之外，其文學創作主張亦十分明確。雖然這些主張大多針對其古文，但卻也或多或少對其詩歌創作發生引導作用。因此，本節擬從韓愈「文以載道」、「不平則鳴」兩項文學創作觀中探析，期能藉此詳察韓愈在其貶謫詩中所隱含之文學觀念。

(一)「文以載道」之文學主張

我國之文學觀念，到了南北朝已漸趨明朗，但因時代與文化因素，致使唐宋兩朝，又回復至與周秦時代渾合無別的復古狀態，以古昔聖人之思想作為文學評價標準。

六朝時期的駢體文華麗，講究對偶，使得許多文人都失去創作散文之能力。唐初時，陳子昂便力矯六朝逶迤頹廢之「緣情」文風，力圖將文拉回「言志」的老道上，開啓了唐代「文以載道」的先河。安史之亂後，「文以載道」之呼聲日漸提升，但積習已深，「緣情」的觀念已成為文壇的主流意識，「言志」的觀念卻仍停留在老路上，未能隨著社會現實的發展迅速改變，所以，中唐「文以載道」之呼聲雖高，但卻不能有效地付諸創作實踐。直至韓愈的引領，古文運動才隨之蓬勃發展，而韓愈的成功，在於他能吸收「緣情」的觀念，且順應歷史的發展而改變「言志」的觀念，情志並茂地開創了儒家散文的創作路線。

而「師法古文」的韓愈在〈上宰相書〉中就自稱：「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

⁶⁷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上兵部李侍郎書〉《韓愈全集》，頁 166。

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感⁶⁸。」而〈答李秀才書〉中亦云：「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⁶⁹。」〈答陳生書〉云：「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⁷⁰。」〈題歐陽生哀辭後〉云：「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⁷¹。」從這些言論中，不難察覺韓愈讀古文是爲了學古道，而著古文則是爲了宣揚古道。而他所謂的「道」，指的即是一脈相承的儒家傳統的聖人之道，他在〈原道〉一文中即寫道：

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⁷²。

其所謂的「文」，則是指通行於周秦兩漢之散體文章。韓愈非常講求文章需有充實的內容，「文」要爲「道」而服務，但他並未本末倒置，他主張「文」與「道」兩者應相結合；而這又與其年少時從學的唐代古文家獨孤及、梁肅、蕭穎士、柳冕等人推崇經史及強調文章應負起教化作用之論點旨趣相謀。

而韓愈對六朝的駢文多所批評，堅決的反對駢體浮豔的習氣，在〈送孟東野序〉中便寫道：

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⁷³。

魏晉以後的文學爲什麼「鳴者不及於古」？原因在於其缺乏思想情感，脫離現實，

⁶⁸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上宰相書〉《韓愈全集》，頁 171。

⁶⁹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答李秀才書〉《韓愈全集》，頁 179。

⁷⁰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答李秀才書〉《韓愈全集》，頁 179。

⁷¹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題哀辭後〉《韓愈全集》，頁 224。

⁷²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原道〉《韓愈全集》，頁 122。

⁷³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送孟東野序〉《韓愈全集》，頁 202。

感受不到現實萬物的刺激，因而，只停留在形式上下功夫。所以，韓愈大力提倡古文，他認為文風應樸實，不應以注重雕琢，對當時之文壇，產生極大之衝擊。

韓愈所提倡之古文既與唐代社會之文風大相逕庭，所以，其文章之評價標準，亦與常人不同。在〈與馮宿論文書〉中，韓愈曾談及此一問題：

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⁷⁴。

在此種反潮流的時代下，韓愈對能作古文的人尤為欣賞；在〈與袁相公書〉中，即讚美樊紹述「善為文章，詞句深刻，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⁷⁵。」在〈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中，讚揚侯喜「其人為文甚古⁷⁶」。在〈舉薦張籍狀〉中，稱許張籍「學有師法，文多古風⁷⁷。」而對於從事古文創作的人，韓愈對於其基本條件及寫作方法，亦有其獨到之主張，在其〈答劉正夫書〉一書中便寫道：

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

韓愈於儒家思想傳統中，認定古文作者的弘道功能，韓愈繼承了此種觀點，認為宏揚儒道，有賴於善寫文章之人，而這個善寫文章之人，除了在文章寫作方面能夠獨立創造外，還要能不因循前人之文的人。所以，綜觀韓愈「復古」主張，除了要「師法於古」、「務去陳言」之外，還要「文以載道」才能達到教化的有效目的。

(二)「不平則鳴」之詩文創作觀

⁷⁴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與馮宿論文書〉《韓愈全集》，頁 188。

⁷⁵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與袁相公書〉《韓愈全集》，頁 197。

⁷⁶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韓愈全集》，頁 322。

⁷⁷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舉薦張籍狀〉《韓愈全集》，頁 341。

「不平則鳴」的理論是中國古代的一個重要文學思想傳統，然而像這樣帶有批判精神的文論，並不單單只是韓愈這個時代才有。韓愈「不平則鳴」說的產生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溯其淵源，主要受到以下幾個思想的影響：

1. 「興觀羣怨」說

孔子的詩學理論「興觀羣怨」說源自於《論語·陽貨》，其內容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⁷⁸。」

這一理論對後世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其中「怨」這個字，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批判精神的源頭。孔子在這裡是將「怨」設定為詩歌的基本功能之一，「怨」包含了雙重的意義：一個是對違反仁道之人的「怨」；另一個則是對君子在道之不得行，遭遇挫折打擊時的「怨」。所以，孔子明確表達了文學藝術應該而且需要將心中的不滿與牢騷表現出來。儒家思想中民主進步因素的體現，表現在用詩歌抨擊「不仁」的現象；而韓愈在思想上尊崇儒學，所以，孔子的「興觀羣怨」說可以說是其「不平則鳴」說最早的思想淵源了。

2. 「發憤」說

「發憤」說在《詩經》時代已初見端倪；如：〈豳風·七月〉、〈豳風·東山〉、〈魏風·伐檀〉、〈魏風·碩鼠〉、〈小雅·何草不黃〉和〈小雅·正月〉等都是屬於洩憂抒情之作，傾訴胸中的憂憤與不平。但直至屈原時，才明確的提出「發憤以抒情」的說法的人，在他的代表作品《離騷》和《九章》中的〈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和〈悲回風〉中，都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可見屈

⁷⁸陸貫遠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十三經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頁156。

原的許多優秀作品都是遭到打擊壓抑之後的發憤抒情之作。而到司馬遷時，更是將「發憤」的精神發揮到了極致；他從自身遭遇的痛苦與屈辱，以及在極度悲憤中、聯想到前人先前多因己身困厄坎坷，不得其志，而情感鬱結發憤著書以抒發心中悲憤。其強調文學的怨憤不是無病呻吟，而是有感而發，通過「述往事，思來者」表達對現實的認識，對未來的期望；司馬遷的「憤」也不是個人狹隘之私憤，而是堅守良知、伸張正氣，維護正義的「憤」。「發憤」說體現了鮮明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深刻影響著後世那些堅持正義、關心國社稷、民生疾苦的優秀文人，也為韓愈「不平則鳴」說的產生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韓愈「不平則鳴」的文學觀點，主要見於《送孟東野序》文中開宗明義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不平則鳴」是宇宙間的普遍現象，無論是在自然界，還是在社會生活中，不管是人還是物，只要遇到「不平」就要「鳴」，這是他從文學與現實的關係層面而提出的。他認為文章來自於作者對現實生活的感受，是作者生於外界的情感鬱積。只有在坎坷失意、悲憤抑鬱中，才能深深感觸到時代的脈動，寫出深刻反映社會現實之作品。而對於不同的現實閱歷、所產生的思想情感的「鳴」也不同，他在〈荆潭唱和詩序〉中就寫道：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⁷⁹。

他認為王公貴人位居上流社會，志得意滿，無「不平」之感，很難寫出激動人心的作品；而羈旅草野之士，歷經窮乏，坎坷不遇，在悲憤抑鬱之中，才能深刻體察世態；所以說，處境困厄者，較之仕途順遂者，更有機會寫下佳作；所以，對現實的認識與感受，是決定作品成敗的關鍵。這是韓愈對「不平則鳴」之觀點的具體化，也是自己創作實踐的總結。他從「不平則鳴」的文學觀點出發，進一步把文人的生活、思想、創作動機與現實社會聯接起來，把「文」作為鳴不平的工具；這其實是把「文以明道」與對社會現實的揭露加以聯繫，並成為「明道」的

⁷⁹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荆潭唱和詩序〉《韓愈全集》，頁 212-213。

一種具體說明和補充，也就是說，韓愈把詩文，當成是「鳴不平」的工具。

綜合以上的論述，韓愈的「不平則鳴」上承孔子的「興觀羣怨」、屈原的「發憤抒情」和司馬遷的「發憤著書」等理論，且無論是從韓愈所處的時代，所經的人生歷程，還是韓愈的文學創作實際角度，都可以得出基本的結論，那就是「不平則鳴」的理論內涵是「不得志」、「不公平」、「不得意」所引發的憤悶哀怨和精神苦悶。

綜觀韓愈的文學主張；他爲了使皇權得以鞏固，唐代得以復興，社會得以保持安定，他致力於提倡古文運動，而其核心思想即是道統思想，他意圖藉由道統的復興，以恢復儒家所提倡的政治倫理秩序。因而，他基於政治上的需要提出「文以載道」；韓愈認爲要繼承古人之道、恢復道統，古文是最佳利器，是載道之具。所以，韓愈爲了經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倡導古文運動，進行文體文風的改革。所以說，韓愈所提出的古文理論以及他所有的創作實踐都是爲恢復儒家的道統服務的，這其中也包括了「以文爲詩」的創作實踐。

第二節 韓愈的反佛思想與主張

唐代，是我國歷史上中外文化交流最活躍、最開放的重要時期。它視野廣大，能以開濶胸襟與各外來文明接觸及融合，國力極爲強盛。在國家中，經濟表現空前的繁榮，在文化方面也得到高度的發展；是中國傳統官場制度達到鼎盛的時期。唐代統治者在意識形態上表現出開放的氣度，容許各家各派的發展，所以，在大唐王朝社會中，儒、釋、道三教是處於並存的局面。且由於佛學具有一套獨特的心性理論，契合了當時人們的心態；道教也因與皇室之特殊因緣又藉著「神仙長生」之名，使得佛、道兩家在唐代社會迅速傳播，甚至凌駕於儒學之上，對國家社會的影響也日益擴大，對經濟、文化和政治所造成的問題一一浮上檯面。佛、道兩家所造成的弊端及對儒家思想地位的威脅，引起了士人們的高度警覺，紛紛進行抗爭，反佛聲浪不斷出現，各朝代皆有之。

在韓愈以前提出反佛者有：傅奕、狄仁傑、張成珪、李嶠、辛替否、韋嗣立、

李义、魏知古、崔湜、韋湊、張鎬、姚崇、李叔明、彭偃和桓彥範等人，這些朝臣針對佛教對國家造成的影響提出包含兩個方面的主張⁸⁰：由於營建寺觀大興土木，耗費鉅資，以致於造成百姓生命財產與國家經濟的沉重負擔；二、僧道濫用特權，享有大量的社會資源，過著豪奢的生活，嚴重危及國家財政；且因僧尼不守戒律，干擾時政，擾亂朝廷綱紀；所以，這些官員一致要求君主停止一切不必要的佛事，將佛教對國家的危害減至最低。

韓愈生長在佛教發展鼎盛的中唐時期，且其一生經歷的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五位皇帝，大都崇佛；且在「上行下效」的作用下，上至朝廷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瘋狂的迷戀佛教，致使儒家傳統文化被棄置在一旁，對此現象，韓愈甚感憂心，每每在其詩文中對佛教的虛偽加以揭露與嘲諷，如其〈和歸工部送僧約〉一詩中寫道的：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受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⁸¹？

詩中嘲諷做為一個出家人卻比一個未修行的凡人還忙，究其終日為何而忙？「名利」是也！在〈廣宣上人頻見過〉詩中亦對佛教徒提出嘲諷，詩曰：

三百六旬長擾擾，不沖風雨即塵埃。久慙朝士無禪補，空愧高僧數往來。
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回。天寒古寺游人少，紅葉窗前有幾堆⁸²？

詩中以「高僧」稱呼廣宣，更顯諷刺；廣宣奔走於各公卿大夫之門，實為一趨炎附勢之徒。這兩首詩中的僧約與廣宣，二人雖為佛教徒，但卻為逐利求名干謁權貴之士，對這一類的僧侶韓愈極為不恥。

而韓愈為打擊釋、道二教，提出儒家的道統說藉以拉抬儒學之地位。其反佛主張與思想主要側重在兩方面：一是對國家社會經濟的拖累，二是破壞倫理綱常；下面將就這兩方面分別進行探究：

⁸⁰參考崔文靜，〈韓愈的反佛主張及其影響〉，(重慶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⁸¹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和歸工部送僧約〉《韓愈全集》，頁32。

⁸²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廣宣上人頻見過〉《韓愈全集》，頁334。

一、對國家社會經濟的拖累

唐代社會，由於僧尼道士的人數遽增，他們不勞而食、不工而用器、不出粟米麻絲。對於這點，韓愈認為這些僧尼、道士最終必會造成人民的生活貧困及社會的紛擾動蕩。他在〈送靈師〉中寫道：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⁸³。

佛教東傳六百年，社會上逃避賦役、高士隱居、放任官吏自由發展之情形隨處可見。以致於農田沒有耕種的氓隸，朝廷中也缺乏賢才之人。佛教橫行對中國帶來的後果韓愈深感憂慮。

而「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⁸⁴。」「假僧偽尼」躲進寺院，成為寺院中寄生的一群，寺廟成為逃避徭役賦稅的主要場所，對國家的政治、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傷害。韓愈在〈進士問·其十〉中就問道：「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⁸⁵？」究年豐卻民貧，寺院經濟實為一大主因。在〈原道〉中韓愈便從佛老盛行所造成的經濟危機論起：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⁸⁶！

從前社會，農人、工人和商人從事生產及交換，儒家的知識分子負責社會管理與教化工作，但如今又多出了佛、道二教的加入。現在一戶農民要養六家的糧食，

⁸³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送靈師〉《韓愈全集》，頁 19。

⁸⁴司馬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七)·卷一百九十一》，頁 6695。

⁸⁵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進士問·其十〉《韓愈全集》，頁 153。

⁸⁶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原道〉《韓愈全集》，頁 120。

一戶工人要供六家的器具使用，一戶商人要資養六戶人，這樣百姓生活必更加的困苦，而爲了生活只能淪爲盜賊，如此一來，將會造成社會的動蕩不安。所以，韓愈擬出了反佛老的具體措施：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⁸⁷。

將僧尼還俗，並令其加入勞動行列，擔負農民應盡的義務；把寺觀廟宇都改爲民房，讓僧人無安身之處；焚毀佛書阻絕其思想的傳播；唯有如此，先王之道才得以施行。韓愈對於佛教的深惡痛絕、除之爲快的心意在文中表露無遺。

而對於韓愈辟佛的原因，陳寅恪先生在其〈論韓愈〉一文中亦對提出精辟的見解：

蓋唐代人民擔負國家直接稅及勞役者爲「課丁」，其得享有免除此種賦役之特權者爲「不課丁」。「不課丁」爲當日統治階級及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徒，而宗教徒之中，佛教徒最佔多數，其有害國家財政、社會經濟之處在諸宗教中尤特著，韓愈排斥之亦最力，要非無因也⁸⁸。

陳先生之研究亦同樣指出，韓愈反佛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佛教徒「不課丁」，危害國家財政、社會經濟。所以，韓愈極力的黜佛，原因實由於佛教對國家、社會經濟及百姓的生活造成極大的破壞與影響所致。

二、破壞倫理綱常

韓愈以維護儒家倫理綱常爲己任，旗幟鮮明的批判佛老。藉著「貴中華賤夷狄」的傳統觀念，詈罵成辭：

⁸⁷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頁 122。

⁸⁸陳寅恪著，〈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290-291。

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⁸⁹？

其站在中國儒家文化為本位的立場下，稱呼佛教為「夷狄」，直接否定了佛法至高無上的地位；將釋教稱之為「夷狄之教」，在情感上就有鄙夷、排拒之意。他在〈論佛骨表〉中寫道：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⁹⁰。

韓愈斥責佛教為「夷狄」，不僅語言、服飾及行為上都不符合先王之教，亦與中國傳統文化大相逕庭，儒家的文化一直代表著中國傳統宗法的文化，它從宗法制度中的親親和尊尊去辨親疏和分貴賤，企圖建立上下、尊卑的社會層級倫理關係，以維持現實社會活動的規律進行，從而保持家庭的和諧並進而達到維護社會統一和穩定的目的。但是釋教卻不知君臣、父子等倫理綱常；「孝親尊長」的觀念是中國人傳統倫理的核心，但釋教卻主張不拜父母，強調無父、無君，鼓勵毀身削髮，這些作法都與傳統的中國文化格格不入。李翱在〈去佛齋〉中即寫道：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⁹¹。

在浮屠尚未傳入中國時，中國尚可保持人與人之間基本的倫理道德，但佛教傳入後：

⁸⁹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與孟尚書書〉《韓愈全集》，頁 194。

⁹⁰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論佛骨表〉《韓愈全集》，頁 335。

⁹¹李翱，〈去佛齋〉《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李文公集》，（上海商務印書館），頁 16。

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鱉、蛇龍之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者，則非聖人之道也⁹²。

其倫理道德明顯的悖離儒家的倫理綱常，祂違反了封建社會中的宗法制度，其結果將導致國家社會的混亂，造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會亂象。

「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⁹³。」而且佛教無君臣、父子之禮、不事嫁娶婚配，以追求個人的解脫、遠離痛苦以達清靜寂滅的目的，這與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產生嚴重的抵觸。所以，佛教的傳入，破壞了中國的倫理道德綱常，破壞了傳統的育人文化。韓愈在〈與孟尚書書〉中就寫道：

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七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⁹⁴。

孟子時代，由於楊、墨思想的橫行，使得聖人之道遭致埋沒，儒家文化的禮樂制度也遭到破壞。在文中其繼續寫道：

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

⁹²李翱，〈去佛齋〉《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李文公集》，頁 16。

⁹³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原道〉《韓愈全集》，頁 121。

⁹⁴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與孟尚書書〉《韓愈全集》，頁 194。

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⁹⁵。

時看今日，佛教之危害過於楊、墨之禍；孟子在儒學尚未亡失之前，雖大力辟楊、墨，但也僅能使聖人之道維持大致的輪廓；如今，儒學幾近全毀，而自己卻自不量力的要來振興儒學。而應如何做才能使國家恢復常軌呢？韓愈在〈原道〉篇就指出：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無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⁹⁶。

欲使國家社會恢復正常軌道，唯有奉行聖人之道，先意誠才能正心、心正後才能修身、身修後才能齊家、家齊後才能治國、國治後才能平天下；反之，若接受佛教「棄仁絕義」的思想，國家終將走向衰敗。

韓愈從維護統治者的立場出發，指責佛教是「夷狄之教」，因為祂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綱常，危害國計民生。所以，他除了從文化、經濟方面考慮外，亦從國家政治的觀點來看；將釋教視為「夷狄之教」而黜之，除了為維護國家的安定外，最重要的是，安史之亂以後，中唐政治一直為藩鎮之害所困，他希望藉由「攘夷」而行「尊王」的主張；表面上是斥佛，實際上則是希望這些藩鎮們能謹記「先王之教」，謹守「君臣之義」，千萬勿做「擾華之夷」；從這也看出韓愈亦將藩鎮、軍閥看成是「夷狄」，抱著必削平藩鎮、維護朝廷的堅強決心。

佛道勢力的昌盛，使得唐代一直浸淫在濃厚的宗教氣氛中，對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的影響也日益擴大，朝臣間反佛道的風氣也漸次形層成。從韓愈的反佛立場與其之前朝臣的反佛立場的分析中，筆者發現：韓愈之前朝臣們的反佛道言論尚未形成個人思想，故未能對君王、百姓的崇佛信道風氣造成實質的影響；直至韓愈，反佛道諫表的上書動機，已逐漸由就事論事轉變為個人思想的一部分。佛老盛行

⁹⁵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與孟尚書書〉《韓愈全集》，頁 195。

⁹⁶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原道〉《韓愈全集》，頁 121。

後，社會所顯現的亂象，以及危害了本土的文化，使得韓愈興起了強烈的危機感與責任感，而且，他認為現今國家社會中人民的種種迷失，全都由於君主帶頭崇佛的結果，所以，他認為救國必先抑佛，而抑佛則必先正君。而對於這禍國殃民的佛、道教，抱持必將其「斬草除根」的想法，一舉拔除君主對佛老的迷思，使中國回歸中原本土的文化，重建文化與社會的秩序。他建立的道統說及心性論，便是其為重振儒家思想，以及與佛老思想相對抗而提出的。所以，韓愈的反佛，除了具有政治、經濟的救亡圖存意義外，更具有為中國文化的救亡圖存意義。

第三節 韓愈貶謫潮州事件之始末

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人們常將其簡單的歸因於與此事件有直接因果關係的人、事、物上。可是，這常常只是從外顯的性質上去理解，通常也容易因為這些表面的現象，而忽略掉事情的內在本質。研究歷史的人不能被這表面的現象所迷惑；只有透過這些現象來細看本質，才能尋獲隱藏在重大歷史事件背後的根本原因。而韓愈究竟為什麼會被貶謫至潮州？根據歷代史實學者的研究，皆直指其原因莫過於上書〈論佛骨表〉所惹的禍；但此時的韓愈，由於平淮西之功，正是憲宗跟前的紅人，何以會因一封奏摺而差點惹來殺身之禍？其背後是否仍有其它的因素存在？則為本節欲探究之重點。首先，我們先從韓愈當時所處社會現象說起。

一、「貶潮」之近因

憲宗時期，崇佛風氣極其盛行；元和十三年，功德使上疏諫迎佛骨：「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⁹⁷。」翌年，憲宗奉迎佛骨，據《舊唐書·韓愈傳》中的記載：

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臬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

⁹⁷司馬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八）》，頁 7756。

後。百姓月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⁹⁸。

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全國上下為這一節佛骨狂亂痴迷，可說是唐立國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宗教狂熱。但對此一現象，眾臣卻不言其非，御史也不舉其失；因為群臣和御史全都知道憲宗奉迎佛骨的「居心」，除了祈求歲豐人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為自己祈福，延年益壽。對於這種崇佛的景象，當時任職刑部侍郎的韓愈，深感憂慮。他本著道統傳承者的使命感，決定上疏諫言，痛呈佛教之危害；呈上〈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湯孫太戊在位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女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舍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台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⁹⁹！

文中韓愈明白的指出，在佛教尚未進入中國以前，歷代帝王皆國祚綿長且壽考恆久；但佛教流入中國以後，諸朝代亂亡相繼而生，國祚短促。其中所舉梁武帝之例，更讓人聞之心驚，似在詛咒憲宗「事佛」則必「年促」一般。憲宗看到諫表，極為震怒，本欲將其賜死，後經忠直的宰相裴度、崔群等眾臣的求情：「愈雖狂，

⁹⁸劉昫撰、楊家駱主編，〈韓愈傳〉《舊唐書》，頁 5256。

⁹⁹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論佛骨表〉《韓愈全集》，頁 334。

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¹⁰⁰。」憲宗回應：「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為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¹⁰¹。」憤而將韓愈貶謫至蠻荒之地，任潮州刺史之職。但從憲宗的話語中可以得知，韓愈之所以獲罪，是由於其言論乖刺，各帝王奉佛之後「咸致夭促」之語，失了人臣之禮，故不可赦。韓愈不是第一位振臂疾呼反佛道的朝臣，也不是唯一信念堅定的反佛道朝臣，但是他卻是第一位對君主迷信佛道採取激進方式對應的朝臣，他的〈論佛骨表〉也差點讓其惹來殺身之禍；但其貶謫潮州的原因，真的只如前述研究，因其「言論乖刺，失了人臣之禮」所致？事情似又未必如此單純，根據卞孝萱先生的研究指出：「人們都認為韓愈因《論佛骨表》而貶潮州，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其實，《平淮西碑》被廢，李逢吉、令狐楚、皇甫鏞一方與裴度、韓愈一方的爭鬥，才是韓愈貶潮的深層次的政治原因¹⁰²。」所以，從卞先生的研究中得知：〈論佛骨表〉只是造成韓愈潮州之貶最直接的一個原因；而事實上，早在淮西之役便已埋下兩集團爭鬥之種子，「平淮西碑」則是引發貶謫事件的爆點。所以，欲了解韓愈的〈平淮西碑〉之辱，筆者先從淮西藩鎮之前後的政治動向、人事變動、人文背景談起。

二、「貶潮」之遠因

(一)「淮西之役」的兩集團¹⁰³之爭

元和九年九月淮西節度經略使吳少陽死，子吳元濟自立，並與淄青節度經略使李師道勾結，與朝廷為敵。元和十年憲宗命宰相武元衡主持討伐淮西的事。後武元衡遭李師道所派之刺客所殺，裴度受傷，待裴度傷癒後，憲宗以裴度為相，繼武元衡主持討伐淮西的事。「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

¹⁰⁰司馬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八）》，頁 7759。

¹⁰¹劉昫撰、楊家駱主編，〈韓愈傳〉《舊唐書》，頁 5259。

¹⁰²卞孝萱，〈韓愈貶潮原因探幽〉，（南京，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5 年第 2 期），頁 128-131。

¹⁰³李逢吉集團成員：李逢吉、令狐楚、李愬、皇甫鏞。

裴度集團成員：裴度、韓愈、崔群、馮宿。

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¹⁰⁴。」裴度認為此役可戰，但宰相李逢吉持不同意見反戰。韓愈力挺裴度，亦上疏諫言：「以三州殘弊困刻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與不斷耳¹⁰⁵。」指出以三州殘弊之狀況，戰勝之事必指日可待。但李逢吉因憂裴度淮西之役立功，便處心機慮，從中作梗，「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¹⁰⁶。」伐蔡之役且勝且敗，羣臣爭相諫言停止討伐之事：

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¹⁰⁷。

但所謂的「漢賊不兩立」，裴度志向堅定，抱著必平賊而後已的決心，堅持征戰：

制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處置等使，仍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朝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崔羣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刑部侍郎馬總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以太子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以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侍御史，為判官書記；從度出征¹⁰⁸。

於是，憲宗任命韓弘、韓愈、崔羣、馮宿等人隨同裴度共同伐蔡。此時李逢吉集團又開始思索，如何行破壞之事：

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怏怏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窒疑間之嫌¹⁰⁹。

¹⁰⁴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韓愈傳〉《新唐書》，頁 5258。

¹⁰⁵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韓愈傳〉《新唐書》，頁 5258。

¹⁰⁶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李逢吉傳〉《新唐書》，頁 5221。

¹⁰⁷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裴度傳〉《新唐書》，頁 5211。

¹⁰⁸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憲宗本紀〉《新唐書》，頁 460。

令狐楚因受到皇甫鏞的引薦，被憲宗召為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負責擬詔之事，而令狐楚與李逢吉素有交情，令狐楚配合李逢吉的計謀，在制詔中埋寫下不實之言：

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經略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為中書舍人。俄出為華州刺史¹¹⁰。

此一舉動，幸經裴度發現，及時修正，令狐楚之陰謀始未能得逞。令狐楚與李逢吉兩人沆瀣一氣，不出手幫助裴度伐蔡之役，還屢屢從中阻撓，憲宗得知後，憤而將李逢吉貶為劍南東川節度經略使；而令狐楚則被暫停翰林學士之職位，旋即出任華州刺史。在討伐淮西這件大事上，雙方的爭鬥，李逢吉集團暫時屈居落敗的一方；裴度集團與李逢吉集團之矛盾、嫌隙也自此而起。

(二)「平淮西碑」的兩集團之爭

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戰役平定之後，憲宗請韓弘和裴度列出有功的將士名冊，並依此論功行賞：

以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度守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以蔡州留後馬總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彰義軍節度經略使、澗州潁陳許節度經略使。丙子，以右庶子韓愈為刑部侍郎¹¹¹。

¹⁰⁹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裴度傳〉《新唐書》，頁 5211。

¹¹⁰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令狐楚傳〉《新唐書》，頁 5099。

¹¹¹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憲宗本紀〉《新唐書》，頁 462。

元和十三年(西元818)正月十四日，韓愈奉憲宗之命撰〈平淮西碑〉。韓愈其知茲事體大，慎而為之。到了三月二十五日，韓愈所撰的碑文完成，上呈，受到憲宗的讚賞，詔以副本分賜立功諸將領，並將其豎立在紫極宮。韓弘還寄絹五匹讓韓愈充當人事費用。然而樹碑不久，李愬之妻卻到宮中訴碑文之不實。憲宗於是下了詔令，磨去韓碑，並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新鐫刻。韓愈殫精竭慮，精心撰寫的一篇頌揚淮西之役的文章，被憲宗完全的否決，韓文的名譽遭受詆毀，也讓其內心蒙受巨大的屈辱。

因阻撓裴度討伐淮西，被罷相出朝的李逢吉，伺機等待，終也等到了報復的這一天，〈平淮西碑〉之糾紛讓兩個集團的爭鬥再度掀起。依《舊唐書·憲宗紀》的記載：

甲辰，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度支。是時，上切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羣情驚駭，宰臣裴度、崔羣極諫，不納¹¹²。

憲宗欲以皇甫鏞為相，裴度、崔羣等大臣極力勸諫，但未能獲得憲宗之採納。根據《新唐書·皇甫鏞傳》中的記載：

鏞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及表罷政事，極論鏞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相。……。」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鏞與程異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為奧援，故帝排眾論，決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內其言¹¹³。

上顧謂宰臣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¹¹⁴！」

¹¹²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憲宗紀下〉《舊唐書》，頁464。

¹¹³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皇甫鏞傳〉《新唐書》，頁5113。

¹¹⁴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憲宗紀下〉《舊唐書》，頁465。

由於皇甫鏹對憲宗百般奉承，此時的憲宗明顯偏袒皇甫鏹這一方；斷然的指裴度搞朋黨，但卻絲毫不懷疑李逢吉、令狐楚、皇甫鏹、程異等人結黨營私。此時兩集團的爭鬥明顯以李逢吉集團暫居上風。而元和十四韓愈的〈論佛骨表〉，讓皇甫鏹喜握把柄，一舉將馮宿¹¹⁵及韓愈趕出朝廷。韓愈到達潮州後，呈上謝表：

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天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¹¹⁶。」

收到謝表的憲宗本欲再用韓愈，但「皇甫鏹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¹¹⁷。』」由於皇甫鏹唯恐韓愈再受重用，將對自己不利；於是，落井下石，讓其不得回朝，僅得量移至袁州。兩集團的爭鬥在〈論佛骨表〉事件上達到高潮。

所以，筆者從上述的研究分析中得出一結論：韓愈的潮州之貶實由於裴度集團與李逢吉集團兩集團之爭鬥所造成的結果；而「爭鬥之鑰」始於淮西之役，〈平淮西碑〉則是最後引燃「爆點」的那個「引信」，而那個「爆點」則是〈論佛骨表〉；所以說，〈論佛骨表〉是壓垮裴度集團的那最後一根稻草，使得集團中的韓愈只得遠貶異鄉，到那瘴癘之地潮州。

綜觀韓愈的一生，筆者以為，他奮發向上，立定志向，便不屈不撓，勇往直前。他忠君愛國，擇善固執，面對國家危難，總是不計利害，挺身而出。他遺留給世人的珍寶，不僅是古文運動的成就，還有他散文與詩歌的創作，以及他那傳之不朽的奮鬥精神與剛直不屈的生命典範。

第四節 唐代貶謫詩的背景

一、中國官場的貶謫文化

古代的知識份子由於受到儒家入世文化及為官輔國風氣的影響，大多是以「修

¹¹⁵劉昫撰、楊家駱主編，〈馮宿傳〉《舊唐書》：「韓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為歙州刺史。」頁 4389。

¹¹⁶劉昫撰、楊家駱主編，〈韓愈傳〉《舊唐書》，頁 5262。

¹¹⁷劉昫撰、楊家駱主編，〈韓愈傳〉《舊唐書》，頁 5262。

齊治平」的經世治國理想為其人生價值的最高目標，而為實現其人生的最高價值，「出仕做官」則為其憑藉的手段與工具。然而一心汲汲營營努力求取功名的讀書人，並非每個踏上仕途後便能平步青雲，殊不知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在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裡，當他們肩挑正義，為民請命、或是為匡正時局，振臂直呼、或是以剛毅忠正的態度，疾言直諫的同時，貶謫命運正一步一步的悄悄接近。

貶謫是指朝廷官宦文人遭降職，被派到遠離京城的地方。遠從堯舜時代《尚書·虞書·舜典》中便已有記載：「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服¹¹⁸。」而《左傳》文公十八年亦有云：「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¹¹⁹。」所以，在中國，遠從堯、舜、禹時代起，貶謫現象便早已存在了，貶謫這個懲罰制度，是中國傳統官場所特有的文化現象。但這些在朝為官的文人何以會受到貶謫的遭遇，究其原因，約略可分為以下五類¹²⁰：

第一類：因犯罪而致流貶，如：王勃，因藏匿犯了死罪的官奴，又恐事跡敗露，因而將其殺害，於是被自虢州參軍中除名；其父親也因而被牽連，被貶為交趾令。

第二類：在黨爭或政治鬥爭中遭貶謫者，如：張九齡，本是深受玄宗器重的臣子，且在詩壇上與玄宗亦多所唱和，但在李林甫讒言陷害下，被貶為荊州長史。在其貶謫之後，寫下的組詩〈感遇〉十二首，詩中盡訴自己內心深處的幽怨不平之情及在政治路上的不得志與失落之感。

第三類：是因疾言直諫因而觸怒皇帝或權貴而遭貶的，如：中唐時期的白居易忠直敢言，在元和十年，以因越職上書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被貶為江州司馬，他在貶謫地寫下中唐最優秀的歌行體詩歌〈琵琶行〉，詩中他借淪落天涯琵琶女的遭遇，來抒發自己被貶及在政治舞台失意的失落與痛

¹¹⁸ 陸貫達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十三經古注》，(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頁84。

¹¹⁹ 李顯才刷印《十三經注疏·左傳》，(台北：藝文印書館印行，1955年)，頁355。

¹²⁰ 根據蔡振念，〈沈宋貶謫詩在詩史上之新創意義〉《文與哲》云：「貶謫原因約可得數端：一、因黨爭或政局變革而遭貶，二、因株連而遭貶，三、因觸犯刑罰而遭貶，四、因上書言事被貶。」2007年第11期，頁239-240。筆者根據其分類意識，再參酌唐代的貶謫狀況，再細分為五類。

楚。

第四類：因株連而遭貶者，如：盛唐著名詩人李白；安史之亂後，大唐王朝朝廷岌岌可危，於是，李白便跟隨永王李璘起兵勤王，永王李璘失敗後，李白亦被株連，被流放至夜郎（今貴州一帶）。

第五類：因政治革新失敗而貶謫者，如：中唐劉禹錫，在其二十三年的貶謫生涯中，身心靈背負著巨大的創傷，從作品〈紀南歌〉中就能深刻的感受到其抱負不得施展的抑鬱感傷以及對統治者寵信宦官，但對參與改革的人卻進行殘酷迫害的憤懣之情。

從上述的分類中可知，官員遭貶的原因複雜，而且無論是何種原因的貶謫，都是不幸之事，尤其是貶謫到荒僻之地，更讓貶謫者身心處於極大的折難。

二、唐代貶謫之風氣

唐宋時期，貶謫流放之風氣達到了最高峰。根據《資治通鑑》卷二百零四中的記載，在武后永昌元年：

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恐于家。監刑御史房濟富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譽於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者甚眾¹²¹。

周興誣奏魏玄同欲刺殺太后，後來魏玄同被殺，而與其相交之人，人人自危，被禍及而致流貶者甚眾。而武后病篤，中宗即位後，對武后寵信之人亦大加撻伐，據《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中的記載：

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

¹²¹司馬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七)·卷二百〇四》，(台北：天工書局印行，1988年)，頁6460-6461。

之之黨也¹²²。

神龍元年，將倍受武后寵信的張昌宗、張易之及依附張氏兄弟之人皆施予貶謫之罪，人數多達十餘人；又如開元年間，張說、張九齡罷相，受二人提拔者有許多受牽連而被貶；而由於安史之亂的發生，玄宗不得已遜位，稱太上皇，肅宗在亂事中即位，玄宗的一千老臣也被藉故外放；順宗即位後，有意改革朝政，任用王叔文，號稱永貞革新，然而不過數月，順宗被逼退位，王叔文及其任用的一群人同日被貶，史稱『二王八馬』¹²³事件；而憲宗元和年間，李宗閔與牛僧孺參加制舉，在對策中指切時政，兩人同樣登第，宰相李吉甫向憲宗泣訴，於是復視的考官裴垍等被貶，開啓了四十餘年的牛、李黨爭¹²⁴序幕，最後李德裕被貶死在崖州。所以，在近四百年的唐代，文人在朝爲官時，遭貶謫之禍的事時有所聞，遭流放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¹²⁵，皆爲其它朝代無法比擬的。而這些流貶的官員被流放的地區十分廣泛，從關中到蠻荒瘴癘之地皆有；能留在關中、河洛或附近州縣城的都是那些罪刑較輕者；其他的往往是被謫放至窮鄉邊陲，極其荒涼之地；若是重罪被嚴遣者，則是限日起程，沿途不得停留，行旅過程中極其艱辛，對貶謫者的身心也產生極大的考驗；如：韓愈貶謫潮州即是一最佳的例證，女兒病死於貶途中，僅能草草將其葬於路邊¹²⁶；貶官再加上失去愛女，這又怎能不讓其更覺哀怨呢？

且根據古永繼在《唐代嶺南地區地區的貶流之人》¹²⁷的研究，論述了唐代流貶嶺南的人數、被流貶的原因以及流貶之人對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生活所造成的影響，他認爲這些人會被貶謫至嶺南，歸納其原因主要是由於貪贓枉法、

¹²²司馬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七)·卷二百〇七》，頁6581。

¹²³二王八馬，指中國唐順宗永貞革新失敗之後被貶斥的十位士大夫。「二王」指的是王伾與王叔文；「八司馬」指的是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准、程異。

¹²⁴在費正清、崔瑞德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中認爲：牛僧孺、李宗閔和李逢吉被當作牛黨的領袖；而李黨的領袖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紳。

¹²⁵參考王生平學，《中唐貶謫荆楚詩人詩歌主題探略》：「明代文學家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的「文章九命」說「流貶」條中，一口氣列舉了先秦自屈原以下至明代共八十三位作家，唐代詩人就占了四十八位，唐代文人被貶數量之多，由此可見一斑。」（新疆大學，2010年），頁6。

¹²⁶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潮州刺史謝上表〉《韓愈全集》：「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日二十五日到州上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36。又如〈女挈壙銘〉：「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挈年十二，病在席，即驚痛與其父決，又輿致走道，憾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峰驛，即壙道南山下。」頁313。唐代文人重罪被嚴遣謫放者，限日起程之法則從韓愈的例子中足可證明。

¹²⁷古永繼，〈唐代嶺南地區的貶流之人〉《學術研究》，1998年第8期。

思想言論得罪權貴、在鬥爭中失利、受奸佞小人所陷、親友犯罪被株連等。而這些人雖都同因罪而被流貶，但在處境待遇及影響也會因身份地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而唐代何以會形成文人官員南貶的風氣，據《新唐書·劉禹錫傳》第一百六十八卷列傳第九十三中記載：「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置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怨，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¹²⁸所以，唐代貶謫臣子之所以會遠放南貶，這一主意是由張九齡所提議的。嶺南、湖南地處荒僻，駭人聽聞的瘴癘之毒更是為人所懼。

三、文學煥發之契機

貶謫對詩人的影響，可以將其歸納為生活經歷與創作情緒，以及由此帶來的作品內容和風格的變化。當這些身受貶謫之罪的官員被強行驅逐到貶謫地，在謫居的生活環境中，除了物質生活條件匱乏外，人格上的屈辱以及在謫居地漫無止盡的等待，致使貶謫者的精神和生命承受極大的痛苦與煎熬；面對現實殘酷的人生，他們心中充滿著哀怨不平的騷怨情感。他們寄情於文學創作，通過詩文來抒解和超越現實，將心中所感、所思、所怨寫成一首首的詩，這些作品我們即稱之為「貶謫詩」。而談到貶謫詩的始源，可溯源到《詩經》；《詩經·小雅·四月》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首貶謫詩；詩云：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雲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¹²⁸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7》，(台北：鼎文書局印行，1989年)，頁5129。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告哀¹²⁹。

詩中首先述及貶謫地天候的惡劣。接著寫道：「我日構禍」，雖然因罪來到這漢北之地，但我仍堅守崗位鞠躬盡瘁，不因外物而改變自己心志；而詩末二句「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更訴說著詩人遭貶謫流放，藉由作詩來抒發內心無限的悲憤情懷。所以，貶謫是文學煥發光芒的契機；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就寫道：

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¹³⁰。

司馬遷在這段文字中寫出西伯、孔子、屈原、左丘明、孫子、呂不韋和韓非等人，皆因窮困不得志，藉由屬文以抒發胸中不平之氣與鬱悶，也因此而留下了曠世不朽之著作。而對於不平之氣的抒發，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亦道：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¹³¹！

所以，不管是司馬遷或是韓愈，他們同樣都認為，當人在遭遇人生重大挫折或苦難時，其心中的不平與鬱悶會藉由其著作或書寫來抒發；這就是「不平則鳴」，而這也是人之自然情感反應。所以，這些蒙受貶謫流放的文人，不管他們是何種原

¹²⁹ 朱熹集傳、王靜芝譯，《詩經新釋》，（台北：輔仁大學文學院，1978年），頁443-444。

¹³⁰ 司馬遷撰、婁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台南：大行出版社，1975年），頁1065。

¹³¹ 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頁201。

因受到貶謫，但由於他們身受貶謫之害，他們將心中這一切「不平之氣」付之筆端，借助詩、文等形式淋漓盡致地宣洩出來；這些詩文，有的是爲自己窮途末路的長哭；有的則是爲自己生不逢時的感嘆；有的又是對自己壯志未酬的惆悵；有的則是對朝廷 賢愚不分的憤慨，更有的是爲民生疾苦的憂傷。所以，南宋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就指出：「唐人好詩，多是征伐、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¹³²。」而事實上，最能撼動人心弦的便是征伐和遷謫這兩種人生經歷，而行旅和離別僅是這人生經歷中的衍生物罷了。試想想，當年李白若非因永王李璘案流放夜郎，在獲赦回歸後，寫下〈早發白帝城〉，人們也不會因此詩而認識李白這位大詩人。而杜甫也因被貶謫，在由洛陽去華州的路上，看到人民在戰亂中流離失所的景況，因而有了〈三吏〉、〈三別〉的問世。又如永貞革新失敗而被貶官的柳宗元，若不是因其被貶謫至永州，或許就不會有〈江雪〉、〈永州八記〉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流傳，且〈江雪〉一詩更爲後人奉爲唐人五絕之冠。而在唐代，宋之問、沈佺期、劉禹錫、柳宗元和韓愈等人之貶謫詩亦寫得十分傑出。所以說，貶謫對逐臣來說，雖是代表生命的困蹇沈淪，但卻是文學煥發光芒的契機；在他們遭貶時期，正是其文學創作最爲豐沛的階段，政治生涯失勢不得志反倒激發他們創作的蓬勃發展。所以，唐代也因貶謫現象的盛行，因而使得貶謫詩由此而鬱鬱蓬勃。

¹³²嚴羽作、黃景進撰述、龔鵬程總策畫，《滄浪詩話》，（台北：金楓出版社，1986年），頁98。

第三章 韓愈貶謫詩的內容分析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潮州之貶堪稱是韓愈人生中最重大的挫敗；他因集團爭鬥的失敗及〈論佛骨表〉被貶謫至潮州。踏上貶途，隨著與京城的距離越來越遠及貶途之艱辛，讓韓愈心靈飽受摧殘。而他亦如其他遭貶的文人一樣，將其遭貶的所思、所感、所悟在其詩文中呈現出來，其中包含對當時政治黑暗和社會動亂給百姓帶來苦難的感受，這其中包含他對家國、百姓的深厚感情，其中有悲、有喜、有怨亦有所求

韓愈在貶謫潮州期間創作的詩歌有四十三首，本章將就這些創作進行內容的探究與分析，並從詩歌中的意涵、背景與心境等加以解讀並分類，將分成四大類；分別為：乞憐自省之作、憂憤不平之作、贈別寄情之作和抒情感懷之作等；其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節 乞憐自省之作

元和十二年憲宗平定淮西之亂，韓愈因參戰有功，官祿、名位皆扶搖直上；本以為自己深得憲宗的器重，對憲宗做勿迎佛骨之諫言，必能有所成效，無奈事與願違；兩集團爭鬥之前因，再加上〈論佛骨表〉這封奏章，讓其差點惹來殺身之禍，幸經眾臣的請求，始得免除一死，貶為潮州刺史。

在經歷生死關頭後，韓愈切實的反省，且深刻的體認到自己在表章中的言論乖刺，冒犯君王。所以，貶潮之後益發謹言慎行，頻頻以「哀兵之姿」盼能早日獲赦回京，其表達回歸之方式有二：一、坦陳心跡；二、含蓄委婉；分述如下：

一、坦陳心跡

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韓愈，他關心社稷、關心民瘼，所以，「安社稷」、「濟蒼生」成為其追求的梦想與最高理想。但遠貶潮州，致使其滿腔抱負理想不得施展；而為追求其人生最高理想的實現，所以，在詩作中他以直白坦陳心跡的方式

表達其回長安的心願；茲舉具體詩例說明之。

(一)、〈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依唐朝的制度，西邊所擒之蕃囚，皆會發配至南方且不會被殺戮。在韓愈南貶的途中，從藍田入商洛於武關西時，遇到一群發配湖南的蕃囚，心中有感而發，寫下此詩。詩云：

嗟爾戎人莫慘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¹³³。

從內容上來看，韓愈觸景感懷，自覺不如「蕃囚」，「蕃囚」被發配至湖南，近長安，地理位置尚佳，還有保全活命的可能，而自己卻因言論不敬冒犯帝王，被遠貶至瘴癘之鄉，想要存有一線生機，恐是難如登天。從詩文中可以領略出，韓愈心中的罪臣意識；誠如朱彝尊對詩的評議：「借苦說苦」¹³⁴；詩中韓愈便是藉由蕃囚之苦境，來突顯自己較之更加悲苦的處境，忠臣遠不如蕃囚之嘆更顯於詩文中。詩末二句，更凸顯韓愈心中無限悲悽感及對自己前程的茫然感，雖口說自己罪重無歸望，但隱身其中所欲表達的其實是望穿秋水般的回歸心意。

(二)、〈路傍堠〉

唐代在道路的兩側每隔一里會放置一土堠，用以計算路程。在南貶的路途中，當韓愈看到這一堆堆的土堠時，引發其心中無限的感觸，於是寫下〈路傍堠〉一詩。詩云：

堆堆路傍堠，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

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吾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

¹³³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頁1101。

¹³⁴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7年)，頁509。

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¹³⁵。

見到路旁一堆堆的土塚，韓愈深深的覺得，這些土塚似乎是專門爲他設置的，但以他逐臣之身，那堪接受這些土塚的送往迎來。韓愈數著路旁「一雙復一隻」的封塚，訴說著心中的哀求。而如同方世舉所說：「此時方之潮州，乃望恩或免也¹³⁶。」本首詩蘊藏韓愈濃濃的反省和期望的意味，尤其，「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二句，因爲臣的愚昧、思慮不周才會犯上直諫，希望德行有如天地，兼及萬物的天子，能賜下恩典赦免臣的罪行；韓愈身段放得如此柔軟，語氣是如此的低下，目的只有一個 --- 希望英明的國君能撒播恩典赦免其罪。

(三)、〈次鄧州¹³⁷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

商顏暮雪逢人少，鄧鄙春泥見驛賒。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¹³⁸。

到了鄧州的韓愈，想到了賈誼僅被流貶至長沙，但自己卻要被遠謫至潮州，絕望無助之感又多添加幾分，對於長安的留戀及家人的思念之情盈溢滿懷。「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二句，據易解卦：「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解甲坼。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¹³⁹。」韓愈衷心的盼望能早日再回到京城，他冀望著王師在收復海嶽之地後，朝廷亦能再度撒播德澤，赦免自己的罪行或讓自己能量移至近長安之處，讓自己可以再報效朝廷、爲國家盡忠。

¹³⁵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2。

¹³⁶韓愈撰、文謙注、王儔補注，〈新刊經進詳註韓愈先生文集二〉《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438。

¹³⁷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 2》：「新唐書地理志：「鄧州即南陽郡，屬山南東道。」(台北：鼎文書局印行，1989 年)，頁 1102。

¹³⁸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3。

¹³⁹韓愈撰、文謙注、王儔補注，〈新刊經進詳註韓愈先生文集二〉《續修四庫全書》，頁 439。

二、含蓄委婉

在乞憐自省詩作中韓愈除以坦陳心跡的方式表達歸朝心意之外，更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達訴求；用盡心思，可見韓愈欲返朝回京的心願是如此迫切；茲舉具體詩例說明之。

(一)、〈食曲河驛〉

這首五言詩是韓愈貶謫潮州，從藍田關要進入商陵前經過鄧州，觸景傷情下所作的，詩的內容如下：

晨及曲河驛，悽然自傷情。羣鳥巢庭樹，乳雀飛簷楹。
而我抱重罪，子子萬里程。親戚頓乖角，圖史棄縱橫。
下負朋義重，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¹⁴⁰？

詩中韓愈抒發遭貶的自己被拋棄、孤寂的愁緒及淒慘的境況。感傷自己遠不如鳥雀，鳥雀都還能與家人同聚，而犯下重罪的自己，卻只能孤寂的遠行至貶謫地。接著述及自己辜負了朋友，更是愧對朝廷國君對自己的期望。韓愈感慨的說道：縱使取了自己的性命，也無法彌補自己的罪過。

韓愈對於自己無端因文辭而招致禍害，深刻的反省，反映在文辭上，下筆更是字字斟酌，立論更加嚴謹，其中悲愴之感，令人聞之鼻酸，也讓人對其處境倍感同情；蔣抱玄亦說：「下語甚有分寸」¹⁴¹。因〈論佛骨表〉的激切直諫讓自己落得貶官的下場，此時的韓愈，心中除飽含罪臣意識外，亦甚感惶恐，甚恐自己會葬身異鄉或終老在貶謫地；所以，他藉由「羣鳥巢庭樹，乳雀飛簷楹」二句，表達倦鳥都能歸「巢」，而自己卻只能謫放至蠻荒之地，人不如鳥，情何以堪？以倦鳥歸「巢」，委婉的表達自己盼能歸「朝」之心意。

¹⁴⁰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5。

¹⁴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5。

(二)、〈答柳柳州食蝦蟇〉

韓愈因〈論佛骨表〉被貶為潮州刺史；此時子厚亦因永貞革新失敗被貶至永州，在元和十年（西元816）被召回後，隨及又在十月被貶為柳州刺史。所以，聽聞柳子厚的近況，韓愈寫了此詩寄給他，詩中云：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
雖然兩股長，其奈脊皴皴。跳躑雖云高，意不離潭淖。
鳴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
我棄愁海濱，恒願眠不覺。叵堪明類多，沸耳作驚爆。
端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勾踐禮，竟不聞報效。
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撓？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
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
而君復何為，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為孝。
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權¹⁴²。

從內容上來看，韓愈以蝦蟇和蛙蛤來比喻自己與柳宗元；在團體中看起來就是特別突出。蝦蟇和蛙蛤雖有長長的兩股，但牠們身上那皴皴及呷呷的叫聲，令人生惡；跳躍雖是牠們的長項，但任憑牠們再怎麼竭盡心力的跳，卻也跳不出泥淖中；而這與韓愈和柳宗元的處境似也非常相似？才高學厚的兩人，同樣瞬間從一「朝臣」淪為「逐臣」；韓愈因疾言直諫得罪皇帝，而柳宗元則因其為永貞革新的黨人。在詩中韓愈先訴說自己食蛙之事接著再反問柳宗元，為什麼要吃豢豹之胎？雖然食蛙和吃豢豹之胎皆是南方的日常飲食，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也！所以，勸誡柳宗元應好好愛惜自己的身體才是忠孝的表現。「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權。」從字面上的意義似乎是如上所述，但事實上，則是韓愈渲洩自己對貶謫生活的厭惡和恐懼，委婉的盼望能早日得到赦免歸朝的機會，再為國、為君略盡棉薄之力。

¹⁴²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38。

(三)、〈量移袁州¹⁴³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韓愈剛接獲量移通知時，張蒙先行寄詩來祝賀，此詩是韓愈與其相贈答之作。詩云：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雁，南遷纔免葬江魚。
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起謝予。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¹⁴⁴。

詩中兩人談論著韓愈貶官、量移之事；罪未除最是痛心，頷聯中，感歎著自己人不如禽鳥，禽鳥都可向北飛，但自己卻唯有南貶始能免得一死；「北雁」對應著「南魚」呼應第二句的「遇赦移官罪未除」。「南遷纔免葬江魚」一句是引用屈原《楚辭·漁父篇》的典故：「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¹⁴⁵。」韓愈借用屈原不肯妥協的精神，表現出自己不願隨波逐流節操。接著韓愈論及自己將路過韶州，再煩請張蒙能在帝所招待，其中「上賓虞舜整冠裾」一句，亦是出自古典，出自《離騷》：「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以陳詞。」李光地在《榕村詩選》中就寫道：「末句取諸離騷所謂『跪敷以陳辭』者，有蒙難正志氣象¹⁴⁶。」韓愈雖然已獲得量移的機會，但貶謫之罪仍未消除，其心中欲北返回京、繼續報效朝廷的心願卻從未澆息。

(四)、〈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這是一首七言律詩，為韓愈量移袁州途經韶州所作。題旨所言的「留別」乃因韓愈上疏論迎佛骨而被貶潮州；三月到潮州，十月量移袁州。前往潮州及量移袁州的途中，皆有經過韶州，故於詩中寫道：「來往再逢梅柳新。」且因將離開的是自己，於是，請張使君「留」下而自己將「別」之，故寫之。詩云：

¹⁴³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 2·地理志》：「袁州宜春郡，屬江南道。」，頁 1070。

¹⁴⁴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73。

¹⁴⁵簡宗梧編撰，〈漁父〉《中國歷代經典寶庫·楚辭》，（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7年），頁 347。

¹⁴⁶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 榕村續語錄(二)》，頁 895。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
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欸行人。已知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¹⁴⁷？

到韶州時，張蒙設宴款待，韓愈為表示謝意，特地寫這首詩送予張蒙。詩中引用典故¹⁴⁸，以江總來借喻張蒙，讚譽其才學俱佳；以虞翻來比喻韓愈自己。以虞翻自比，也隱含著回歸的意象，因為虞翻是無罪遭貶，既然無罪，就該讓其洗刷冤屈並返回朝廷；所以，這就像是韓愈自認為自己只是好意為聖上「除弊事」，何罪之有，卻蒙冤遭貶，所以，還請聖上早日開釋，讓其回京。而詩中除了表達自己回歸的心意之外，他亦祝福才高如江總的張蒙能早日得到赦免北遷或回京。

三、小結

對於被貶謫的文人來說，他們曾在權力中心論政議事，顯赫尊貴的地位，榮華富貴的生活，使他們的生命處於極高的層級，被貶之後，讓他們惶恐不安，想再回到朝廷、重返權力中心、成就未完成大業的心願更加強烈。從本節的研究中得知，遭貶謫之禍的韓愈亦如其他被謫貶的文人一樣，強烈的回歸心意時時縈繞心頭。在其貶潮的詩作上就可以發現，他不時表達絕望的心情、罪臣的意識，並於詩作中以直抒歸意與含蓄委婉等方式陳述自己想要歸「朝」的訴求。

第二節 憂憤不平之作

古代的讀書人，性格中總是儒雅中帶有剛勁的銳氣；剛勁時又不失其忠厚之本性；而韓愈的性格便充滿了上述古代讀書人的特質。從《舊唐書·韓愈傳》中的

¹⁴⁷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81。

¹⁴⁸ 江總，從小就很聰明，長大了又頗有才學；梁元帝欲派任其為始興內史，他不接受，於是被貶謫、放逐至嶺南。

虞翻是孫權的一個下屬，屢次犯顏直諫，且多見毀謗之言，於是將其遷徙至丹陽。

「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¹⁴⁹。」及《新唐書·韓愈傳》中的「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¹⁵⁰。」便能得知韓愈個性操守端正、坦率直言，且由於受到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他關心現實，憂懷國事，體恤民瘼。所以，當他以剛毅忠正的態度，疾言直諫時，再加上奸佞臣子的操弄，致使其蒙遭貶謫之禍，所以，他滿腔的不平之氣，不得不鳴，一篇篇憂憤不平的作品就隨之而出。而在這些詩作中，韓愈藉由「借題發揮」和「寓言寄意」來抒發其心中的不平之氣。

一、借題發揮

對於自己無故蒙受貶謫之禍，韓愈心中極為憤怒，但面對朝廷這嚴酷的政治壓迫和恐怖氛圍，他又不能將心中的仇恨和義憤直白的毫無隱瞞的和盤托出，所以，唯有借題發揮，指桑罵槐，始能抒憂解憤，他的憂憤情感既真實又深刻；茲舉具體詩例說明之。

(一)、〈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¹⁵¹。

對於自己的遭遇竟會如同在〈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中寫道的：「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¹⁵²。」令其深感錯愕。整首詩將敘事、論議、寫景、抒情相互結合，真切地敘述了韓愈遭貶後痛苦、憤恨、擔憂及訣別的心情，字裡行間充滿了悽愴忠憤之情，讓人深刻的感受到他剛毅忠正的諫臣形象。

詩中韓愈撫時感事，除對自己「朝奏」而遭「夕貶」的不幸遭遇充滿了憤恨

¹⁴⁹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 5》，(台北：鼎文書局印行，1989 年)，頁 4195。

¹⁵⁰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 7》，頁 5129。

¹⁵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097。

¹⁵²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288。

不平之氣外，更直述了自己對「興道」及「除弊」改革之志向至死不悔¹⁵³。李光地在《榕村詩選》即寫道：「佛骨表孤映千古，而此詩配之。尤妙在許大題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卻¹⁵⁴。」「除弊事」呼應著第一句中的「朝奏」，為國家諫言「除弊事」，卻得到了「夕貶」的代價；且這個弊事是「天子帶頭佞佛」，但豈有「聖明天子」會先行違悖常道做「弊事」的道理？所以，「聖明」二字，話中有話，實為諷刺。而「衰朽」、「殘年」的形象是落寞蕭索的，恰可呈現烘托渲染的作用，呈現在藍關漫天飛舞大雪中的韓愈，身影是那樣的孤獨、淒苦與無助的畫面；「家何在」三個字更蘊含了韓愈心中多少的血淚與辛酸。在這天寒地凍、四顧茫茫、荒涼冷漠的景象中，韓愈又怎能不讓產生天涯淪落之感呢？

在唐代常有所謂「追賜死」的制度¹⁵⁵，所以，很多文人被賜死在藍田驛；到了藍田驛的韓愈內心甚為戒慎恐懼，深怕此地即為自己的葬身之地，但自己又絕對不能就這樣死去；語氣是如此的沉鬱無助，內心又是如此的悲愴淒涼。何焯評議此詩：「沉鬱頓挫¹⁵⁶」。從詩文中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韓愈憤中帶「悲」及無怨無悔、剛正不阿的氣概。

(二)、〈瀧吏〉

此詩作於元和十四年(西元819)貶謫潮州途中，詩云：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往問瀧頭吏，
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
譬官居京邑，何由知東吳？東吳游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

¹⁵³ 參考劉尊明，〈韓愈貶謫潮州的人生體驗與詩文創作〉，《湖北大學學報》，(第28卷第3期，2001年5月)，頁55。

¹⁵⁴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 榕村續語錄(二)》，(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895。

¹⁵⁵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玄宗本紀〉《舊唐書》：「后弟太子保、駙馬都尉守一貶為澤州別駕，至藍田，賜死。」(台北：鼎文書局印行，1989年)，頁186-187。又劉昫撰、楊家駱主編，〈代宗本紀〉《舊唐書》記載：「襄州刺史裴茂長流費州，賜死藍田驛。」，頁270。又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黎幹傳〉《新唐書》：「幹與宦者特仕忠翼陰謀，幾危宗嗣。……，俄賜死藍田驛。」(台北：鼎文書局印行，1989年)，頁4721。

¹⁵⁶ 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508。

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為？
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
官去道苦遠。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
鱷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
掀簸真差事。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
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官不自謹慎，
宜即引分往。胡為此水邊，神色久懍慌？瓶大餅罌小，所任自有宜。
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在朝，
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
叩頭謝吏言：始慙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
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
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¹⁵⁷。

本詩的主旨是隱喻政情、譴責臣僚誤國而抒發心中的感慨；且詩中以設問自答之方式，藉瀧頭吏以吳音野諺，訓誡一番，罵盡天下所有不適任之官員，罵得痛快淋漓；表面上似在數落自己的不是，但其真正想表達的，正是韓愈針對朝中官員的批評。因此，瀧吏口中所謂「官不自謹慎，宜既引分往」、「瓶大餅罌小，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以上等語皆有強烈批判現實之意味。而從「吏曰聊戲官」一句起，正是全篇的最大的轉折，故意用嘲弄戲謔的內容來描述貶謫地之偏僻及環境之險惡，加以突顯韓愈對這瘴癘之地的驚駭恐懼之感。逐臣之身的韓愈並非以超然的態度來看待即將到達的貶謫地，他心中滿是憂慮，深恐自己無法度過此一浩劫，「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真擔心自己會成爲一隻籠中鳥，就此被囚禁在潮州這個牢籠裡；但他又以反諷的方式自我解嘲的說，瀧頭吏之語，自己似皆有之，只貶謫至潮州這惡地，實屬萬幸了。

¹⁵⁷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9。

(三)、〈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此詩是元和十四年韓愈抵達潮州後所作的。詩云：

鬻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蠔相黏為山，百十各自生。
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蛤即是蝦蟇，同實浪異名。
章舉馬甲柱，鬪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
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芼以椒與橙。
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駢。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穉。
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
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并。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¹⁵⁸。

詩中的鬻、蠔、蒲魚、蛤和章舉等都是海鮮類；剛從北方南貶的韓愈，對這些經南方烹調手法煮出的菜肴，真是吃不慣，除了腥臊刺鼻之外，吃起來更是讓人滿臉通紅、汗流浹背。從內容上來看，韓愈透過各種實物為題材寫下此詩，下句亦多所精細。「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穉。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并。」詩中指出蛇雖然口眼長得凶狠些，但越人將其視為上等珍寶，而中國人卻打關籠子任由牠去；正如同我韓愈，實為一忠君愛國之臣，但憲宗您卻視我如敝屣，棄之而不用；這八句，與〈病鴟〉一詩有同樣的寓意，都是在嘲諷背德負恩之人，究其內涵，都有針砭時俗之意。表達出韓愈內心對為政者的諸多不滿與諷刺。

(四)、〈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這一首詩是元和十四年韓愈南行潮州途中住宿增江口時所作，是其哀憫民生的一首佳作，詩中揭露了水旱之災導致百姓相繼死亡的悲慘現實。兩首詩歌內容如下：

¹⁵⁸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32。

其一

雲昏水奔流，天水滌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
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
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唏。問知歲常然，哀此為生微。
海風吹寒晴，波揚眾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¹⁵⁹。

來到增江口，目睹了災民痛苦的生活，增添韓愈心中無限的感慨。「犬雞俱上屋」呼應著前一句的「高處水半扉」，描寫淹大水的情況之嚴重，情境是如此逼真，宛若在眼前；朱彝尊就表示：「嶺南不時泛溢，或平夜溢沒公署，此所賦宛然畫出¹⁶⁰。」而划船入民宅，夜半聽聞聲聲嘆息聲；這除了寫出黎民百姓遭逢天災的苦難，無計可施的窘困之外，「歲常然」更是揭露出統治者對百姓疾苦的漠不關心，任由百姓時遭水患之苦。

其二

舟行亡故道，屈曲高林間。林間無所有，奔流但潺潺。
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¹⁶¹？

詩中以「林間」做為一個空間背景，「林間」本是該有人、鳥在其間活動的場所，但韓愈卻寫道「林間無所有」，只聞潺潺奔流聲來呼應前一句，凸顯空蕩蕩的林間。「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呼應著第一首的「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寫出百姓對自己生活之難處束手無策，只能望天興嘆；但其中更寫出韓愈自己內心徬徨無助與苦悶的心情，對於自己即將面對的人生道路，不知該如何居處的茫然與傷懷；程學恂評議此詩即說，此詩寫的是百姓身受貧窮之苦及騷客逐臣內心的落寞之感；所以說，不管是黎民百姓或是逐臣韓愈，面對自己當前的困境，除了有窮途末路之感外，更對無計可施感到悲痛。

¹⁵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36。

¹⁶⁰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六》，頁 358。

¹⁶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38。

二、寓言寄意

韓愈排佛崇儒這是眾所皆知的事，而在其創作的詩歌中，以〈琴操十首〉最富儒家的色彩。十首中〈將歸操〉、〈猗蘭操〉、〈龜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和〈殘形操〉等內容皆與儒家人物有所關連。而這些詩，韓愈除代替孔子、周公、文王、古公亶父和曾子等人抒發心聲、認同他們的嘉言懿行之外，其欲藉由〈琴操十首〉來推崇儒門之用意亦昭然若揭；詩作分析如下。

(一)、〈琴操十首〉

此組詩作是韓愈在潮州時所作，且意有所指；藉由古代聖賢的遭遇來抒發自己心中的感觸，並映襯出自己內心深沉的憂患意識和堅貞不屈的節操。

1、〈琴操十首·將歸操〉

此詩為〈琴操十首之一〉，以騷體的形式寫作，寫作的史實根據是《史記·孔子世家》中「君子諱傷其類」與「鳥哭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¹⁶²。原題旨是孔子受聘前往趙國，而趙國卻要處死對趙國有巨大貢獻的竇鳴犢與舜華，對此不義之舉，孔子有感而發。詩云：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

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

無與石鬪兮，無應龍求¹⁶³。

詩文是寫出孔子濟渡困難之情狀。「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

¹⁶²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台南：大行出版社，1975年），頁1065。

¹⁶³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43。

四句則從屈原九章〈思美人〉中「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¹⁶⁴」化出，原詩意為：欲叫薜荔做介紹人，又怕舉起腳趾攀爬樹木。欲託荷花做媒人，又怕撩起衣裳涉水弄濕了腳；韓愈藉其旨寫出孔子進退失守的狀況；更寫出自己在朝廷中的窘境，及遭貶苦悶的心境。其中蘊含著其對孔子行為間接的認同，更抒發出自己的忠心耿耿，卻反被國君疏遠的不平之情。他並未將自己角色融入詩文中，但他卻藉由孔子之口及趙國欲殺竇鳴犢和舜華之事，婉轉地陳述了對自己政治前途的憂心。結語二句「無與石鬪兮，無應龍求。」喻意奇警；韓愈的潮州之貶是因皇甫鏘在憲宗面前搬弄是非所致，所以，此句應有責斥權幸之意，而其所斥責的對象應為皇甫鏘等李逢吉集團之人。

2、〈琴操十首·猗蘭操〉

此詩為〈琴操十首之二〉，是以四言寫作，內容以孔子生平的行實為根據。詩云：

孔子傷不逢時作。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曷為然？

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薺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覯。

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¹⁶⁵。

詩中假借蘭花、薺麥為喻。蘭花是指孔子亦是指韓愈自己；以薺麥來比喻亂臣，而這亂臣，以當時的背景來推估，其所指應是李逢吉集團內之眾人。全詩的主旨在於最末四句：「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如同《孟子·滕文公下》中所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¹⁶⁶。」整首詩暗喻當今

¹⁶⁴董楚平譯注，《楚辭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60。

¹⁶⁵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48。

¹⁶⁶趙岐注、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孟子注疏(上)》，（台北：古籍出版，2001年），頁193。

朝廷奸臣當道，自己卻抑鬱不得志。但詩中韓愈仍立場堅定的宣示著，縱使自己身處在逆境中，也不願與朝廷上的那些奸佞小人妥協的堅持與操守；這與《文子·上德篇》中所謂的：「蘭芷不為莫取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之始也。」¹⁶⁷正是志旨相通，出污泥而不染。

3、〈琴操十首·龜山操〉

此詩為〈琴操十首之三〉，以騷體形式所寫：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之氛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

龜之大兮，祇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

周公有鬼兮，嗟歸余輔¹⁶⁸。

詩中以魯國的龜山做比喻，嘲諷季氏的無能又專擅及感受到魯國將要衰頹之態勢；而這其中也蘊含著韓愈對憲宗的嘲諷，對於憲宗的志節不堅、任由佞臣專擅甚為不齒，而對於唐王朝日益衰頹的國勢更是憂心。「周公有鬼兮，嗟歸于余輔」，這兩句話頗能代替孔子表達其愀然不移的忠心，唐宋詩醇評議此詩：「一結深痛¹⁶⁹」，而這不也表達出韓愈對於自己的一片忠心，憲宗卻視而不見，內心深深之傷痛嗎？

4、〈琴操十首·越裳操〉

周公作。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

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

¹⁶⁷丁原植，《文子資料探索》，(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頁279。

¹⁶⁸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52。

¹⁶⁹轉引自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55。

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

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¹⁷⁰。

整首詩的用字簡淡，詩中將越裳來臣的功勞，全歸功於周朝之先祖。由於周代先祖的開疆闢土，後世人始得享有福澤。而周朝之所以能富強康樂，這完全得歸功於先祖在上的監管臨聽。且人人都能謹守本分，那國家必能長治久安，遠近的臨邦也必來稱臣納貢。在詩作中韓愈除代言周公之職志，歌頌周朝之先祖，以彰顯周公謙謙之德外，其中亦隱約有微諷當道之意；對照此時，由於憲宗帶頭崇佛，使得崇佛變成一項全國性的活動，給國家社會無論是在政治或經濟上都帶來了莫大的危害；所以，在此韓愈暗諷的對象正是帶頭佞佛的憲宗，且藉由〈越裳操〉來勸誡憲宗，希望在上位的主政者能敬畏祖先之德澤，小心縝密的綢繆桑土。

5、〈琴操十首·拘幽操〉

此詩為〈琴操十首之五〉，是根據《史記·周本紀》中的史實來寫作，代替文王表達出被囚禁在羑里時的心情，且寫實的描繪出文王被拘禁時所處的環境及其人格特質；並對於文王面對橫逆，還能三省其身的節操，深感欽羨。詩中云：

文王羑里作。

目窈窕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

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

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¹⁷¹。

元和十四年（西元 819），韓愈出於關心國計民生及維護中國傳統的倫理綱常，上表請求罷迎佛事，不料卻因此而觸怒憲宗被貶謫至潮州。內心的鬱悶與文王心境相較，應是旗鼓相當的。詩中寫道：文王遭囚禁在幽暗之處，深陷在孤寂困苦的

¹⁷⁰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55。

¹⁷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58。

絕境中，致使其目不明耳不聰，分不清黑夜與白天，更不知自己到底是生還是死？而文王的處境是否與韓愈的處境甚為相似呢？現今，朝廷權幸之臣當道，有如烏雲蔽日一般；而自己欲為聖明除弊事，卻落得貶官的下場，所以，韓愈心中是怨憤至極的，並以無辜蒙罪之怨寫下此詩，韓愈藉由文王之口表達出自己孤獨無助的心境。而這首詩中最重要的語句，「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乃是憤怒的諷刺語；「聖明」二字指稱天子，這不只是諷刺紂王之無道，更是諷刺憲宗之無能，才會任由奸臣在朝廷橫行霸道，致使賢臣一一遠離京師。

6、〈琴操十首·岐山操〉

此詩為〈琴操十首之六〉，是根據《史記·周本紀》中的史實來寫作；是周公為太王所作，表達古公亶父遷居於岐下，主要的用意是在讓人民躲避戰禍和避免犧牲。詩云：

周公為太王作。

我幽于家，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土我疆。

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我往獨處。爾莫余追，無思我悲¹⁷²。

從詩文可以看出，這是一首對家國遭受異族侵略而發出哀歎的悲歌；太王時期家國遭受異族入侵，有如中唐國家社會狀況，藩鎮的侵擾，佛教大肆盛行一般。而詩中的「今狄之人，將土我疆」，即可用來看作異族入侵的象徵，在此韓愈便是以「狄人」來諷喻佛教。陳沆在《詩比興箋》中指出：「公潮州之貶，以諫迎佛骨。其表言佛本夷狄之人，非中國先王之教，不宜崇奉，使愚民疑惑。故是篇託避狄之詞以寄意¹⁷³。」從詩的內容亦可以看出，韓愈希望藉由這首〈岐山操〉表達出他對佛教日益深植人心，唯恐有朝一日祂將成為國家禍害的根源而擔憂；詩中對虛偽佛教進行嘲諷與揭露，並勸誡憲宗，希望他能排佛以返回先王之教；就如

¹⁷²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61。

¹⁷³陳沆，《詩比興箋·卷四》，(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1970年)，頁 441。

同古公亶父爲使人民免除無畏的犧牲而避狄遷居於岐下一般。

7、〈琴操十首·履霜操〉

此詩爲〈琴操十首之七〉，詩中韓愈化身爲孽子尹伯奇，以四言古詩的形式寫之；並藉由尹伯奇未犯下任何過錯，但卻慘遭後母誣陷，而被父親驅逐一事來喻己無故蒙冤遭貶之事。詩云：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答，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

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

母生眾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¹⁷⁴？

詩中母親將尹伯奇趕出家園，而頓時失去父母疼愛的他，流落在荒郊野外，飽嘗被拋棄的辛酸。詩末四句，朱彝尊曰：「通首精工。末四句略指大意，卻不傷露¹⁷⁵」。在古代，皇帝有如是朝臣的父母，詩中，貶謫之臣韓愈將自己化身爲尹伯奇，將憲宗比喻爲聽後母讒言的父親；藉由尹伯奇是因受到後母的誣陷才遭到父親放逐之事，暗喻憲宗亦因受佞臣皇甫鏞等人的挑撥，故意曲解其上疏之諫言，才憤而將他逐出朝廷；所以，韓愈乞求憲宗，希望能哀憐他，且赦免他的罪，讓他完成再爲國家效忠的心願。他內心的企盼是如此殷切；就如同尹伯奇迫切的希望再回到父母身邊，享受父母疼愛一般。

8、〈琴操十首·雉朝飛操〉

此詩爲〈琴操十首之七〉，是牧犢子因已高齡七十，卻仍無妻妾，再看到眾多的雌雉追隨著一隻雄雉，雄雉趾高氣昂的模樣有感而發所作。詩云：

¹⁷⁴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64。

¹⁷⁵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一》，頁 111。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

隨飛隨啄，羣雌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

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¹⁷⁶。

詩中從雉鳥兒的雙飛雙棲，映照出詩人的落寞，也說出詩人心中的企盼；韓愈雖似在為孤苦無依的牧犢子發出「不遇之鳴」；但實則是在為已五十二高齡，但卻無辜遭貶謫之禍的自己抒發心中無限的感慨。

「羣雌孤雄，意氣橫出」似有所指，依當時的背景來推估，其泛指的應是李逢吉集團中之黨羽，而「意氣橫出」之人應是憲宗身邊之紅人 --- 皇甫鏞。而「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牧犢子感歎自己人不如鳥，都已七十歲，卻仍無妻室；這當中韓愈似也在為自己感嘆：已過知天命之年，卻還未能遇見「伯樂」。陳沆在《詩比興箋》中即指出：「感盛年之遲莫，慨遇合之無時也¹⁷⁷。」所謂「千里馬」，也總得遇上「伯樂」的賞識，才能得到「千里馬」這美譽；但正值盛年的自己，卻只能在這蠻荒之地度過餘生，未能在朝廷上好好一展長才。此首詩頗有韓愈感慨自己未能遇上「伯樂」、感慨自己歸朝無期，以及對於前途茫然之感歎。

9、〈琴操十首·別鶴操〉

韓愈根據〈別鶴操〉撰作此詩，為〈琴操十首之九〉，是以五言的形式作之。

詩云：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雄鶴銜枝來，雌鶴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

¹⁷⁶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66。

¹⁷⁷陳沆，《詩比興箋·卷四》，頁 446。

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¹⁷⁸。

穆子與妻結縭五年，卻仍膝下無子，父母以「大義之道」要他另娶。妻子知此訊息，半夜倚窗而哭號；穆子聽聞妻子的哭聲，由感而發所作；程學恂即評議此詩含悲無窮。詩中的「江漢水之大」指的是大義，而「鵠身鳥之微」指的是自己，中國人向來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為大愛精神；穆子夫妻之例，即為最佳的佐證。

〈別鵠操〉這首詩與〈孔雀東南飛〉的題旨是相仿，同為敘述家庭的悲劇；中國自古以來，因「不孝有三，無後為大¹⁷⁹」之禮教，讓多少對恩愛夫妻就此仳離¹⁸⁰。陳沆在《詩比興箋》中云：「逐臣棄婦同情也¹⁸¹。」而此時的韓愈不也正身受「別離」之苦，因上表排佛被貶，只能黯然的離開朝廷，離開他愛戴的君王，離開他熱愛的家園。韓愈藉由詩中之意以喻己，「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更寫出了歸朝無期之悲，全詩無任何綺麗文句的烘托，但信筆拈來，所蘊藏的感染力更大，也更懾人心弦。

10、〈琴操十首·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

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¹⁸²？

曾子睡覺時，夢見一隻「無狸頭」，只見其身，未見其首；因而作了此詩。詩中的「而頭不知」一句，除鍾惺說它是奇語之外，何焯也表示：「未得其首，蓋歎明王不作也¹⁸³。」就如同一個國家卻無聖明的君王一般，所以，詩中韓愈似在諷喻憲

¹⁷⁸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68。

¹⁷⁹阮元，《十三經注疏·孟子·離婁篇》，頁 137。

¹⁸⁰參考李建崑，〈韓愈〈琴操〉十首析論〉《興大中文學報》，(第三期，1990年1月)，頁 196-197。

¹⁸¹陳沆，《詩比興箋·卷四》，頁 446。

¹⁸²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70。

¹⁸³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一》，頁 113。

宗非一「明王」一樣。而「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或許正是韓愈感慨吉凶休咎之謬無常。陳沆在《詩比興箋》中云：「賈謫長沙，問吉凶於鵬鳥。屈放江南，託占筮于巫咸。此詩合而用之，明示放臣之感¹⁸⁴。」

韓愈此次因〈論佛骨表〉被貶至潮州，引發出其藉由蔡邕〈琴操·殘形操〉撰作了〈殘形操〉，寫下他心中無限的感觸；元和十二年十月才因平淮西之功，被晉升為刑部侍郎，深受憲宗的賞識，而今卻因為聖明除弊事被貶謫潮州，讓其不免為世事難料、禍福無常發出感歎。

三、小結

從本節的研究中獲知，韓愈是一位具有相當獨特性的知識份子。他一方面深刻的自我反省，期盼能獲得君王的憐憫；但另一方面又不願隨波逐流，與世俗相浮沈。且對自己無故蒙冤遭貶，心中極為不服氣，在詩作中以借題發揮，來為個人貶官遭遇、為百姓生活疾苦鳴不平；或以寓言寄意的方式來嘲諷令他遠貶的憲宗及害其蒙禍的權幸臣子；嘲諷憲宗的無能，讓權幸之臣專擅。嘲諷憲宗悖離先王之教，致唐王朝的日益衰頹。

第三節 贈別寄情之作

潮州之貶，讓韓愈感到很大的挫敗，在其窮途末路之際，親人的同行陪伴、故交舊友的設宴款待、送藥贈書，一件件都讓其銘記在心，撫慰其受傷的心靈，並寫下一首首的贈別寄情詩作，其內容以送親別友、勗勉後輩和與故友敘舊為主要的情感表達意涵。

一、送親別友

唐宋時期是中國歷代貶謫流放最盛行的朝代，這些文人在貶謫之際，常會有一些送往迎來的場合，於是，詩人常藉由詩歌來表情達意；韓愈在其以送親別友

¹⁸⁴陳沆，《詩比興箋·卷四》，頁447。

爲主要對象的詩作中，呈現出別相思離之空間背景，凸出其「悲」的內在情懷；茲舉具體詩例說明之。

(一)、〈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別酬以絕句二章〉

此詩的創作背景，從詩題、詩旨及所用的典事中得知，在韓愈失意潦倒之際，張蒙仍設宴款待，讓其頗有「雪中送炭」之感，於是，韓愈便以此「絕句二章」表達酬謝之情。

其一

韶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鷓鴣休傍耳邊啼¹⁸⁵。

第一首詩寫的主要是分別時的心情。從詩的內容上來看，詩中的「日向西」對應著詩題中的「晚次宣溪」，是指夕陽西下後在宣溪停留歇宿。韶州往南就是宣溪，夕陽西下已近黃昏，且在宣溪停留歇宿。張蒙的熱情招待致函慰藉，讓韓愈倍感溫暖；但面對將與友別離，不禁悲從中來，詩中以夕陽西下之景及「客」「鷓鴣」同感之境，讓人更覺哀淒。朱彝尊曰：「『如何此時恨，噉唳夜猿鳴』、『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寒衣』，皆是此意。此但添「元自」、「休傍」四字，境遂別，然終覺稍著意¹⁸⁶。」孤寂落寞、不捨之感躍然紙上。

其二

兼金那足比清文，百首相隨愧使君。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¹⁸⁷。

在貶謫的途中，兩人卻能有幸相遇，再加上韶州和潮州兩地同是嶺南地區，相距

¹⁸⁵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19。

¹⁸⁶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 510。

¹⁸⁷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20。

並不遠，韓愈盼日後兩人能互通音訊、相互照料。「兼金」一詞出自陸機〈贈馮文罽〉一詩的「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¹⁸⁸。」在陸機詩中的意蘊，也就是陸機與馮文罽的關係，兩人間除有著兼金般的好友情誼外，尚有著「密席接同志」的同僚關係；在馮文罽遭貶期間，陸機曾多次的予以慰藉和鼓勵。而對照到韓愈與張蒙，與他們相較，幾無二致；所以，韓愈以「兼金」一語來描述自己與張蒙之間的好情誼。他憂懼別離後的友人就此斷了訊息；憂懼就此客死異鄉。無限的「憂懼」更顯其孤獨悲涼無助之愁緒，讓其要對友人叮嚀再三。〈筆墨閒錄〉評議此詩：「潮州以後詩最哀深。次宣溪絕句等詩，絕有味¹⁸⁹。」兩章詩歌詞意哀深，感情基調是一致的，友人的敘別書信，勾起了韓愈心中無限的悲愴，悲與友別離，悲與朝廷別離、悲不能再貢獻己能。

(二)、〈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¹⁹⁰〉

此首五言律詩是韓愈從袁州回京在行經次石頭驛時所作。「王十」指的是王仲舒，此時時任洪州刺史。而由於先前王仲舒設宴款待，路過洪州的韓愈特向王仲舒辭行。辭行後剛離開洪州來到次石頭驛，登高回望那豫章城，難捨之情滿塞心中；韓愈便馬上寫了一首詩寄給王仲舒。詩云：

憑高試迴首，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馬亦別羣鳴。

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平。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¹⁹¹。

詩中以登高望遠的場景，展現出詩人內心極度的悲傷。頷聯中詩人因與友人的別離而神傷，而那馬兒似乎也與主人有同樣的心情，也不願脫離同伴，臨別時忍不住發出長長的鳴叫聲，宛如有無限深情一般。連牲畜---馬都如此了，何況是萬物

¹⁸⁸ 金濤聲點校，《陸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52。

¹⁸⁹ 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511。

¹⁹⁰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6》：「王仲舒字弘中，太原人。元和五年，京兆尹楊憑為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仲舒與憑善，宣言於朝，言夷簡倚撫憑罪，仲舒坐貶硤州刺史。遷蘇州。穆宗即位，復召為中書舍人。其年出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觀察使。」(台北：鼎文書局印行，1989年)，頁5058。

¹⁹¹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87。

之靈的人呢?詩中的「人」因「戀」而「泣」,對應著「馬」因「別」而「鳴」,「人」、「馬」同感之境,更顯離情依依的傷悲愁緒。「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平」,夕陽緩緩的落下,江風也漸漸的平息,週遭的萬事萬物也都靜默了,全都感受到韓愈內心深處這離別的悲痛。朱彝尊指出:「此二句寫得極其細膩,「風江」二字較之「江風」為佳,若為後者,那又僅僅是一般的寫作方式,不值稱奇¹⁹²。」整首詩情感真摯濃郁,一切盡在不言中。人生中最美麗的情感即是相思離別之情,雖然它是那麼的令人痛徹心扉,但它卻是最令人難以忘懷的一種人生體驗。

二、勗勉後輩

韓愈提攜後輩向來是不遺餘力,像是侯喜、李翊和尉遲汾等人,都因韓愈的舉薦而考中進士。而在貶謫潮州期間,韓愈對趙德及元集虛的才德亦是十分的欣賞,可惜以現今自己的處境,實難對他們有所助益。所以,在詩作中主要用意在於勗勉,但凸出的是其「愛才惜才」的長者形像;茲舉具體詩例說明之。

(一)、〈別趙子〉

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
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
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意欲攜以俱。
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又奚為於北,往來以紛如?
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
又嘗疑龍蝦,果誰雄牙鬚?蚌贏魚鼈蟲,瞿瞿以狙狙。
識一已忘十,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
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區。
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¹⁹³。

¹⁹²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513。

¹⁹³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75。

詩中的趙德乃是潮州人，與韓愈相遇於潮州。方世舉評議此詩曰：「此詩首敘遷謫潮州，喜于得趙。及移袁州，欲偕而不可，有不得不別者矣。乃復述趙之言，以為海南有以樂，物理細大，不可究詰，人生去住，亦豈可強同？此所以不相從也。截然便住，彼此之意各盡，不作一惜別語。於此歎格之奇，而亦可相見趙立品之高，不煩語及俗情也¹⁹⁴。」所謂人各有志，又何需強求呢？朱彝尊評議此詩曰：「述不肯俱北之，灑灑可喜¹⁹⁵。」韓愈平生愛才若渴，詩中未見離別感傷的情懷；僅見韓愈以一位長者的身份，叮敘殷切之言；一位諄諄教誨且疼惜後輩的長者形象躍然呈現。而「蚌贏魚鼈蟲」一句為以賦為詩的創句作法，在詩句中，連續全都是名詞，盤空硬語；這為韓愈詩歌中「以文為詩」的獨特表現效果。

(二)、〈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韓愈赴潮州路途中，對未知生死的茫茫前路，精神極為痛苦。這時候，裴行立派其幕僚元集虛送來了藥物和書信慰勞，同時也為柳宗元帶來了他的問候。所謂的「患難見真情」，在人生遭逢窮極困頓之時，朋友們這種雪中送炭般慰問和幫助，比那種錦上添花的厚贈美意更讓人覺得彌足珍貴。且在那風急浪高、險象環生的水陸兼程中，元十八仍不辭辛勞的前來，讓韓愈倍感溫暖，寫下了此組詩作，分別向裴行立、柳宗元和元集虛致意。

其一

知識久去眼，吾行其既遠。菅菅莫訾省，默默但寢飯。
子兮何為者，冠珮立憲憲。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畹？
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治惟尚和同，無俟于謇謇。
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輓。子兮獨如何，能自媚婉婉？

¹⁹⁴韓愈撰、文謙注、王儔補注，〈新刊經進詳註韓愈先生文集二〉《續修四庫全書》，頁 451。

¹⁹⁵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六》，頁 360。

金石出聲音，宮室發關鍵。何人識章甫，而知駿蹄蹠？

惜乎吾無居，不得留息偃。臨當背面時，裁詩示繾綣¹⁹⁶。

朱彝尊評議此組詩即曾說道：「第一首是空谷足音意，觀起二句可見¹⁹⁷。」開門見山的指出詩的意旨；詩中云及自己貶謫離京已很遠，行屍走肉般的過活度日；但在自己窮途末路之際，尚有故人託友的到訪，這份心意真是令其感激涕零。

詩文中述及元十八的外型、涵養，「子兮何爲者，冠珮立憲憲。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畹。」在團體中就是特別的耀眼，而對於元十八「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何焯在〈義門讀書記〉中即表示：「驚心動魄，少年當日誦以自儆¹⁹⁸。」年輕人應當每日吟誦自我警惕。對於與元集虛短暫的相聚與即將分離韓愈在詩作中也深深的刻劃著：「惜乎吾無居，不得留息偃，臨當背面時，裁詩示繾綣。」可惜我沒有居所，無法留您下來休息。「繾綣」一語更顯現出韓愈心中有萬般的不捨，別離後的兩人只能藉由詩文來慰藉心中無止盡的思念，詩中感受到的是至情至性的韓愈。

其二

英英桂林伯，實維文武特。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

南裔多山海，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

子行誠艱難，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¹⁹⁹。

元十八不辭路途的遙遠艱辛受允文允武的桂林伯之請託，特來慰問身受貶謫之罪的韓愈。而詩中對於元十八與韓愈將道別離依依難捨情分描寫深刻：「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面對別離，兩人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淚如雨下；「不可拭」一詞更加的突出兩人難分難捨的情分，淚流不止，拭也拭不盡的景象，韓愈心中

¹⁹⁶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23。

¹⁹⁷ 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六》，頁 353。

¹⁹⁸ 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六》，頁 354。

¹⁹⁹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27。

哀淒之情溢於言表。

其三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
寤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
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我抱悵悵²⁰⁰？

這首詩頌及老朋友柳宗元和對元集虛才華的景仰。常言道「文人相輕」，但韓愈又是何其的寬容大肚，不只對柳子厚才學稱譽有加，更是對元集虛的風采讚嘆不已，詩中這樣的描寫：「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寤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對元十八之才學有久聞不如一見的驚嘆。「如何又須別，使我抱悵悵？」「悵悵」一詞更是描寫出韓愈內心對「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之感嘆！十來天短暫的聚首又要分離，使韓愈心中感到萬分不捨，更顯現出其重情重義的一面。

其四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況四海人？
嶷嶷桂林伯，矯矯義勇身。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親。
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神。
不知四罪地，豈有再起辰？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囷²⁰¹。

當人位居要職時，自然會有很多逢迎拍馬的人在旁圍繞著；但一旦失意不得志，旁人往往將你視如糞土，避之唯恐不及；這就是人世間的冷暖。但素不相識的裴行立竟捎來暖意，讓韓愈由衷的感激，讚其真是有節概、重情有義之人。「不知四罪地，豈有再起辰」二句，韓愈實為說給憲宗聽的，詩中感受到他對自己未知

²⁰⁰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28。

²⁰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29。

前途的茫然感及對再回到長安的渴望，他小心翼翼的詢問著，直抒其歸朝之心意，毫無遮掩。

其五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
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王官不可闕，未宜後諸生。
嗟我擯南海，無由助飛鳴²⁰²。

這一首詩主要是褒揚勉勵元集虛，詩中誇讚元十八博學多聞，實為朝廷上不可獲缺的好人材；除為一「飽學之士」外，又能明確「析辨義理」，且能抱持「學海無涯」的精神持續精進，最重要的是能「知行合一」，將所學切實的去執行。可惜遠貶至潮州的自己，沒有辦法在朝廷上助一臂之力，助其一展長才，輝煌騰達。

其六

寄書龍城守，君驥何時秣？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撞捽。
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石于飛發。
屯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
胡為不忍別？感謝情至骨²⁰³。

詩中的「君驥何時秣」，表面上是問馬兒何時餵飽好上路，但實際上是在問柳宗元，您何時可被召回長安呢？這裡面除了問柳子厚歸朝之期外，是否亦有希望其若能返朝，望其回長安後，也能在君王面前多美言幾句的意涵呢？這是值得探討的意涵？因此時的韓愈一心只有早日獲赦回京的願望，所以，其除了藉由詩文乞憐外，還希望有大赦的機會及故交舊友在憲宗跟前幫忙美言，韓愈無所不用其及，只為回

²⁰²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30。

²⁰³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31。

長安。詩中「胡爲不忍別？感謝情至骨」，以轉折手法表示，用以突出自己內心對友人的感謝之意；在此失勢不得志之際，朋友的深情真意讓韓愈大受感動，深深的撫慰其受傷、受挫的心靈。

在這貶竄時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有人的到訪，更顯情真意切；韓愈內心的感動通過這六首詩自然的流露出來；所以，何焯在〈義門讀書記〉就指出：「六詩勝處，在多發天然，自然肺腑，有意于奇者，轉無其工耳²⁰⁴。」此時的韓愈真情流露，沒有「佶屈聱牙」的字詞，語句自然不矯情；六詩中所表露出來的是至真至性的韓愈、是柔情似水的韓愈。由此可知，對於頭頂著「罪臣之帽」的人來說，在其深陷困境時，一點一滴的「人文關懷」，就有如久旱逢甘霖一般，這除了是對其軀體必要的救治之外，更是其在精神及心靈方面的最佳療癒之石。

三、故友絃舊

此一型態的詩作，作於韓愈量移潮州之後及回京之前，詩作中的心境有別於其在趕赴貶謫地及在潮州時期的詩歌，輕鬆自適，心情爲之飛揚；茲舉具體詩例說明之。

(一)、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

此詩作於韓愈元和十五年從潮州量移至袁州時；他從潮州動身之後，便派人先到韶州找刺史張蒙，希望向他借曲江導覽圖，以備到韶州時可以按圖索驥，遍遊名山勝水。詩云：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²⁰⁵。

貞元十九年韓愈被貶謫至陽山，元和十四年被貶謫至潮州；這兩次的貶謫都曾路經韶州。但在當時，韓愈是以待罪之身，哀悽的心情前往謫居地，自然不可能有

²⁰⁴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六》，頁353。

²⁰⁵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79。

心情慢慢遊覽韶州的山水景色；因以當時的心境來說，那時韓愈眼中的韶州，盡是荒涼、淒苦的。但此時雖沒能北返回長安，但得到量移能離開潮州，愉悅的心情湧上心頭，又要路經韶州，韓愈決定要好好的一覽韶州美景。朱彝尊評議此詩曰：「人皆有此意，如此寫來自妙²⁰⁶。」看來「境由心轉」，所言真是不假啊！此時韶州曲江的景物頓時變成了名山勝景，必得盡興的遊歷一番，才能不枉此行。

(二)、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²⁰⁷

李程是韓愈多次共事的同僚。此詩是韓愈除去舊官職將去接任新官職時，行至江州後所作的。詩云：

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
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
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
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
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否？
我昔實愚忝，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
公其務貫過，我亦請改事。桑榆儻可收，願寄相思字²⁰⁸。

詩中指出，兩人相距「咫尺」卻「不相聞」，對此，韓愈頗感遺憾；詩中韓愈述及分開已三年的兩人，年歲也增長了，自認再活的日子也沒多少，過去的自己真是愚昧，多次說話冒犯，期李程大人有大量，原諒自己的過錯，讓過去的一切煙消雲散。詩中話語，字字謙遜，情真意切感動人心；《唐宋詩醇》評議此詩：「情致纏綿，詞氣遜順，使人之意也消²⁰⁹。」縱使過去兩人理念是多麼的不合，有再大

²⁰⁶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 511。

²⁰⁷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 5》：「李程字表臣，隴西人。父鸞伯。程，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辭科，累辟使府。」頁 4372。

²⁰⁸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84。

²⁰⁹轉引自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 年)，頁 1187。

的衝突，相信讀過此詩的李程，必也能放下過去的恩怨，兩人重修舊好，因為俗話說：「酒是越沉越香，朋友則是越老越好」，知音難覓啊！

(三)、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離開江州，到了江陸的韓愈，想起臨近的隨州有個老朋友周君巢，於是，便動筆寫了此詩給他。詩云：

行行指漢東，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蒹葭出夢中。
面猶含瘴色，眼已帶華風。歲暮難相值，酣歌未可終²¹⁰。

詩的前四句，寫的是隨州的景色，且因此地風景又與中原頗為相似，讓韓愈的心情也隨之飛揚；朱彝尊即評議曰：「虛虛道景言情，卻有雅味²¹¹。」後四句詩描寫量移回京的韓愈，眼前所見，心中所想皆是光明的未來，縱使臉上還蒙戴瘴癘色，但卻已眉開眼笑；所以，李光地在《榕村詩選》中也說：「竄逐生還，悲喜情至²¹²。」沒想到自己還能活著離開潮州、沒想到自己能在短短的十個月內離開潮州、沒想到自己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再度回到長安，一件件的「沒想到」讓他悲喜交加。

(四)、又寄周隨州員外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一詩，題云「先寄」，則此當作「又寄」是可以明瞭的。到了隨州，周君巢與韓愈兩人相聚，韓愈作了這首詩；詩云：

陸孟丘楊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²¹³。

詩中首先以已逝的同門故友做為引言；和我們同在董晉門下的同僚，陸長源、孟

²¹⁰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90。

²¹¹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515。

²¹²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 榕村續語錄(二)》，頁895。

²¹³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93。

叔度、丘穎和楊凝等四人都已亡故，還活在這世上的又還有誰呢？接著再道出自己又寄此詩的真正目的，「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我的身體既衰又病，聽說您有得到一些丹藥，不知能否給我一些，救救我孱弱的病體。朱彝尊評議此詩即道：「起二句道得真率，無限感慨²¹⁴。」滄海桑田，世事多變，道盡人事已非、不勝唏噓之感歎。

(五)、〈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²¹⁵〉

詩中所留別者為李逢吉，但此詩並非以「別情」為重點，而是對李逢吉表明自己已「處不爭之地」，勿再以仇視相對待。在元和十一年正月，李逢吉和韓愈兩人曾共事，同為中書舍人。後因李逢吉阻擾憲宗對淮西用兵，於是被逐出朝廷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後，因感念李逢吉的講侍舊恩，於是將其移鎮襄陽。韓愈過襄陽，襄陽刺史李逢吉設宴款待，故寫此詩以贈之。詩云：

濁水汙泥清路塵，還曾同制掌絲綸。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
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墮座添春。知公不久歸鈞軸，應許閒官寄病身²¹⁶。

詩中的內容大意為：你我曾經同掌絲綸有同僚之誼。但很長的時間裡都未曾收到你的來信，今日卻突然盛情款待，且還有歌妓和美酒相伴。知道您再過不久就要回朝廷擔任重要官職了，而體弱多病的我只能擔任個小官職；到時候對我這個無能的小官員可要多担待些啊！

以現今韓愈的處境，詩中他以「濁水汙泥」來做自我比喻，而用「清路塵」喻李逢吉。希望日後再居要職的李逢吉，勿再將其視為敵手。韓愈的這一舉動豈是「杞人憂天」？非也！朱彝尊曾說道：「李最與韓愈不合，此詩乃若是歡洽，何

²¹⁴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 516。

²¹⁵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 5》：「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元和四年，拜祠部郎中。元和六年，遷給事中。元和七年，為太子諸王侍讀。元和九年，改中書舍人。元和十一年，拜相，後因兵討淮、蔡事件，罷逢吉政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頁 4365。

²¹⁶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96。

也²¹⁷？」李逢吉爲人陰險狡猾，且計謀多端，淮西之役起的兩集團之爭，使得韓愈傷痕累累，且兩次的貶謫已讓他吃盡苦頭，對於已屆暮年且又體弱的他來說，現階段以避禍明哲保身才是上上之策，再也不想與該集團有所瓜葛；所以，韓愈爲求得保全之道，只好頻頻示弱，表明自己已處在不爭之地，詩中凸顯韓愈內在自我的空間意象，欲求遠禍全身以終老的意向。

四、小結

從本節的研究中獲知，在韓愈贈別寄情詩作中偏重能夠自由抒發自己情感的贈人之詩爲主，從其對象與內容意涵論之，多爲送親別友，或是勗勉後輩及與故交敘舊；在與友人的敘別書信中，韓愈悲與友別離，悲與朝廷別離、悲不能再貢獻己能。而勗勉後輩詩作中，韓愈躍升成一位諄諄教誨且疼惜後輩的長者。獲得量移後，韓愈心境舒暢，與故友敘舊，話「昨」、話「今」、話「明」，日子過得極爲逍遙愜意，所謂境由轉，在韓愈身上足可印證。

第四節 抒情感懷之作

韓愈生在代宗大曆三年（西元768年），他出生後母親便不在身邊，而父親也在他三歲時去世了，從小就依附長兄韓會生活，在韓會病逝後由大嫂撫養其長大成人。所以，韓愈從小就飽嚙人世間的滄桑，孤苦的童年再加上困頓顛沛流離的生活，養成其心思細膩、敏銳的觀察力；長大成人後，應試求官，亦屢遭挫敗；費盡心思始踏上仕途；但其仕途並不順遂，宦宦生涯浮浮沉沉，讓其更是嚐盡人情冷暖，潮州之貶更讓其不時觸景傷情，想到親人、想到故友，將個人心中的感觸通過詩作流洩而出中。

²¹⁷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516。

一、孤獨無助

仕途的不遇及對貶謫地的恐懼，讓貶途上的韓愈不時觸景生情、心慟神傷，憶兒時、思親人，詩作中道盡其內心的孤獨無助與憂懼；茲舉具體詩例說明之。

(一)、〈過南陽〉

南陽指的即是鄧州。這首五言詩是韓愈前往潮州途中所作：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
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吾其寄餘齡²¹⁸。

詩的內容，乍看下恰似敘述紀遊情景，但實則為韓愈藉由景物的描寫來抒發自己心中的鬱悶。從麥子正蓊鬱蓬勃成長之景，映襯出韓愈處境之悲苦，連斑鳩鳥都為他哀號個不停。詩中藉由秦山、商山之遙，雜有離長安之遠的寓意。「長安」所代表的是政治核心，士人理想的所在。遠離長安，對文人來說，是政治生命的挫敗，如：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所云：「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²¹⁹。」此時韓愈的心情是相當沮喪絕望的，內心感慨萬千。「吾其寄餘齡」更點出自己恐將到那遙遠的貶謫地潮州度過餘生，心中的憂懼顯於字裡行間。

(二)、〈題臨瀧²²⁰寺〉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²²¹。

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到達韶州。詩中云：「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海

²¹⁸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6。

²¹⁹李白著、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 1234。

²²⁰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地理志》：「韶州，隋南海郡之曲江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番州，領曲江、始興、樂昌、臨瀧和良化五縣。貞觀元年，改為韶州。八年，廢臨瀧、良化二縣。」頁 1096。

²²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18。

氣昏昏水拍天」與〈瀧吏〉中的「有海無天地」的地域描述正相吻合，讓韓愈更加的相信瀧吏口中對潮州險惡環境的種種描述，心中的恐懼不覺又多添加了幾分。朱彝尊即說：「妙處全在『吾能說』三字上²²²。」「吾能說」三個字寫出韓愈對南蠻之地的熟悉，以及內心對那南蠻之地的憂懼。而已過知天命之齡的韓愈，在其身陷困境貶謫至潮州，孤獨的品嚐著那人生苦酒的當時，那「海氣昏昏」之景，讓其心情完全盪入谷底，深陷絕望之中，對於自己的苦難與命運，一字一句的從筆墨中流露出來，悲愴的詩風躍然紙上。

在唐德宗貞元十六年（西元 800 年）時，韓愈亦曾寫下了〈海水〉一詩²²³：「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游²²⁴。」在詩中韓愈將自己比喻為在大海中任意遨遊的鯨鵬，從而說出自己是有遠大的志向抱負，不畏懼任何的磨難，呈現其飛揚的生命態度，此時的他是如此意氣風發、不可一世。

這兩首詩同樣都是以海與水當作背景，〈題臨瀧寺〉詩中的海水是沸騰又炙熱的沉悶；但〈海水〉詩中的海水卻是激情又跳躍的奔騰；兩詩都是在反映政治環境的險惡，但對這險惡的環境，韓愈在面對的心態卻已大不相同，昔日那「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志氣已不復存在，現今的他只剩滿腹的無助與憂懼。

（三）、〈過始興²²⁵江口感懷〉

韓愈貶謫至潮州，路過始興這個地方，觸景傷情，心中湧起無限思念與哀痛而寫下這首七言絕句。詩云：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²²⁶。

²²²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 510。

²²³參考黃偉宏，〈解讀韓愈貶潮詩文情感風格的變化〉，《語言文學研究·文教資料》，（2010 年 6 月），頁 3。

²²⁴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25。

²²⁵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 2》：「韶州始興郡。」，頁 1096。

²²⁶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21。

早在韓愈十歲那年，兄長韓會貶官到韶州，他便與兄嫂鄭氏、十二郎和乳母等一起隨兄長至此地；所以，對於嶺南的一切地形地物他是甚為熟悉的。憶起昔日之景況，再對照今日自己因貶謫之故再經此地，但昔日親人卻早已亡故，獨存韓愈一人，不勝唏噓之感齊湧心頭；朱彝尊評議此詩時即說：「道得真切，鍊得簡妙²²⁷。」而詩中的「今只一身存」和「無人可共論」道盡韓愈孤立無助之感，詩中的意涵是如此悲愴動人，令人為之鼻酸。

二、重情重義

自幼浸淫於儒學環境的韓愈，養成其重情重義的人格特質。在詩作中讓人感受到其知恩圖報及多愁善感的一面；茲舉具體詩例說明之。

(一)、〈題楚昭王廟〉

這首七言絕句詩是韓愈在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要到其貶謫地潮州途經襄陽楚昭王廟時，看到廟中一片荒涼的景象，心中有感而發而題下此詩。詩云：

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²²⁸。

韓愈以眼中所見的景物寫出自己內心的無限感慨；朱彝尊亦說：「若草草然，卻有風致，全在『一間茅屋』四字上²²⁹。」「一間茅屋」更顯出箇中韻味；此地區的居民雖沒有充裕的錢財可為楚昭王蓋一間富麗堂皇的大廟，但還是用盡心思蓋一間茅屋來祭拜他，可見楚昭王德性是如此昭然卓著，還有人念念不忘他舊時德澤；何焯評議此詩即說：「意味深長²³⁰。」對照今時今日的自己，是否亦有讓人曾感念之處呢？而韓愈最希望對其仍有所「感念」的人又是誰呢？其所指是否是唐憲宗？因為，唯有憲宗仍然感念他，那他必可早早遇赦北返，而這應也韓愈衷心的冀望。

²²⁷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 511。

²²⁸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7。

²²⁹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 449。

²³⁰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 449。

(二)、〈題秀禪師房〉

秀禪師是何許人也？不得而知。且從「竹牀莞席到僧家」一句得知，這應是韓愈借宿禪房，應佛寺中僧侶之請求而作的：

橋夾水松行百步，竹牀莞席到僧家。暫拳一手支頭臥，還把漁竿下釣沙²³¹。

詩中敘寫，從禪房的位置，到禪房的擺設，再寫到其小憩時無拘無束的神態及自在悠閒釣著魚等情景，一首詩敘述四件事。接獲量移通知的韓愈，眉頭終不再深鎖，心情舒暢，「暫拳一手支頭臥，還把漁竿下釣沙。」閒暇快意的景象躍然紙上，詩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其愉悅的心情。

(三)、〈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在韓愈自袁州北返的途中，途經江州，順遊廬山，想起過去曾受到蕭存的知遇之恩；拜訪其故居時，才知道他的兒子都已亡故，僅存二女；有感而發作下此詩。詩云：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²³²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烟霞²³³。

此詩淋漓盡致的表現出韓愈重情重義的一面，詩中還引用鄧攸的故事來突顯您至少還有女兒可傳承家業；但一想到過去在此借住的景況與今日相比，唏噓之感齊湧心頭，只能徒嘆景物依舊，人事已非。「幾行衰淚」再配上「烟霞」，韓愈藉由夕陽殘美的意象來渲染詩歌中對於人事凋零感傷的氣氛。

²³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80。

²³²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十·鄧攸》：「鄧攸字伯道……永嘉末，沒于石勒。……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攸棄子之後，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北京，中華書局），頁 2338-2340。

²³³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88。

(四)、〈題廣昌館〉

韓愈的先祖在過去曾經到南陽來躲避戰亂；所以，他到了南陽之後，便開始找尋是否仍有近親居住在此。詩云：

白水龍飛已幾春？偶逢遺跡問耕人。丘墳發掘當官路，何處南陽有近親²³⁴？

從內容來看，韓愈觸景生情，他尋尋又覓覓，從「遺跡」到「丘墳」，只為尋找「近親」。詩中以「已幾春」來表示時間已久，「偶逢」一詞呈現出韓愈對此地的陌生感，表示他對這裡的不熟悉；「遺跡」一詞顯示時間已久遠，呼應第一句中的「已幾春」。詩末韓愈問：「何處南陽有近親？」所謂逝者已矣！南陽恐怕是很難有近親了，倘若尚有近親，又豈會讓「丘墳發掘當官路」，且成為「遺跡」之事呢？韓愈的語氣是如此的委婉哀傷，四句話便將人事的滄桑全部道盡。

三、小結

踏上貶途，隨著與京城的距離越來越遠及貶途之艱辛，讓韓愈心靈飽受摧殘；他以景起興，將個人主觀的情感意識投注在這些抒情感懷之作中，所以，從本節的分析研究中發現，在這些詩作中盡顯其被遺棄、孤獨、絕望和無助的愁緒，對前賢對已逝親友的思念以及對世事禍福無常的感嘆；通過這些抒情感懷之作，讓我們見到孤獨無助的韓愈及重情重義的韓愈。

²³⁴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95。

第四章 韓愈貶謫詩的思想特色

韓愈他以儒家衛道者自居，但他在詩文中表現出來的思想與行為卻是既矛盾又複雜；他一方面突出自己是繼孟子之後的真正傳承者，聲嘶力竭的為維護儒家正統而努力；但另一方面卻又獨排眾議，大膽的突破儒家的某些藩籬的觀念。而本章為對韓愈貶謫詩的思想特色有更深入詳實的探析，所以，擬先從韓愈與儒家的理想人格探究起，從而得知其人格特質；接著再論韓愈貶謫詩的文學體現，探析韓愈貶謫詩與其文章創作主張內在精神的相關性；最後，以前兩節的研究為基礎，探析韓愈貶謫詩中的時空意識。

第一節 韓愈與儒家的理想人格

中唐文人特別重視個人行為對社會所產生的效應，尤其他們對國家和人民有崇高的使命感，期使自己能以「內聖外王」並重的方式，以求不朽人格的最終實現。縱使在官場上失利之後，他們仍是積極關心天下事；將其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與對政治問題的關注，藉由詩文呈現出來，表現出其獨特的參與精神。或許他們不再奢望功成名就的榮耀，但做為一個志士仁人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表現出一種「自我犧牲」的精神；而構成崇高人格的基本要素即是「自我犧牲」，唯有將自我的才能貢獻給國家社會，始能提高自我的人格價值。

而為了探究以儒家道統傳承者自居的韓愈其人格的特質，筆者以為從其尊崇的儒家中的理想人格進行探究應為一最佳的門徑，繼之再從其人格特質中探究其貶謫詩中對儒家思想的實踐。

一、儒家的理想人格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最大的貢獻即是提出了「道」的社會理想和社會原則。在儒家經典著作《論語》一書中，孔子不僅闡述了「好學、深思、自省、安貧、正直、氣節」等一套行為哲學理論，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君子」的形象；如《論語·述而篇》所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

矣²³⁵」、「君子坦蕩蕩²³⁶」及《論語·子罕篇》中說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²³⁷」和《論語·憲問篇》中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²³⁸」，而這當中所說的「君子」，即是孔子所提倡的人格精神的形象化表現，溫文儒雅、文質彬彬。

而孟子則對孔子的「君子哲學」做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在《孟子·滕文公下篇》就說道：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之大丈夫²³⁹。

這其中孟子所說的「君子」，是傲然挺立在王侯面前的「大丈夫」，亦即是其〈盡心篇〉所說的：「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世²⁴⁰」；但深究其人格內涵，無論是孔子的「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之「君子」或是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這兩者都是堅持操守，不為外物所困的理想人格境界，其實質人格內涵是相一致的。

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及文化的發展，孔子與孟子所建立的「君子」——理想人格，內涵更形充實豐富；其特質有：

(一)、對自己治國安邦的才能懷有高度的信心，並懷抱著經世致用、建立功業的豪情壯志；亦即是擁有強烈自尊、自信、自豪及自重的人格精神特質。

(二)、追求生命價值的永恆；孔子在《論語·衛靈公篇》寫道：「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²⁴¹」，在價值取向上，更重視追求超現實、超功利精神的不朽。

²³⁵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述而篇》，(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頁62。

²³⁶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述而篇》，頁65。

²³⁷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子罕篇》，頁81。

²³⁸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憲問篇》，頁129。

²³⁹阮元，《十三經注疏·孟子·滕文公下篇》，頁108。

²⁴⁰阮元，《十三經注疏·孟子·盡心上篇》，頁230。

²⁴¹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衛靈公篇》，頁140。

(三)、對社會現實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並有著救民濟世的理想與抱負；亦即是以天下爲己任，執著於世的參與意識。

細看中國數千年以來，儒教始終居於領導的地位；再從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來看，儒家理想人格的標準對中國傳統的士人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許多傑出的思想家，無一不是受到孔孟儒家思想的薰陶與培育，且在個人人格的形成方面，更是受到儒家理想人格的濡染，而韓愈則是這其中最典型的人物。

二、韓愈的人格論斷

由於韓愈一生都在積極鼓吹儒學復古，所以，很多人都認爲他是孔孟之道的忠誠衛士，是儒家的忠實信徒。而他在〈與孟尚書書〉也寫道：「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²⁴²」，開誠佈公的表明自己是信奉推崇儒家道統的。而且做爲儒學的倡導者，他對孔孟建構的理想人格執著的去追求。但究其一生的言行和創作，其實，他的思想是相當駁雜和矛盾的；他一方面爲民請命，展現他大義凜然的高尚人格；但另一方面，他又爲了在政治上往上爬，寫了一些爲掌權者歌功頌德的諂媚之文，呈現他庸俗人格的一面。所以，後人對他的評價存在著很大分歧，或褒或貶，眾說紛紜。

(一)、心高氣傲的韓愈

韓愈是堅信孔孟「聖人之道」，是一位以儒家大義要求自己行事的儒者，他繼承並發揚了孔子和孟子爲代表建構的理想人格精神。在他一生所經歷的幾次重大事件中，他都表現出自尊、自豪、自信與執著的以身殉道的堅定意志，有著相當鮮明的獨立人精神。蘇東坡評價韓愈「忠犯人主之怒²⁴³」，韓愈的一生有兩次的忠犯人主之怒；一次是貞元十九年(西元 803 年)陽山之貶，根據《資治通鑑》上的記載：

²⁴²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與孟尚書書〉《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 195。

²⁴³楊家駱，《蘇東坡全集》，頁 627。

監察御史韓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愈坐陽山令²⁴⁴。

從上述的記載上得知，韓愈上疏了〈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為民請命；疏文中他毫不留情的揭露了酷吏的剝削和人民苦難的真實況，這是為人民說話的痛切呼聲，希望最高統治者能大發仁心；但最後所得到的結果是貶謫陽山。而另一次是元和十四年(西元 819 年) 憲宗奉迎佛骨至長安，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全國上下為這一節佛骨狂亂痴迷，當時任職刑部侍郎的韓愈，深感憂慮。他本著道統傳承者的使命感，決定上疏諫言，呈上〈論佛骨表〉，痛呈佛教之危害；乖刺言論，因而觸怒了憲宗，被遠貶至潮州。韓愈兩次的「忠犯人主之怒」，讓我們看到的是一位有正義感、勇敢果決的韓愈；此時的他既表現了以天下為己任、執著於世的參與意識，也充分的表現出他自豪與自信的人格特質。

(二)、積極進取的韓愈

安史之亂後，大唐日益衰頹。宦官專權、藩鎮割據、朋黨之爭等使得國家政治動盪不安，經濟日漸凋敝。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文人的生活亦是過得十分不穩定，而為獲得生活上的支援以維持個人的生存條件，他們唯有走上「學而優則仕」之途，以其能「為文」之能力，從而獲取身在藩鎮者則為「客」，身在朝廷者則為「官」的身份地位。

韓愈出生在一個世代守官奉儒的家庭，他的先祖曾經顯赫過。以家族觀念十分濃厚的韓愈來說，必會在其心靈產生深遠的影響。儒家的倫理準則中包含尊重祖先與先輩，所以，「述祖德」是士大夫的一個傳統。且這些輝煌的家史，讓韓愈感到十分自豪，由於受到這種家族性文化的刺激，引起了他邁向科舉之路的動機，再加上自幼的磨難—飄泊流離之苦、躲避戰亂之苦，讓其更加的好學上進。

所以，韓愈決定走上「求舉覓官」之路，主要是受到了唐代文人的生存方式

²⁴⁴司馬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八)·卷二百三十六》，(台北：天工書局印行，1988年)，頁 7604。

與儒家的價值觀念的影響。而家世背景與少年苦讀又給予他自豪感及加強了他本身的自信心，造就了他入世、求仕之執著；在仕宦生涯中，他始終表現出對建功立業的強烈渴望，及昂然向上、奮戰不懈的進取精神。

(三)、卑躬屈節的韓愈

中唐社會，客觀環境並不符合孔子、孟子建構的理想人格標準所需要的條件，生活在現實中的韓愈，其人格的獨立性必然受到一定影響，表現出他依附性的一面。

貞元年間，韓愈毫無緣由卻被撤去了四門博士的職務；一心只想得到一個新職務，於是送上了一封極盡阿諛奉承的請求信給德宗眼前的紅人—李實，內容是：

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²⁴⁵。

事實上李實恃寵而驕、專橫聚斂，是一個殘害百姓的凶惡官吏；韓愈在〈順宗實錄〉中亦有如此的體認，文中寫道：

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用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渠牟等以奸佞相次進用²⁴⁶。

但急於求進的他，必須得到李實的推薦，所以，他說了許多違心之論的話語；沒多久，韓愈就得到了監察御史的新官職。

又如潮州之貶事件，上奏章時正氣凜然的氣勢、前往去貶謫地時那昂然憤慨的決心；但到了當地之後，因受不了環境的險惡，心想為達到生還的目的，唯有將自己直言無忌的態度變成恭順從命的姿態，始有獲赦生還的可能。而實現這個結論的具體行動即是上呈〈潮州刺史謝上表〉，表云：

²⁴⁵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上李尚書書〉《韓愈全集》，頁 165。

²⁴⁶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順宗實錄·卷第一〉《韓愈全集》，頁 366。

臣以狂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四聖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

韓愈上表建議憲宗封禪，厚顏無恥地擺出一副乞憐討好的姿態，而他也因而得到了量移的機會；使得以韓愈繼承者自居的歐陽脩亦批評他說：

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蹙蹙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²⁴⁷。

〈論佛骨表〉與〈潮州刺史謝上表〉兩者成爲強烈的對比，這實在是韓愈軟弱動搖的政治立場和階級性的表現；爲了適應現實政治的需要，他必須「投王之所好」，這是他在官場多年後得到的切身經驗，同時也是功名心切的韓愈所採取的必然行動。

(四)、小結

從上述韓愈人格的分析中得出，韓愈是一位具有十分矛盾性格的人，自傲與佞人、勇敢與怕死、剛強與怯懦集聚於一身。他爲了夢想的實現，不惜在京城過著一種清客式的生活。在精神世界中，他一如往常，表現出對儒家理想人格的熱烈追求，但在政治生活中卻又隨意的以「現實」的立場應付人生。所以，韓愈強烈的進取心與仕進心切使他的行爲準則悖離了儒家精神信仰。

²⁴⁷轉引自轉引自李善馨，《韓愈資料彙編》，(台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頁108。

三、韓愈貶謫詩的儒家思想體現

韓愈的一生，以維護儒道統為職志，在其貶謫潮州期間，寫下〈琴操十首〉組詩，若從韓愈一生的理想與行事來看，將會發現其創作這組詩作，應有更深層的創作意義，而其意義是什麼呢？以下將做具體的分析探究。

(一)、體現儒家的倫理道德規範

〈琴操十首·履霜操〉一詩，敘述的是尹伯奇因受到後母的誣陷而遭到父親放逐。而尹伯奇之舉動，關乎「孝道」。在《論語》一書中即有很多關於「孝道」的言論；如〈學而篇〉中：「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²⁴⁸」、「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²⁴⁹」、「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²⁵⁰」，而在〈為政篇〉中也寫道：「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²⁵¹。』在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中，「孝道」一向是儒家所大力提倡的道德內容。〈履霜操〉吟詠尹伯奇之事，呈現了孝子之德；於是，藉由此詩體現了儒家倫理思想所推崇的孝道。

而〈琴操十首·雉操飛操〉一詩，敘述的是是牧犢子因已高齡七十，卻仍無妻妾，再看到眾多的雌雉追隨著一隻雄雉，雄雉趾高氣昂的模樣有感而發所作。而婚姻亦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內容，根據《禮記·禮運》中記載：「男有分，女有歸²⁵²」，即是婚姻不失其時，男女各得其所，這是大同社會中很重要的一環。而韓愈在〈原道〉一文中也寫道：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

²⁴⁸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學而篇》，頁5。

²⁴⁹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學而篇》，頁7。

²⁵⁰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學而篇》，頁8。

²⁵¹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為政篇》，頁19。

²⁵²阮元，《十三經注疏·禮記·禮運》，頁413。

果蔬魚肉²⁵³。

韓愈指出，婚姻之事亦為先王之教中之一項，由此可見，韓愈的〈雉操飛操〉詩中之旨意亦包含著重要的儒家倫理文化內涵，所以，此首詩亦為韓愈儒家思想的具體實踐之作。

而在〈琴操十首·別鵠操〉一詩中，是穆子與妻結縭五年，卻仍膝下無子，父母以「大義之道」要他另娶，穆子因與妻分離的傷心之作。而詩中指的「大義」即是《孟子·離婁篇》中寫道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²⁵⁴」之「孝義」，所以，韓愈的〈別鵠操〉即是體現了儒家倫理道德這一內容。

這三首詩題旨本來就蘊涵了儒家傳統的倫理道德思想，而這也是韓愈為倡導恢復儒家道統的具體實踐。

(二)、體現儒家的禮儀節操規範

〈琴操十首·將歸操〉一詩，原題旨是孔子受聘前往趙國，而趙國卻要處死對趙國有巨大貢獻的竇鳴犢與舜華，對此不義之舉，孔子有感而發。韓愈的仕途走的並不順暢，就如同其在〈進學解〉中所寫：「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而現在的他又因〈諫佛骨表〉而被貶謫至潮州，所以，會擔心再被權幸臣子所害亦是再所難免。所以，韓愈在詩中韓愈體現了孔子那「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²⁵⁵」的處世原則，是儒家思想中士人的品格規範。

而〈琴操十首·猗蘭操〉一詩，孔子因蘭花之不得其所，而發出國家黑暗，有賢能之人未能為世所用之嘆，但更多是對蘭花的讚美。就如《論語·述而篇》中寫道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²⁵⁶」及〈泰伯篇〉中「有道則見，無道則隱²⁵⁷」；在《孟

²⁵³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原道〉《韓愈全集》，頁 121。

²⁵⁴阮元，《十三經注疏·孟子·離婁篇》，頁 137。

²⁵⁵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泰伯篇》，頁 72。

²⁵⁶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學而篇》，頁 8。

²⁵⁷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泰伯篇》，頁 72。

子·盡心篇》亦寫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²⁵⁸」，所以，此詩體現的是儒家思想中居亂世而又不失其操守的品格規範。

以上兩首詩它們除了抒發韓愈貶謫潮州的怨恨失意之愁緒外，也體現了他樂道、謹守禮儀不失其品格的節操。

(三)、體現儒家的民本愛國思想

〈琴操十首·越裳操〉一詩，相傳是周公輔佐成王時，天下太平，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白雉而作。原詩呈現了一種太平盛世，萬國朝貢的政治秩序，這正是儒家理想的大同社會。如同《論語·為政篇》中寫道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則眾星共之²⁵⁹」對主政者德性的期許。所以，〈越裳操〉詩中韓愈之辭是站在自己的立場，闡明一種賢人治國及雨施物孳的政治理想，且藉由彰顯文王之德性，凸出儒家對統治者德政期待。

而〈琴操十首·岐山操〉一詩，是以周太王之口吻對戎狄的侵擾而被迫遷徙之事而發出哀嘆，其中傳達的是周太王之仁恩、惻隱之心，不忍見黎民百姓因自己而傷亡的民本思想，而這就是儒家思想中「仁」的精神。而在《孟子·盡心篇》亦寫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民而為天子²⁶⁰」，這就是以民為本的儒家思想，而韓愈亦希望藉由此詩傳達自己的政治思想，希望統治者仁恩惻隱之理念體現詩中的民本精神。

而在〈琴操十首·龜山操〉一詩，是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而韓愈在擬辭上又多了一層涵義：孔子希望周公顯靈，幫助自己除奸殺惡；但這當中還有韓愈隱藏的深義，表明自己一片忠心，矢志不渝；在《論語·泰伯篇》亦寫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²⁶¹」。所以，此詩呈現的是孔子擔憂朝政日益衰敗，憐憫黎民百姓流離失所，而這些都是儒家思想中，士人所必須弘揚品格規範。

²⁵⁸阮元，《十三經注疏·孟子·盡心下篇》，頁 251。

²⁵⁹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為政篇》，頁 16。

²⁶⁰阮元，《十三經注疏·孟子·盡心下篇》，頁 251。

²⁶¹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泰伯篇》，頁 71。

(四)、小結

胸懷大志的中唐文人以實踐為懷，他們在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下，為自己設定政治目標，並全力以赴地去追求，即使為之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表現出一種可貴的自我犧牲精神。他們在追求政治目標實現的過程中，就是其濟世意識充分張揚，並顯示其社會價值的過程，他們將傳統文人的政治人格與社會現實結合在一起，為其獻身，品格注入了鮮明的時代特色，使得他們在傳道精神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弘揚，也使中國傳統文人的社會理想得到了充分發揮。而韓愈〈琴操十首〉這組詩作，在其表達怨恨失意之情緒與樂道守操的品格之同時，他也借此實現了其修辭立言，以具體的言論來闡明自己的道德理想，並希望藉此來影響世人；所以，這組詩作，是韓愈以一個思想家的立場，藉由修辭來體現儒家思想。

第二節 韓愈貶謫詩的文學思想體現

韓愈的作品之所以能流傳千古，感人肺腑，與他自身不幸的遭遇有密切的關聯。仕途坎坷，幾經宦海風波，「不平則鳴」是他總結人生的經歷、個人艱困的生涯和社會現實所感悟出來的，從他貶謫詩所呈現的意涵就是最好的證明。在貶謫詩中，韓愈將其「不平則鳴」的文學觀點體現在為「小我」和「大我」鳴不平；其內容分述如下：

一、為「小我」鳴不平

韓愈的第二次貶謫，遠貶潮州，離長安有七千六百公里之遠，且此時的韓愈已五十二歲，時屆暮年，境況比陽山之貶還慘。所以，在其貶謫詩作中多是抒發胸中的憤懣不平之氣。

(一)、為個人

在風雪交加之日被迫匆匆上路，自料必無生還之可能，當韓愈到達離長安不遠的藍關時，韓湘趕來相見並與之同行，在心情極其低落的狀況下促成了他寫下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這首慷慨激昂的「哀怨」詩作，這首詩可以說是其「不平則鳴」的詩歌代表。詩云：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²⁶²。

詩中韓愈撫時感事，對自己「朝奏」而遭「夕貶」的不幸遭遇充滿了怨懟不平之氣；其「朝奏」是爲了「除弊事」，而爲國家諫言「除弊事」，卻得到了「夕貶」的代價；憤恨不平之氣充塞胸中。

而〈武關西逢配流吐蕃〉一詩中：「嗟爾戎人莫慘然，湖南地近保生全²⁶³。」韓愈藉由蕃囚之苦境，來突顯自己較之更加悲苦的處境，自覺「忠臣」遠不如「蕃囚」，盡訴心中無限的「不平之嘆」。又如〈食曲河驛〉詩中，韓愈從「羣鳥巢庭樹，乳雀飛簷楹²⁶⁴」二句，表達出倦鳥都能歸「巢」，而自己卻只能謫放至蠻荒之地，人不如鳥的「不平之嘆」盡顯詩中。而〈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詩中「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瘳。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并²⁶⁵。」韓愈自認自己實爲一忠君愛國之臣，但卻不爲君王所用，突出其內心對主政者的諸多不滿與諷刺的「不遇之鳴」。

又如〈琴操十首·將歸操〉詩中，韓愈藉由孔子受聘前往趙國，而趙國卻要處死對趙國有巨大貢獻的竇鳴犢與舜華之事，抒發出自己的忠心耿耿，卻反被國君疏遠的「不遇之鳴」，其中「無與石鬪兮，無應龍求²⁶⁶。」突出了對自己政治前途的憂心。而在〈琴操十首·猗蘭操〉詩中，韓愈以「雪霜貿貿，薺麥之茂²⁶⁷」喻當今朝廷奸臣當道，而自己卻抑鬱不得志，所發出的「憤慨之鳴」。〈琴操十首·履霜操〉詩中以尹伯奇受後母誣陷遭逐之事，來喻己無故蒙冤遭貶，發出的「悲痛之鳴」。〈琴操十首·雉朝飛操〉詩中，韓愈藉由牧犢子高齡七十，卻仍無妻妾之事，來爲自己的懷才不遇發出「不遇之鳴」。〈琴操十首·別鵠操〉韓愈藉由詩中穆子與

²⁶²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頁1097。

²⁶³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01。

²⁶⁴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05。

²⁶⁵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32。

²⁶⁶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43。

²⁶⁷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48。

妻子爲大義將分離之意以喻己，「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²⁶⁸」，更寫出了自己歸朝無期的「哀嘆之鳴」。〈過南陽〉詩中，「春鳩鳴不停」、「吾其寄餘齡²⁶⁹」，突出韓愈的孤獨絕望之感，又爲自己因政治的黑暗、現實而慘遭貶謫，而發出的「悲痛之鳴」。

(二)、爲朋友

韓愈與柳宗元兩人的政治觀點雖然不同，但兩人卻能相互理解，是一對文學上的好朋友。元和十四年(西元 819 年)韓愈被貶謫至潮州，此時柳宗元已被貶謫至柳州；元集虛受裴行立之命，帶書及藥物前往潮州探望韓愈，途經柳州時又受柳宗元之託，和韓愈在貶潮的途中相遇。韓愈寫了〈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詩中有「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²⁷⁰」、「寄書龍城守，君驥何時秣²⁷¹」的詩句，表達了對老友人品才學的讚賞和厚望，爲柳宗元遠貶荒僻之地，不能施展抱負而發出「不平之鳴」。而後又寫了〈答柳柳州食蝦蟇〉一詩，「我棄愁海濱，恒願眠不覺」、「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爲孝。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懼²⁷²。」詩中韓愈以蝦蟇和蛙蛤來比喻自己與柳宗元；才高學厚的兩人，兩人同爲國家盡心盡力做事，但兩人也同遭貶官的待遇，對於兩人之遭遇韓愈表達深切的憤慨之氣，同時也希望柳宗元能早日東山再起。

而在〈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詩中，韓愈還有對元集虛表達讚嘆及不捨的詩句，如：「子行誠艱難，我去未窮極²⁷³」、「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²⁷⁴」、「王官不可闕，未宜後諸生²⁷⁵。」以及〈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詩中的「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²⁷⁶」都是韓愈爲友人的鳴不平，對於主政治者不能任用賢能，致使賢者被埋沒而發出的「不平之鳴」。

²⁶⁸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68。

²⁶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6。

²⁷⁰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28。

²⁷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31。

²⁷²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38。

²⁷³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27。

²⁷⁴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31。

²⁷⁵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30。

²⁷⁶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81。

在這一些貶謫詩中，韓愈為友人鳴不平，其中固然有自身的感同身受，但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韓愈的「不平之鳴」，不僅僅限於個人的遭遇，還有對社會不公平的現實的一種批判，具有進步的意義。

二、為「大我」鳴不平

韓愈一生昂然積極用世，常以批判的態度直接干預社會現實。潮州之貶是其踏入仕途後的第二個筋斗，這一摔，摔得他又疼又重。但他仍不改其「鯁言無所忌」²⁷⁷的本性，在貶謫詩作中以他潛意識中的「大我」意識，為國、為民發出「不平之鳴」。

〈瀧吏〉一詩，主要是隱喻政情、譴責臣僚誤國；詩中「官不自謹慎，宜小，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既引分往」、「旃大餅鬻其躬，巧姦敗群倫²⁷⁸。」以上等語皆有強烈批判現實之意味，都是韓愈針對朝中官員的批評。

而〈琴操十首·龜山操〉，韓愈藉由龜山做比喻，大膽地批判憲宗，「周公冇鬼兮，嗟歸余輔²⁷⁹」二句與〈琴操十首·拘幽操〉中「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²⁸⁰」及〈琴操十首·殘形操〉詩中「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²⁸¹」，這三首詩都是在嘲諷主政者憲宗，嘲諷憲宗，空有伯樂之位而無伯樂之能，埋沒了才德兼備的賢能之士。〈琴操十首·越裳操〉和〈琴操十首·岐山操〉詩中的「今狄之人，將土我疆²⁸²」，這兩首詩嘲諷的對象是帶頭佞佛的憲宗，希望在上位的主政者能奉孔孟之道，做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一詩，韓愈為百姓的苦難而激發其心中的「不平之鳴」，如實的揭露黎民窮苦及慘不忍睹的淹大水狀況，且大膽的批判主政者的冷漠，對百姓生活疾苦的漠不關心。

²⁷⁷劉昫撰、楊家駱主編，(韓愈傳)《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印行，1989年)，頁1320。

²⁷⁸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09。

²⁷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52。

²⁸⁰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58。

²⁸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70。

²⁸²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61。

韓愈是詩文大家，他藉由詩文的創作來實踐詮釋其文學理論。而從上述的分析中得知，在其貶謫詩中，便體現了其「不平則鳴」的文學主張。當然，韓愈作為儒家道統復興的代表人物，在其貶謫詩中除了鳴其個人的「不平」之外，也有為朋友、為國家、為社會和為百姓的「鳴不平」，所以，韓愈的貶謫詩具有現實的和批判的意義；而其所闡述的「道」也具有與社會現實生活密切聯繫的思想內容。

第三節 韓愈貶謫詩的時空意識

人生活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中，每個人對自己存在於其中的時空都有獨特的感受，這種感受即成為其個人時空意識的基本內容。而時間和空間的概念是什麼呢？在中國很早以前是以「宇宙」一詞來稱呼，而「宇宙」是什麼呢？《莊子·庚桑楚》中是這樣解釋的：「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²⁸³。」《淮南子·齊俗訓》中也寫道：「往來古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²⁸⁴。」這「宇」指的便是空間，包含東、南、西、北、上、下、左、右方面延伸的空間；而「宙」指的就是古往今來，奔流不息，來無影去無踪的時間，包含：過去、現在和未來；所以，時間和空間是構成宇宙的先備條件，也是萬物存在的基本要素。而時空意識它是一種宇宙意識，也是一種生命意識。文學創作中所表現的時空意識，帶有主觀性和間接性；亦即是當創作者感受到外在的時間和空間後，對時空主觀的產生一些情感內容，並在作品呈現出來。

文人的心思總是特別縝密細膩，對於時空的感受也特別的敏銳。尤其，對於逐臣來說，無端的身受貶謫之禍，再加上經過長途跋涉的貶途及謫居生活的體驗下，對於時序的變遷、任何一自然風物的變化，無一不觸動其對生命的感悟，投注以無限深沈的感慨。所以，逐臣運用形像思維，以強烈的時空意識，將人、情、景、物融為一體，譜出一篇篇膾炙人口的詩篇，其中蘊含著一套獨特的人生哲理，揭示出人生的真諦。

本節將探討韓愈貶謫詩中所呈現的時空意識，試圖探析韓愈在面對仕途困蹇、失意不得志的人生處境時，是如何的去調適安頓自己的內心世界？

²⁸³周莊周撰·晉郭象注，《莊子·卷八·庚桑楚》，(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頁8。

²⁸⁴楊家駱主編·劉雅農總校，《淮南子注·卷十一·齊俗訓》，(台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178。

一、貶謫詩的空間意識

與時間相較，空間是比較具體且容易掌握的。空間是人類活動的場所，人不能脫離空間而存在，且對於所處的空間也必有所覺知。彭聃齡在《普通心理學》一書即寫道：

空間知覺是人對客觀世界物體的空間關係的反映。它包括形狀知覺、大小知覺、深度與距離知覺、方位知覺與空間定向等。空間知覺在人與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中有重要作用。如果人們不能認識物體的形狀、大小、距離、方位等空間特性，就不能正常地生存²⁸⁵。

所以，人因為有空間的覺知，才能在空間中活動，而空間便呈現了人經驗活動或心志活動的內容。而在詩歌中的空間是著重於主觀的心理空間，詩人在做空間的鋪陳時，常不經意的表露出其個人主觀的意念與情感；所以，個體的存在與空間是息息相關的。

尤其以貶謫詩人來說，在貶謫生活中，日常最深刻的體驗便是對空間的感受；從距離的遠近、貶途的難易、謫居地的安危……等，這些都無時無刻如影隨形的貼近著逐臣生活。逐臣韓愈在踏上貶途，走入異鄉土地時，荒僻被棄之的地形地物，無一不興起其同病相憐的情感，產生一種移情作用。在其貶謫詩中對於空間意象的鋪陳，呈現了強烈的宇宙意識及生命意識，將自己內在的情感投射到目視所感的景物中去，隱然有將自己的委屈全部傾注到地形地物的身上一般，將其生命體驗與空間形象結合起來，提升了詩歌思想的藝術品味，進而形成了其獨特的藝術功能。

(一)、呈現空間的遼濶、荒遠感

1、使用時空的數量詞及形容詞

²⁸⁵彭聃齡主編，《普通心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55。

在韓愈貶謫詩中，常常使用時空的數量詞及形容詞，凸出荒遠的空間意象，並將自我生命置於廣闊遙遠空間藉以突出它的沉淪色彩。如：在〈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中「『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²⁸⁶。」二句中連用三個數量詞，「一」、「九」、「八千」。「一」與「九」相對；在朝廷上，「一」個朝臣呈上奏章予「九」五至尊的君王，凸出帝王至高無上的地位，更顯韓愈地位身分渺小與卑微。而「一」也與「八千」相對，只因「一」封奏章，即被遠貶至離長安城「八千」里外的蠻荒之地潮州，藉以凸顯這份奏章所犯下的罪是如此之重、貶謫地與長安之距離是如此之遠，遠離權力核心，欲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夢想，更顯遙不可及，這更讓逐臣韓愈惆悵滿懷。

又如：〈武關西逢配流吐蕃〉中「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²⁸⁷。」「八千」是韓愈對遙遠空間距離的量化表現，指的是潮州與長安的距離，做出空間的延伸感。「路八千」也呼應著第一句中的「罪重」，因犯下重罪，所以，才會遠貶八千里外；這其中隱含韓愈希望藉由自己的認罪博得憲宗的原諒，早日再回到長安施展其抱負的心願。再如〈題臨瀧寺〉中：「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²⁸⁸。」抱著又老又孱弱的病體坐上船前往貶謫地，不知不覺中已離家五千里遠了。「五千」亦是一表示空間距離的量詞，這也是他對空間的直觀感知。〈路傍埃〉中「『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²⁸⁹。」「千」、「萬」都是形容數量之多，距離之遠的意思，在這裡韓愈除指出距離長安之遠外，亦似有所指，指出自己與憲宗之間隔著重重的阻礙，隱含其與君心之距離越來越遠之意。

但在這些貶謫詩中，對於遙遠距離的敘寫，韓愈並未全都以數量詞來表現，也會以形容詞來變化使用；如：「長」、「迢迢」、「浩浩」等詞語的應用。在〈路傍埃〉詩中：「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²⁹⁰。」韓愈寫道：貶途是如此的遙遠，又怎好勞煩這些土埃的送往迎來呢？「高歷歷」即是形容路途之遠的意思。又如：〈除

²⁸⁶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097。

²⁸⁷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1。

²⁸⁸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18。

²⁸⁹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2。

²⁹⁰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2。

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詩中：「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²⁹¹。」兩人分開已三年了，每每凝望著長長的道路。「長迢遞」指的即是綿長的道路，亦引申有長長的思念之意。所以，「一」、「九」、「八千」、「五千」、「千」、「萬」、「長迢遞」、「高歷歷」等數量詞及形容詞的使用，藉以凸顯出其貶謫地潮州與長安距離之遙的空間意象，且在使用過程中，韓愈的主觀情感已與這些空間意象緊密結合；遠離政治權力核心，滿腔的抱負理想不得盡情施展，內心苦悶無比的心境。

2、以「對比」的空間設計

任何的空間結構都有可能形成「對比」的對應關係。何謂「對比」？陳雪帆在《美學概論》中即寫道：「所謂對比，就是兩個極不相同的東西並列在一處，其間相去很遠，形成很大的反差²⁹²。」所以，對比讓人容易產生強烈的變化感。而姚一葦在《藝術的奧秘》一書中則對「對比」做更深入的剖析：

把兩種不同事物安排在一起，以強調顯露它們彼此之間的差異。……
僅文字表現的藝術品則全然不能用形式來限制，它的對比絕非止於一種文字的對列，更非僅止於一種對列的感覺。我們可以肯定的指出：凡文字表現的藝術品中的對比必然具有一個感覺以外的意義²⁹³。

而這裡所謂的「感覺以外的意義」，即是指作品中的情意或主旨。韓愈的貶謫詩以「對比」的空間設計安排是多方面，有：高峻與低窪的對比、上下位置的對比、迎送、出入動作的對比和方向的對比等，且其詩中運用對比空間設計安排，都是為了凸顯其內在的情意。

在〈路傍堠〉一詩中：「『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²⁹⁴。」迎我出武關，出武關之後又送我往南走，進入楚地；讓畫面移動，「從近到遠」及「先入後出」，做出空間的延伸，凸顯韓愈踏上貶途，繼續往南走，趕往貶謫地的畫面。

²⁹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1。

²⁹²陳雪帆，《美學概論》，(台北：文鏡文化事業公司，1984 年)，頁 70。

²⁹³姚一葦，《藝術的奧秘》，(台北：臺灣開明書局，1978 年)，頁 189-191。

²⁹⁴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2。

而「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²⁹⁵。」句子中呈現山高水低起伏變化的空間，山和水兩相對照，交織成一完整的自然生態，山水物性的對比，形成上下高低的遼濶空間感。這裡韓愈亦以「山」和「水」來表示其與憲宗之間的隔著重重的阻礙。

而在〈過南陽〉一詩：「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吾其寄餘齡²⁹⁶。」詩中韓愈借景抒情，以眼前所見的南陽城外實景起興，從小麥蒼鬱成長之情狀對比逐臣韓愈寂寥落寞之身影，更讓人對其處境投以憐憫之情，「春鳩鳴不停」一句呼應著第三句，凸顯趕往貶謫地的韓愈，心中無限的哀悽。「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二句描述自然景致的部分，以「由高而低」的視覺轉換，做空間距離的延展。在俯視的同時，他也藉著「秦山」、「商山」、「湖海」等空間意象，暗示憲宗被奸邪所包圍，而自己與憲宗之間隔著重重的阻礙，欲報國卻苦無門路，慨然的抒發內心的情志，且隨著離京城越來越遠，心中的絕望感也越來越深。

再如〈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北』望詎令隨塞雁，『南』遷纔免葬江魚²⁹⁷。」塞雁都能向北飛行，而自己卻只有南貶才能免除一死。「北」指的是北方，亦即是朝廷的所在地長安，政治權力中心；「南」指的是南方，貶謫地潮州。詩中寫出「南」、「北」兩方位，藉由方位的對比，彼此交織投射，空間立即展開綿延。「南遷」一詞呼應著「北望」，凸顯韓愈內心對北返回朝的渴望。

(二)、生命的困頓

1、因果關係的運用

韓愈在其貶謫詩中，亦會以因果關係表現出其貶謫生活的困頓及生命衰微的感知。所謂的因果關係即是韓愈因職場的困頓，致使其遠離敬愛的君王、朝廷與故交舊友；心中惆悵。如在〈食曲河驛〉詩中：

晨及曲河驛，悽然自傷情。羣鳥巢庭樹，乳雀飛簷楹。

²⁹⁵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2。

²⁹⁶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6。

²⁹⁷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73。

而我抱重罪，子子萬里程。親戚頓乖角，圖史棄縱橫。

下負朋義重，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²⁹⁸？

首聯是靜態的空間景致描寫，點出韓愈離開京城踏上貶途來到曲河驛，悽愴悲傷之情不覺湧上心頭。三、四句做動態自然景致的描繪，寫烏雀皆能得其所之景，亦是韓愈起興之引發點。五、六句則為動態的人文景，貶途中的韓愈，身影是如此落寞悵然；靜態景與動態景相互呼應，凸顯韓愈欲表達自己有家歸不得的無奈。「羣鳥巢庭樹，乳雀飛簷楹」二句，為詩中鎖定描寫的目標，視線聚焦在一個「點」的同時，情感也隨之而出，讓韓愈的心境隨之波濤洶湧，更引發其自己對返鄉歸朝的期待。這種表現方式是非常普遍的，已經形成貶謫詩人對空間意象的一種感受模式；抱重罪的韓愈從長安遠貶潮州，且從空間意象中，我們可以看到韓愈的生命狀態及其內心的情感，哀愁、企盼充塞心中，哀愁自己需往貶謫地潮州，企盼自己能再重返朝廷。

又如〈題臨瀧寺〉一詩：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²⁹⁹。

首兩句是景也是情，渲染出貶途中韓愈內心的壓抑感，第二句中的「衰病」呼應著第一句，在又衰又病精神不濟的情況下，不知不覺離開長安已五千公里。三、四兩句，韓愈預先想像潮陽的環境景象，先把視線停留在海面上，蒼茫一片，分不清東南西北，接著再透過空間「由低而高」的設計方式，從海面拉至天際，將滔天巨浪的畫面描繪得更為栩栩如生，凸顯潮陽環境的險惡，彰顯韓愈內心的恐懼與不安。

再如〈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之二〉：

舟行亡故道，屈曲高林間。林間無所有，奔流但潺潺。

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³⁰⁰？

²⁹⁸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5。

²⁹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18。

森林原本是人類最原始的家園，詩中韓愈以「林間」做爲一個空間背景，詩化原始的情境，在潛意識裡，寄託著自己回歸的意念。首聯寫的是船行駛在林間之景，頷聯寫潺潺奔流之景，兩者雖都是動態景致，但是以凸出淹大水之慘況。頸聯呼應著前四句，道出自己心中之苦有如身受水患之苦的百姓一般。「還」字呼應著詩的空間背景，韓愈以此篇作品暗喻自己對返鄉歸朝的期待，當中自然蘊涵其被摒棄於權力核心之外的傷感及自我實現價值被詆毀的挫折感。

2、空間的陌生感與險惡感

韓愈從長安城一路南下，對沿途週遭景物的陌生感及環境的險惡感，在其貶謫詩作中詳實的描寫，從而表現出其對空間的恐懼與不安。如〈瀧吏〉詩中，對環境空間的描寫：「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鱷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中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³⁰¹。」唐代的權力中心位在北方，被謫放的官員絕大多數都是被謫放至南方，在一般人的觀念裡，南方是窮惡又荒僻，尤其嶺南更被認爲是極惡之地。韓愈從瀧吏口中所得知的潮州，讓其對空間產生直觀的感知，前四句指出：惡溪聚集各種瘴毒，雷電不時大作，溪中鱷魚比船還大。韓愈以誇大的手法敘寫嶺南地區陌生的景物與險惡的地形；五、六兩句寫出一望無際，空間的遼濶感，表達韓愈內心茫然無所歸依之感；「颶風」呼應著第二句的「雷電」，指出潮州地區的氣候特徵，凸顯此處除環境之險惡外，天候亦十分的詭譎多變。韓愈藉由描寫嶺南地區險惡的地形與地物，從而表現出其對空間的恐懼感。

又如〈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之六〉：「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撞捽。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石于飛發。屯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詩中以映襯的手法做空間的延展，空間中的「由高而低」的空間結構，則是將視線集中到近處的景物，清晰且細緻的描繪眼前的景象。一、二句是對高處的景象加以描繪，「颶風」與「雷電」的結合，讓人了解到該地天候之惡劣。接著將目光回到自己

³⁰⁰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38。

³⁰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9。

乘船所在的海面之景，險象環生；強風巨浪，再加上木石齊飛的景象，讓人不禁爲其處境感到擔憂。在以上這兩首詩中，韓愈發揮其豐富的想像力，在意象中創造出神奇詭譎特殊的效果，從而表現出其對貶謫地內心的恐懼與不安。

(三)、小結

從本小節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在貶謫詩中，韓愈藉由時空數量詞、形容詞或「對比」的空間設計呈現空間的遼濶、荒遠感，藉以凸顯出其貶謫地潮州與長安距離之遙的空間意象。或以誇大的手法描寫嶺南地區陌生的景物與險惡的地形，來突顯其貶謫地環境的險惡，並烘托出自己內心恐懼不安的心境。貶謫詩中韓愈在空間意識的運用，他主觀情感已與這些空間意象緊密結合；遠離政治權力核心，滿腔的抱負理想不得盡情施展-志不得伸的苦悶再加上心中對貶謫地的恐懼，他深深的覺得自己應是很難逃過此一劫難。

二、貶謫詩的時間意識

時間意象廣泛的存在於一切的人間事物中，誰也不能脫離得了時間的節奏。但時間的存在卻是極爲抽象的，沒人能客觀具體的描繪時間。所以，對於時間的覺知，李清筠在《時空情境中的自我影像》就寫道：

就像對一切抽象事物的知覺模式一樣，我們必須透過實存空間中的具體物象，閱讀時間「經過」的痕跡。這些物象，就是時間的載體，引導我們知覺時間³⁰²。

人們對於時間的覺知，只能由對空間的變化或是透過計時工具而獲得，而這時間亦即是客觀的物理時間。在《論語·子罕》中就寫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³⁰³。」從中即可見端倪，孔子處在空間中詠嘆時間的流逝，或是是因看見空間的變動，

³⁰²李清筠，《時空情境中的自我影像》，(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頁21。

³⁰³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述而篇》，(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頁80。

而感受到時間運轉。但在詩歌中的時間不能只有物理時間，在魯樞元·錢谷融主編《文學心理學》書中就提到：

如果作品都按物理時間展開情節，其單調呆板和乏味就像時鐘的鐘擺一樣足以催人入眠。文學作品中的時間，是經過作家的想像對物理時間重新鍛造的結果，我們稱之為心理時間³⁰⁴。

所以，在詩歌中的時間通常包括客觀的物理時間及主觀的心理時間；主觀的心理時間，是詩人對時間的感受，而詩人對於時間的感受也常常在其作品中反映出其中的內蘊情感。李澤厚先生在《華夏美學》中即表示：

時間在這裡是情感性的，它的綿延或頓挫，它的存在或消亡，是與情感連在一起的。如果時間沒有情感，那是機械的框架和恒等的蒼白；如果情感沒有時間，那是動物本能和生命的虛無³⁰⁵。

所以說，情感與時間的相結合，才能使得文學作品更顯靈動豐富。自然時節的更替和時間的流逝，總是容易喚起詩人愁苦悲傷的情緒。而逐臣韓愈，又是如何在其貶謫詩中藉由時間意象的鋪陳來表達其心中的意蘊情感呢？本節筆者將就韓愈貶謫詩中的時間意象進行探究，將其分成「時值的感知」和「時序的感知」兩大方向³⁰⁶，分析出其中對應的情感內涵。

(一)、時值的感知

所謂「時值」指的就是時間的長短。在客觀的時值中，對任何一個人來說，六十秒就是一分鐘，它是一個定值。而人們對時值的感知，常常會受到個人主觀情感的影響而有所差異；黃永武在《中國詩學---設計篇》中即寫道：

³⁰⁴魯樞元·錢谷融主編，《文學心理學》，(台北：新學識文教出版中心，1990年)，頁196。

³⁰⁵李澤厚，《華夏美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9年)，頁62。

³⁰⁶參考陳文慧，《北宋前期貶謫詩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頁66-74。

詩人受情緒的影響，所感到的時間，是隨著心情而或短或長，與時鐘機械式地固定滑動是不一樣的，有時感到度日如年，有時感到歲月如梭，完全是根據心理的影響，將真實世界的時間，改成抽象的詩的時間³⁰⁷。

所以，主觀的時值是會因人、因事、因境而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說，同一個人，當其處在不同的情境中，對時值可能也會有不同的感知。對逐臣來說，謫居生活的閒散、漫長；讓其對時間的感受呈現不一樣情感內涵，這其中包含其對漫長謫居的失落感及老之將至的焦慮感。

1、漫長謫居的失落感

在韓愈貶潮期間的創作，量移袁州前，韓愈詩歌中傳達的情感多是怨懟悲苦的愁緒；如在〈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其一〉：「知識久去眼，吾行其既遠³⁰⁸。」韓愈表示自己已很久沒有看書，而且也已走得很遠了；詩中藉由「行遠」，綿延了時間的進行，凸出「久」這個時間意象，更暗寓自己已離京城很遠，心中愁悶的情緒，實際上還隱含一種意欲以才報效國家，無奈志不得伸的深層心理失落感。而〈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其三〉：「寤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³⁰⁹。」詩中以「由短而長」的時間結構，帶出時間悠長的感受。「短」的部分，寫著日夜想見元十八的心願；而「長」的部分，則將這個心願的時間擴大到從昔到今，已有三年之久，以凸顯出韓愈想見元集虛心願之久長；但才剛見面又要分離，韓愈不禁愁悵滿懷。

又如〈宿曾江口示姪孫湘其一〉亦是「由短而長」的時間設計結構，且重點放在「長」的部分；「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唏。問知歲常然，哀此為生微³¹⁰。」短的部分，「『暮』宿投民村」的「暮」所指的時間是夜晚；「『暝』聞屋中唏」的「暝」所指的時間是半夜；「仰視北斗高」以仰視滿天星斗的夜空來凸顯夜晚的時間意象。長的部分，「『歲』

³⁰⁷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7年)，頁50-51。

³⁰⁸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23。

³⁰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28。

³¹⁰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36。

常然」指的是整年都是如此。詩中藉由夜晚的意象來凸顯百姓生活的困境，夜夜不能成眠，而「歲常然」一詞則呼應著詩歌的前十句，居民常受水患所擾，但主政者對百姓生活疾苦的漠不關心，藉以凸顯韓愈與百姓心中對憲宗的失望與怨懟。

而〈拘幽操〉中：「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³¹¹。」「朝」和「夜」兩個對比的時間意象詞，指的是白天和夜晚；白天看不到太陽，黑夜裡也看不見月亮與星星，不知今夕是何夕，度日如年之感。正如逐臣韓愈自己正深陷在這孤寂困苦絕境中，猶如文王被囚禁在幽室中，對這時間的漫長感及未來的不確定感甚為焦慮。

2、老之將至的焦慮感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對於「時間易逝」和「老之將至」是一個常見的主題。當時間的流逝對應到逐臣的生命時，生命的有限性，便被彰顯了，因此，逐臣往往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種「嘆老」的悲哀與焦慮感。

〈雉朝飛操〉一詩，從雉鳥兒的雙飛雙棲，映照出詩人的落寞，也說出詩人心中的企盼。詩中：「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³¹²。」牧犢子感嘆自己年已七十，卻仍無妻妾。「七十」即為一實際的時間，牧犢子亦以「七十」來表示自己年紀已老，凸顯出自己孤孤單單的一個人，可憐的心境；這其中更蘊涵著韓愈表明自己年紀已老，但在職場上卻仍未有一賞識自己的伯樂出現，內心孤獨無助的心情。又如〈猗蘭操〉一詩中：「我行四方，以日以年³¹³。」「以日以年」為一時間意象語，「由短而長」的時間設計，可著眼於「長」的效果，呼應著第一句，孔子周遊四方，歷經很多年，都未受到重用。詩中韓愈雖是在抒發孔子的心聲，但實則是在為自己政治生涯的困頓發出「不平之鳴」。

而在〈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詩中：

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

³¹¹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58。

³¹²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66。

³¹³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48。

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
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
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
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否？
我昔實愚忝，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
公其務賞過，我亦請改事。桑榆儻可收，願寄相思字³¹⁴。

一首二十八句的詩，用了六個語彙描述「年老」的意象，從「龍鍾」、「齒落盡」、「鬢白」、「年過半百」、「來日無多」到「衰暮」，可見韓愈對「老」之感受有多強烈，尤其「來日苦無多」一語，韓愈以無比焦灼的心境，且主觀的認定自己的生命將盡，讓我們感受時間是那麼匆促、生命是那麼的危淺；詩中韓愈感悟去日苦無多，垂老將至，因而有了「及時」的領悟，希望老友能原諒他過去率氣直言之過，讓兩人再續前緣，以避免因「不及」而造成的悔恨。

(二)、時序的感知

所謂的「時序」是指物理性時間中的嚴格順序，如：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從「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從早上到晚上，規律的呈現時間的順序性。處於貶謫生涯時，逐臣憶起昔日的生活，將今日的我與昨日的我相互聯繫起來，不管是從現在溯及過往，抑或是由過去思及當下，都是對自我生命歷程的反思。在韓愈貶謫詩中對於時序的感知表現有以下幾項特點：

1、以「昔今」對照感受生命的流動

對逐臣來說，在過去的歲月中，發生了無數懾人心弦的事件，而正在經歷的現在，又是不可迴避，必需要面對的；因此，在過去與現在之中發生的種種，牽

³¹⁴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84。

引著逐臣的心靈，在詩作中以對比聯想作為其心理的基礎，用「昔與今」和「少與老」對照性的設計結構，譜出了動人的作品。如：〈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其三〉詩中寫道：「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³¹⁵。」韓愈寫道，在「過去」聽聞元集虛的事蹟已非常多了，但在這南貶的路途中，與元集虛同食眠「十日」，「如今」對元十八的了解又更多更深。詩中以「昔」、「今」的結構敘寫，先寫記憶中的認知，再寫與元十八同食眠十日後的今日，兩相對照起來，凸顯「今」之感受，表達其對元十八更加欣賞之意，從中亦可感受到時間與生命的流動。

又如〈過始興江口感懷〉：「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³¹⁶。」貶途路過始興的韓愈，觸景傷懷，憶起「昔日」一家人隨兄長韓會貶官至始興的情景，點出他對親人的懷念；接著回到現實，昔日親人如今僅存韓愈一人，唏噓之感齊湧心頭。「無人可共論」呼應第二句中的「今只一身存」，凸出韓愈孤獨落寞的身影。韓愈藉著南貶之事，道盡自己目前處境是如此的孤立無助；這其中除了有時間流逝的感嘆之外，更有對自己在職場上遭遇的感嘆。

再如〈答柳柳州食蝦蟇〉詩中：「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³¹⁷。」「初」、「近」兩個時間意象字，「初」指的是韓愈剛到潮州的時候，時間指向過去；「近」指的是最近、目前，時間指向現在。以「昔」、「今」的結構設計，凸顯「今」---「近」的意象，表達韓愈至今才對潮州的一切較為適應的心境，這其中亦有對時間流逝的感知。

以上詩作都是採用「昔今」對照性的方式敘寫，重心都是落在「今」的感受，感受時間的流逝，以凸出生命的流動。

2、以「自然現象」感受時間的流逝

物換星移原本是大自然的法則果，但當生命載滿了憂愁，當心中的理想幻滅

³¹⁵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28。

³¹⁶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21。

³¹⁷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38。

成空，看著落花流水，看著燕去春來，看著夕陽西下……，這些永無止盡的自然物象便與生命短暫形成了時間意象的關聯。

(1)、日暮

韓愈貶謫詩中屢屢出現「夕陽」之景的詞語，表明黃昏之際，如：〈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別酬以絕句二章〉中：「韶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³¹⁸。」〈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詩中的：「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欸行人³¹⁹。」〈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詩云：「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平³²⁰。」「日向西」、「落日」、「夕」三詞凸顯「日暮」的時間意象，「日暮」是一天的結束，夜晚的來臨，而夜晚的來臨，暗示著「靜止」狀態的到來，使人們彷彿斷了與外在世界的某種聯繫，喪失了一些可為的機會。而日落時分又是萬物「回家」的時刻，這對逐臣韓愈來說，更是勾起他無限的離情愁緒；所以，在這三首詩中，韓愈除了欲藉黃昏景象表現其面對別離的愁苦心情外，其中更蘊含有其感嘆時間的流逝，遭貶的自己無處可伸展抱負及其想回歸朝廷的願望。

(2)、季節

四時的更迭始於春而終於冬，而歲暮多是指秋冬時節，由始入終的終點站，萬物由夏之極盛而漸漸轉衰，這當中夾雜了某種失落的情緒，在又與外在凋衰的環境結合下，從而產生悲的感受。如：〈猗蘭操〉詩中：「『雪霜』貿貿，薺麥之茂³²¹。」「雪霜」一詞呈現出季節的時間意象，韓愈將眼光集中在這寒氣逼人的冬季，藉薺麥生氣蓬勃的物象中，從而感受到自我生命的不諧和。將季節的時間意識，深化為「朝廷正被亂臣賊子所操弄中」的意象，但自己卻仍堅持操守，不與之同流合污。

³¹⁸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19。

³¹⁹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81。

³²⁰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87。

³²¹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48。

而從冬天進入春天，綠芽破霜雪而出，這也是一極感人的變化，它代表著一個新的開始，這其間蘊含著無限的可能及希望。在韓愈貶謫詩中，亦有藉由天地自然現象作為季節時間意象呈現的，如：〈次鄧州界〉詩中：「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³²²。」所謂「驚蟄，雷鳴動」，而驚蟄之時約在國曆的三月，亦即是初春之際，所以，詩中的「雷雨」一詞，指的即為初春的時間意象。詩中韓愈希望朝廷收服海嶽後，能循平淮西之先例，降福音，赦免其罪。

(三)、小結

對於時間的感知是會因人、因事、因地而有所差異，從本小節探究中得知，逐臣韓愈從時值中感知到漫長的謫居生活與老之將至，凸出其感知時間的流逝及內心的焦慮與無助感。或以「昔今」兩相對照及自然現象，來感受生命的流動，表達其內心濃濃愁緒，並主觀的認定自己將「不久於世」。

³²²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3。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以探析韓愈貶謫詩---以貶謫潮州時期為限為研究主軸；從貶謫詩的內容及思想特色去考察韓愈面對貶謫時自我心靈世界的另一層面，以下依據論文脈絡分點陳述結論。

一 據儒反佛的強烈思想

韓愈站在衛道的立場，從政治、經濟和思想層面排斥佛老；首先，在政治倫理層面，由於佛老不注重倫理綱常，因而影響了國家的政治秩序。其次，在經濟層面，由於佛老的出現，產生經濟供需失調之問題，造成「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情形。再者，就思想層面，韓愈明確的界定道即是以仁義為本質的孔孟之道，提出「道統說」和「心性論」藉以正本清源，以別於佛老之道、佛老之思想。

元和十四年，韓愈上呈〈論佛骨表〉，諫阻奉迎佛骨，因而被貶謫至潮州；究其實質原因，實由於韓愈所屬的裴度集團與李逢吉集團兩集團之爭鬥；而「爭鬥之鑰」始於淮西之役，〈平淮西碑〉是引發貶謫事件的引信，〈論佛骨表〉則是壓垮裴度集團的最後一根稻草，使得集團中的韓愈只得遠貶異鄉，到瘴癘之地潮州。

二、從韓愈貶謫詩體察其時空感受與心理變化

從貶謫詩內容的分析中，筆者發現：韓愈在其遭貶謫至接獲量移袁州通知前所作之貶謫詩作，多以在為自己求饒，或訴心中不平之氣為主，詩中充滿著濃濃的乞憐、怨懟的意味。但接獲量移袁州通知後的詩作，從詩中可以深刻的感受到的韓愈心境的轉變，愉悅之情溢於詩文中，所謂境由心轉，在韓愈身上足可印證。且從這四十三首貶謫詩的分析中亦發現，在文辭的運用上顯得淺白流暢，較少雄崛奇險之作。

中國古典文學中對於「時間的易逝」和「老之將至」是一個常見的主題。當時間的流逝對應到逐臣的生命時，生命的有限性，便被彰顯了，因此，逐臣常

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種「不久於世」的悲哀與焦慮感。且對逐臣來說，過往歲月中，發生無數懾人心弦的事件，而正在經歷的現在，又是不容忽視；因此，在過去與現在發生的種種，無一不撥動著逐臣的心靈，所以，對於時空的感受總是特別的敏銳。韓愈幼年時期曾隨兄長韓會貶官至韶州，但兄長最後卻病死在貶謫地；再加上自身的貶官經驗，所以，對貶謫的體認，他的感受自是比別人更深一層。對於再度遭貶，其內心自是驚恐萬分，「命將歸兮」之念頭時時盤據心頭，趨之不去。

三、貶謫詩中的文學觀

韓愈在我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在文學上主張「文以載道」、「不平則鳴」。而「不平則鳴」之主張，又與其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的性格不無直接的關係。他關心現實，憂懷國事，體恤百姓，再加上自己坎坷的仕途，所以，他滿腔的不平之氣，不得不鳴，一篇篇不平之鳴的作品就隨之而出。韓愈的「不平則鳴」著重在主觀的抒情，在他貶謫嶺南的創作中不乏是發牢騷、抒憤慨之作；而這些貶謫詩不同於其平時的詩作，它皆是出自其肺腑之言，感人至深，且思想內容深刻。且其詩歌中的「不平之鳴」，實源自於其文章的概念，可見韓愈其詩、文寫作精神內在是相一致的。

四、研究的檢討與對未來的展望

綜觀前人對韓愈的研究，主要表現在生平及思想、散文、詩歌或其歷史地位方面的研究，且也都獲得了不錯的成果。但以現今對韓愈的研究狀況來說，筆者卻發現，在大陸地區已開始有學者針對其貶謫的詩風及心性做一探討研究；但在台灣卻仍缺乏對詩人貶謫期間之貶謫詩進行全面性深入剖析研究。所以說，筆者「韓愈貶謫詩探析---以貶謫潮州時期為限」之研究，堪稱在國內是首開先河；雖說是開路先鋒，但畢竟對一個只有「國學」，沒有「文學」底子的我來說，這還真是一項艱鉅的工程，雖然努力的完成「它」，分析歸納整理出貶謫詩的意涵及思想

特色，但其中必有不足疏漏之處，還期後人之研究能給予指正。

在研究的過程中，筆者發現韓愈貶謫詩值得探究的主題還真的很多，諸凡：思想內容、詩歌風格、藝術等，都是一個可研究的重點。其次，亦可對兩次貶謫詩作內容進行比較研究，兩次的貶謫事件對韓愈的心理影響至鉅，致使其詩歌風格一變再變，此亦為不可忽略的研究重點之一。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依年代先後排列)

- 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日知錄集釋》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
- 李翱〈去佛齋〉《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李文公集》，(上海商務印書館)
- 夏丏尊、葉紹鈞，《文章講話》，(上海：開明書局，1948年)。
- 李顯才刷印《十三經注疏·左傳》，(台北：藝文印書館印行，1955年)。
-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 張籍〈上韓昌黎書〉《全唐文》，(台北：啓文出版社，1960年)。
- 林紓著，《韓柳文研究法》，(台北：廣文書局，1964年)。
- 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7年)。
- 陳沆，《詩比興箋·卷四》，(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1970年)。
- 司馬遷撰、斐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台南：大行出版社，1975年)。
- 陸貫達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十三經古注》，(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
- 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7年)。
- 羅聯添，《韓愈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
- 姚一葦，《藝術的奧秘》，(台北：臺灣開明書局，1978年)。
- 馬起華，《韓文公年譜》，(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 朱熹集傳、王靜芝譯，《詩經新釋》，(台北：輔仁大學文學院，1978年)。
- 周莊周撰、晉郭象注，《莊子·卷八·庚桑楚》，(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
- 湯用彤著，《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李白著、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
- 陳寅恪著，〈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金濤聲點校，《陸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吳文治，《韓愈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李善馨，《韓愈資料彙編》，(台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

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

陳雪帆，《美學概論》，(台北：文鏡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

李樹桐，〈唐代的政教關係〉《唐史新論》，(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5年)。

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

楊家駱主編、劉雅農總校，《淮南子注·卷十一·齊俗訓》，(台北：世界書局，1985年)。

嚴羽作、黃景進撰述、龔鵬程總策畫，《滄浪詩話》(台北：金楓出版社，1986年)。

王壽南著，《隋唐史》，(台北：三民書局，1986年)。

謝祥皓編，《孟子思想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86年)。

簡宗梧編撰，〈漁父〉《中國歷代經典寶庫·楚辭》，(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7年)。

陸貫達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十三經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

司馬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台北：天工書局印行，1988年)。

阮元，《十三經注疏·論語·述而篇》，(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顧俊，《隋唐史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

何法周，《韓愈新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

吳兢編撰，《貞觀政要》，(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李澤厚，《華夏美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9年)。

楊家駱，〈蘇東坡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

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印行，1989年)。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5》，(台北：鼎文書局印行，1989年)。

朱熹，《四書集注·孟子·萬章下》，(台北：學海出版社，1989年)。

李元洛，《詩美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

魯樞元、錢谷融主編，《文學心理學》，(台北：新學識文教出版中心，1990年)。

劉國盈，《韓愈評傳》，(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

錢冬父，《韓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1年)。

朱熹集傳、汪中斟補，《詩經集傳附斟補》，(台北：學海出版社，1992年)。

李浩著，《唐詩美學》，(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張躍著，《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戴朝福，《儒家的生命情調》，(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

尙永亮著，《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黎活仁，《現代中國文學的時間觀與空間觀》，(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

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王更生，《韓愈的散文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卞孝萱、張清華、閻琦，《韓愈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仇小屏，《文章章法論》，(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韓廷一，《韓昌黎思想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丁原植，《文子資料探索》，(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

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唐曉敏著，《中唐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吳雪美、徐瑋琳編輯，《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2000年)。

李清筠，《時空情境中的自我影像》，(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趙岐注、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孟子注疏(上)》，(台北：古籍出版，2001年)。

仇小屏，《古典詩詞時空設計美學》，(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

市川 勘，《韓愈研究新論》，(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

彭聃齡主編，《普通心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仇小屏，《古典詩詞時空設計之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

董楚平譯注，《楚辭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李建崑，《韓愈詩探析》，(台北：花木蘭文化，2009年)。

二、期刊(依年代先後排列)

- 李建崑，〈韓愈〈琴操〉十首析論〉《興大中文學報》，1990年1月，第3期。
- 劉國盈，〈韓愈與僧人〉，《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
- 譚澎蘭，〈韓愈論佛表的緣起及其內容分析〉，《笕橋學報》，1995年，第2期。
- 雷恩海，〈略論韓愈詩的創新〉，《貴州社會科學報》，1995年，第4期。
- 孫立州，〈貶官·杰作·窮愁〉，《電大教學》，1995年，第4期。
- 古永繼，〈唐代嶺南地區的貶流之人〉《學術研究》，1998年第8期。
- 李建崑，〈論元和時期流貶文人之行旅詩〉，《國立中興大學文史學報》，1998年6月，第29期。
- 劉振姪，〈貶謫與唐詩〉，《廣西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
- 叢培欣、叢培梅，〈淺談韓愈詩歌藝術〉，《黑龍江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 胡可先，〈論中唐南貶詩人屈原情結〉，《中國楚辭學》，第15輯。
- 胡守仁，〈試論韓昌黎五言古詩〉，《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第8月，第33卷第3期。
- 劉尊明，〈韓愈貶謫潮州的人生體驗與詩文創作〉，《湖北大學學報》，2001年5月，第28卷第3期。
- 尙永亮，〈專制政治壓力下的生命體驗和心性變化—以韓愈的潮州之貶為中心〉，《武漢大學學報》，2001年9月，第54卷第5期。
- 黎孟德，〈韓愈琴詩初探〉《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5月，第31卷第3期。
- 高瑋、吳在國，〈論韓愈兩次被貶中的「變」與「不變」〉，《固原師專學報》，2005年1月，第26卷第1期。
- 卞孝萱，〈韓愈貶潮原因探幽〉，《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5年3月，第2期。
- 張清華，〈韓愈刺潮爭議問題考辨〉，《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5月，第22卷第3期。
- 卞孝萱，〈韓愈貶潮原因探幽〉，《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 吳振華，〈20世紀韓愈詩學研究〉，《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2月，第5卷第2期。

杜興梅，〈試論韓愈貶潮的認同心理〉，《韓山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2月，第27卷第1期。

石偉、王石，〈韓愈的衛道背景與實踐〉，《鞍山科技大學學報》，2006年4月，第29卷第2期。

李新、郝江波，〈近十年來韓孟詩派研究綜述〉，《保定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7月，第19卷第3期。

吳振華，〈論韓愈的反佛興儒及其對儒學南傳的貢獻〉，《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11月，第33卷第6期。

黃倫峰，〈從韓愈貶潮看其詩風變化〉，《哈爾濱學院學報》，2006年9月，第27卷第9期。

李豔傑，〈韓愈〈琴操十首〉蘊涵的政治情緒〉，《內蒙古電大學刊》，2007年，第2期。

楊子怡，〈論韓愈的罪臣意識〉，《寧夏大學學報》，2007年3月，第29卷第2期。

范新陽，〈論韓孟聯句的藝術特質及其詩學謀略〉，《南京師大學報》，2007年9月，第5期。

陳家紅，〈韓愈貶潮後思想轉變之辯〉，《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9月，第24卷第3期。

馮念華、邵宗豔，〈再論韓愈排佛及其與僧人交往的詩文〉，《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11月，第24卷第6期。

蔡振念，〈沈宋貶謫詩在詩史上之新創意義〉，《文與哲》，2007年12月，第11期。

白書剛、陳新運，〈韓愈的道統思想及其歷史地位〉，《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08年7月。

劉鐵峰，〈中國貶謫文學中的生命關懷—以唐代貶謫者的文學創作為例〉，《唐都科學》，2009年5月，第25卷第3期。

朱紅梅，〈也談中國古代詩歌時空關係〉，《雲南警官學院·語文學刊》，2009年6月。

王黎燕，〈韓愈原道中的尊儒思想〉，《焦作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

黃偉宏，〈解讀韓愈貶潮詩文情感風格的變化〉，《語言文學研究·文教資料》，2010年6月。

楊子怡，〈韓愈、蘇軾懼禍心態與後人評價之異探因〉，《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學報》，2010年10月，第31卷第5期。

姜龍翔，〈論韓愈貶潮時期文章寫作的兩種策略——以〈潮州刺史謝上表〉及〈鱷魚文〉為考察主軸〉，《中國學術年刊》，2011年3月，第33期。

楊簡，〈論貶謫的逆境對詩歌天才的玉成〉，《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學報》，2011年4月，第21卷第2期。

沈文凡、張德恒，〈韓愈貶潮心跡考論——從比較昌黎《論佛骨表》與傅奕《請除釋教書》展開〉，《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學報》，2011年4月，第21卷第2期。

吳振華，〈論韓愈的律詩〉，《宜春學院學報》，2011年11月，第33卷第11期。

三、學位論文(依年代先後排列)

高八美，《韓愈詩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年)

李建崑，《韓愈詩探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王麗雅，《孟郊、韓愈奇險詩風比較研究》，(台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梁倩筠，《論韓愈的佛學觀及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暨南大碩士論文，2002年)。

康粟豐，《唐代流貶文人研究》，(浙江師範大碩士論文，2004年)。

陳文慧，《北宋前期貶謫詩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黃舜彬，《韓愈詩美學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康粟豐，《唐代流貶文人研究》，(浙江師範大碩士論文，2004年)。

陳顯頌，《韓愈詩修辭藝術探究》，(國立中興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4年)。

王光強，《韓詩對宋詩的影響談》，(天津師大碩士論文，2005年)。

張晶平，《論中唐貞元詩風》，(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潘昱州，《韓愈反佛思想溯源——惠民的有為之道》，(西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吳燕玲，《韓愈律詩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劉鐵峰，《論唐代貶謫文學的接受情感》，(湘潭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曾金承，《韓愈詩歌唐宋接受研究》，(台北：私立淡江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2007年)。

陳雅欣，《唐詩中的南書寫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崔文靜，〈韓愈的反佛主張及其影響〉，(重慶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汪仕輝，《中唐政治教化論略》(，中南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崔文靜，《韓愈的反佛主張及其影響》，(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樓培，《中唐韓愈研究二題》，(浙江大學，2008年)。

黃翊璋，《歷代韓愈詩探微》(台北：國立中興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9年)。

鄭美珠，《論韓愈詩歌中的歷史人物》(新竹：私立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姜龍翔，《論韓愈貶潮時期文章寫作的兩種策略---以〈潮州刺史謝上表〉及〈鱷魚文〉為考察主軸》(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秦后升，《唐元和平定藩鎮問題研究》，(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王升平學，《中唐貶謫荆楚詩人詩歌主題探略》，(新疆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王征，《韓愈道統說研究—以其譜系的建構為中心》，(中國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楊子怡，《韓愈、蘇軾懼禍心態與後人評價之異探因》，(曲阜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孔沫人，《韓愈道統觀思想研究》，(曲阜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